帝国主义与革命

Imperialism and the Revolution

作者：恩维尔·霍查



（Enver Hoxha，1908 年 10 月 16 日-1985 年 4 月 11 日）

铁匠、思惑、闲汉译

闲汉、铁匠校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

Proletarianët në mbarë botën bashkohen!

阿尔巴尼亚语第一版序言

从 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出版《共产党宣言》至今，无论是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总是围绕着一个问题：是否需要通过革命将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否存在进行革命的条件？革命是否能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抑或革命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总是尝试着运用他们形形色色的理论来否定这个不容置疑的真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否定工人阶级在历史上的位置和角色，并否定阶级斗争本身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他们的目的一直是从意识形态上将无产阶级引入歧途，借此来阻碍革命，使资本主义的剥削得以苟延残喘。并借此摧毁马列主义——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体系。

所有的这些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敌人、对手试图宣称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他们创造了形形色色的"理论"，说这些"理论"适应了新的历史形势，适应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经历的变化，适应了人类社会的一般演变。

因此，伯恩施坦宣称马克思过时了，考茨基别有用心地曲解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型，从而否定了革命。从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欧洲共产主义者”到中国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以上所有现代修正主义者都追随着他们的"榜样"与方式。在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实行、发展马列主义的虚伪托辞下，所有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否定工人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他们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一直在进行着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它形形色色的变种的坚定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个斗争将永不停息。

修正主义者，反动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妄图给我们马列主义理论贴上诸如"教条"、"僵化"之类的标签。但这些言论不能解释当代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现实。但一提及活力、生命力，马列主义是唯一拥有这些品质的理论，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理论，而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最为先进的阶级，最为革命的阶级，是创造了物质财富，最为活跃的阶级。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家们试图说服人们：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并且和现代脱节了，其目的在于反对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并代之以各种宣扬堕落腐化的生活方式 ，无限制堕落的社会，所谓"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些理论目的在于打压无产阶级革命性进步性的意见，并维护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我们的理论正确地评价并定义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如同列宁教导我们那样。它与源自生活、源于时代的实际问题保持着紧密联系。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并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它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并理解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并且帮助我们执行社会的革命性变革。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揭露了所有的不同的修正主义思潮，包括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我们党坚决地批驳了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当前阶段问题上，拒绝革命、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论点与观点，并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变化不能为修正主义的"发明"和伪造提供辩护，突出了马列主义对革命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性。有原则的批判和不断的揭露反共、反革命理论对于维护马列主义，将革命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永远年轻，证明马列主义是在未来取得胜利准确无误的指南，是完全必要的。

1978 年 4 月

第二版注意事项

《帝国主义与革命》一书于 1978 年 4 月首次出版[阿尔巴尼亚文]，供党内发行。按照阅读本书的共产党人的意愿，现在可以将其公开。自首次出版以来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件也包括在内。

1978 年 12 月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策略

在分析当前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情况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对各民族革命和解放运动带来的危机，强调对它们无情的打击和对全球马列主义运动的积极支持之必要性。

这些问题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保卫祖国的斗争，都离不开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的总进程。

今天，奴役和剥削无产阶级人民的代表----美帝及其走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大反动派等黑暗势力奴役和剥削无产阶级人民的代表，已经起来反对和正在同马列主义作斗争。社会民主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等反革命思潮和许多其他反革命思潮，也都起来反对我们的革命思想。

我们同一切敌人的斗争，必须以马列主义理论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为基础。如果我们正确地辩证地分析国际局势，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正确地分析各种相互矛盾和斗争的社会力量的目标和目的，我们在理论方面的斗争就会取得成功。科学分析国际形势，明确革命斗争的战略，有助于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确定正确的策略，从而赢得一场又一场的战斗。这就是我们党一贯的作风。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世界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进行残酷的、持续的斗争，世界人民同内外压迫者进行斗争。世界无产阶级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斗争的，马列主义思想说明了世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并动员了斗争中的各种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组织起来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进行艰苦的斗争。

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发展和革命变革的规律，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渡的规律。他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和资本主义攫取的剩余价值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他创立了科学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明确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道路。

世界各国的反动理论家都在千方百计地诋毁马克思的理论，诋毁它、歪曲它、反对它。但是，这一理论，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已经成功地在进步人类思想中占主要地位，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并加以发展，给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列主义政党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科学理论。列宁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凭借马克思主义，他领导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列宁的工作由斯大林进一步发展起来。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帝国主义，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做出了首次毁灭性的打击。它标志着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开始，这场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

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它向无产阶级和人民表明，他们所面临的敌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可以被征服和消灭的。苏联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盟对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中的失败感到愤怒，加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压的手段，来对抗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和全世界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欧洲和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连同资本主义的其他党派，挑起了对苏联的战争【1】。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伴随着狂热，也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在这场战争中，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生命力得到了更加明显的证明，马列主义取得了胜利。战胜法西斯后，世界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变。欧洲和亚洲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了。这是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又一次巨大失败。

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严重动摇，其平衡完全被打乱。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战争中败北，经济一蹶不振。他们失去了以前占据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虽然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它们作为大国的作用已大大下降。

随着殖民制度的崩溃，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进一步加深。由于这种崩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国

家，而在那些仍然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枷锁的解放运动却在发展。

这些变化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由于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处于革命爆发的边缘。

在这种极其严重危急的情况下，美帝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不同，美国在战争中变得更加强大。它不仅没有受到损害，反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极大地提高了它的经济和军事潜力，以及它的技术科学基础。这个帝国主义以人民的鲜血为养料，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唯一领导。美帝动员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势力去拯救资本主义旧秩序和镇压任何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使它们濒临绝迹，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人民民主，恢复苏联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建立起霸权。为了达到它的目标，美帝连同世界资本，发动了它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器，它的巨大的经济、技术和财政潜力，它的一切人力。美帝帮助破碎的欧洲和日本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复苏，并取代崩溃的殖民制度，建立了一个新的剥削和掠夺制度——新殖民主义。

美帝发动了它的许多宣传人员、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作家等，开始了反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苏联和欧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疯狂运动。与此同时，美帝实行了公开的侵略政策。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队和科学，都被战争狂热、军事化和反共产主义所席卷。

为了战胜社会主义，为了镇压革命解放运动，为了同马列主义理论的巨大影响作斗争，为了确立它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美帝采取了两条道路。

首先是侵略和武装干预。美帝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东南亚条约组织【3】等侵略军事集团，大量驻军在许多外国的领土上，在各个大陆上建立军事基地，并建立了强大的海军舰队，部署在整个海洋。为了打击镇压革命，他们在希腊、朝鲜、越南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军事干预。

二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工人党进行思想上的侵略和颠覆，使这些国家和党被和平演变。在这个方向上，美帝和世界资本作为一个整体，使用了强大的宣传手段和对意识形态的分散。

但是，战后正在复苏的美帝和世界资本主义，却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敌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无产阶级和爱好自由的人民。因此，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对待这个由正确和明确的政策所指导的巨大的力量，由一种胜利的意识形态所指导的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抓住工人、革命者和进步分子的内心和思想。

尽管美帝和世界各国为镇压和消灭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民解放斗争作出了种种手段，但是他们的力量仍在不断增强和壮大。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很快地抚平了战争的创伤，在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在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的地位正在巩固。共产党和反帝民主运动正在在群众中扩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利用现代修正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和人民解放运动，南斯拉夫成为了第一个。

南斯拉夫，一个被称为人民民主的国家，站出来反对苏联，并与之发生公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这对世界资本主义来说是一个幸运的消息，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一个成员国背叛了。世界资本主义对这一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宣传，帮助它与社会主义和革命作斗争。

但是，铁托分子的背叛，虽然对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但却没有像资产阶级和反动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成功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家都严厉地谴责了这种背叛行径，指出了铁托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共产主义所构成的威胁。

正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斯大林死后夺取了苏联的政权，在世界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列主义的斗争中，为世界资本主义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策略实现的最大胜利。

反革命分子篡夺苏联使美帝和资本主义世界欢欣鼓舞，因为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堡垒，在理论和实践中放弃了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道路，并易以反革命和资本主义作为基础。

苏联的大转变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它是影响现代修正主义在许多共产党中传播并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严重损害了世界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

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力量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从一开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高举无情地、有原则地与苏联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斗争的旗帜，勇敢地

捍卫了带来社会主义和人民解放的马列主义，就像与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坚决斗争那样。
在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者也起来反对赫鲁晓夫的背叛。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出现了新的马列主义政党，担负着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重任。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最终消灭社会主义、消灭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粉碎人民斗争的希望没有实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很快就显露出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特征。人民看到苏联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并同美帝一道，成为革命、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另一个大敌。

另一方面，严峻的经济、金融、意识形态和政治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世界，不仅清清楚楚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衰减及其不变的压迫和剥削的本质，同时也暴露出了美化资本主义秩序的所有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蛊惑人心和虚伪。

但当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团结起来，当资本主义陷入了越来越紧的枷锁中，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嘴脸暴露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面前时，中国修正主义公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扼杀和破坏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美帝和国际大资产阶级的亲密盟友。

当前，世界形势十分复杂。今天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是各种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势力，它们一方面在同革命和人民自由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在市场、势力范围和霸权问题上相互竞争和冲突。现在，除了美苏对抗以统治世界，还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需求，日本军国主义的掠夺野心，西德帝国主义为至关重要的国际地位而奋起，欧洲共同市场【4】的激烈的竞争，这使它的眼睛转向了旧的殖民地。

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的矛盾。同时，革命的前途和人民的解放并没有因铁托，中国，苏联修正主义的背叛而殆尽。恰恰相反，现在暂时的挫折后，革命正处于一个新的飞跃时期的边缘。它一定会沿着历史为它确定的道路向前迈进，并将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无情报复面前是无法挽救的。没有什么能把他们从深刻的对立矛盾和无休止的危机、革命以及他们不可避免的灭亡中拯救出来。
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逃避即将到来的灾难，寻求新的道路，建立出新的战略和对策。

注：

【1】译者注：应指苏俄国内战争

【2】译者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 NATO，二战后西方阵营的反苏反共军事战略同盟，1949 年在华盛顿签署协定成立。

【3】译者注：东南亚条约组织，简称 SEATO，于 1955 年 2 月 19 日在泰国曼谷正式成立的反共集体防卫组织，1977 年 6 月 30 日解散。

【4】译者注：即欧洲经济共同体

世界帝国主义的战略

美帝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它们在世界上的霸权，为了保住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制度，为了以尽可能少的损失摆脱他们所掌握的大危机，进行了抵抗，并正在进行抵抗。他们曾努力并正在努力阻止人民和无产阶级实现他们解放的革命愿望。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抵抗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占主导地位的美帝发挥了主要作用。

革命与人民的敌人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和社会主义所遭受的失败，产生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情况。因此尽管它们彼此之间有着激烈的矛盾，美帝和世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寻求妥协，制造一个“新社会”，使资本主义制度继续运作，避免革命，继续以新的方式方法压迫和剥削人民。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认识到，他们现在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剥削世界人民了，因此，只要他们的制度不受威胁，他们就作出一些让步，以便把人民群众束缚起来，而这些让步是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的。他们希望分配给那些他们已经建立了影响力的国家和小集团投资和信贷，来实现这一目标；或者通过武器，即要么直接参与战争，要么煽动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局部战争使那些落入局部战争陷阱的国家更加受制于世界资本的霸权。

西方和东方所有为世界资本服务的“理论家”都在努力为这个“新社会”寻找公式。目前他们找到了新的公式。苏联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是一个堕落的社会，他们在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自治”制度【1】和一些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权中发现了这种形式。他们正在努力寻找一种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这种“新社会”也在中国的变体中------目前正在逐渐形成。

卡特总统在1977年5月22日发表了一个对外政策演说。他提出了一个据说是美国的新政策的概要，很明显在现状下，“新政策”的一般和基本的特征是超级大国应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一种对抗手段----由那些渴望从全球大资本的轭中，尤其是美帝和苏联修正主义的轭中将自己解放出来人们所发动的革命。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寻找一条走出深渊的道路，即使只是暂时的。当然，美帝正在努力寻找出路，并找寻可能的机会来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北约盟国、中国以及其他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协调。卡特呼吁东方、西方和欧佩克【2】成员国共同努力，有效地帮助较贫穷的国家。美帝试图把这种合作表现为战争的唯一替代品、停止战争的唯一途径。

卡特在演讲中表示，今天“我们已经从对共产主义的持续恐惧中解放出来，这种恐惧曾一度导致我们拥抱每一个被同样恐惧困扰的独裁者”。当然，当卡特—我们时代最血腥的帝国主义的忠实代表—讲出“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恐惧”时，他指的是那些像南斯拉夫式、赫鲁晓夫式、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只是披着一层共产主义的皮。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还没有，也永远不会丧失对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恐惧。相反，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总是害怕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且他们将更害怕共产主义。正是这种恐惧和畏缩，促使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互相投入对方的怀抱，互相协调，寻求最适当的形式，以便延长它们的压迫和剥削统治的存在。

在这些深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危机笼罩的时刻，美帝试图巩固帝国主义的胜利，通过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前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的背叛来获利，并使它们成为阻止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解放斗争的一堵屏障。

美国总统还承认，过去，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拥护和支持法西斯独裁者，如墨索里尼、希特勒、裕仁、佛朗哥等。法西斯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世界帝国主义反对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武器。

美国总统满怀信心地宣称，共产主义(即修正主义)国家已经改变了它们的面貌，在这一点上他坚信自己没有错。他说：“这个体系不可能永远不变。”当然，他混淆了修正主义的背叛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帝认为赫鲁晓夫的苏联制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胜利，并由此推断，与苏联发生冲突的威胁已不那么强烈，尽管它并不否认与苏联之间存在着争夺霸权的矛盾和竞争。

卡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维持现状。换句话说，这意味着美帝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将努力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这种现状下，他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与友好国家和盟国一道，能够解决可能存在的分歧，而事实上，确实奏效了。

最后，卡特说，“美国的政策必须建立在一个新的、更广泛的全球、地区和双边利益的基础上”。在分析了这种新的、更广泛的全球、地区和双边利益的“不同要素组合体”之后，他重申，“美国将

会以它对北约所有的承诺为荣，北约必须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因为美国与大工业化民主国家联盟是必不可少的，它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价值，正因此我们更应该为争取更好的生活而奋斗。”

可见，美国也正在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中国修正主义者和“工业化的大民主国家”一道，努力创造一个“新现实”，一个“新世界”。换句话说，美国正在通过煽动，使其政策适应新的局势。为了保持现状，阻止苏联霸权主义的前进，削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赢取中国，它越来越致力于帝国主义阵营建设；为了平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美国必须做出一些虚假的政治让步。但在军事问题上的让步则一点没有，在使国家和人民处于奴役和控制之下的政策中，在利用其他国家的财富来支持自己的工业化的政策中，没有任何让步。

这是美国的新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绝不是一项新的政策，而是一项旧的掠夺性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残酷剥削人民及其财富的奴役政策，一项镇压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政策。美帝现在要给这一旧的、永久的政策涂上一层据说是新的、崭新的油漆，使反革命分子，不论是否当权，都有武器来对付共产主义------使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思想。

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相反，美帝仍然在进攻。它正在努力维护它的旧联盟，并创造对它自己有利和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或任何其他可能威胁到美帝力量的人不利的新联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正在努力增强北约实力，北约一直是并仍然是一个扮演积极角色的政治和军事组织。

美国在其所有战略行动中没有使其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到一定程度，而是继续与苏联进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3】，尽管卡特曾表示，美国将继续生产中子弹。尽管如此，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维持现状的明显趋势。

当然，美国和北约正在努力维持这种与苏联的现状，与此同时，他们有矛盾，但这些矛盾还没有达到足以证明中国有关欧洲战争迫在眉睫的论调是正确的程度。

目前，美帝正在支持中国，使中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更加强大。美国资本正大举涌入中国。在中国，不仅是主要的美国银行，还有美国政府，都在通过信贷进行大规模投资。美国正在大打中国牌，但同时也在两面下注。与此同时，它也在继续打出日本的牌。美国本身和日本之间想要细水长流般的和睦，希望他们之间的援助是相互的，这样，按照美国的目标，日本将得到加强，成为远东太平洋、东南亚的一个以色列，如果有必要，在时机成熟时，最终在与中国的对抗中也会成为以色列。

这就是中国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4】的情况。但是，从许多角度来看，这个条约已经开始对世界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危险和丑恶的影响，将来也会如此，因为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将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建立，创建单独的和联合势力范围将作为其目标，尤其是在亚洲、澳大利亚和整个太平洋地区。当然，这种合作将在同美国结盟和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宣传战的阴影下建立。中日同盟的主要目的是遏制和削弱苏联，把它从西伯利亚、蒙古和其他地方驱逐出去，消除它在整个亚洲和大洋洲以及对所有东南亚国家联盟【5】成员国的影响。

这是美帝的战略，同时也是中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美国将尽力协助中国和日本，使它们处于它的指导下，加强与它们的联盟，并把它们丢向苏联对抗前线。但还有一种可能性，也许有朝一日，中国和日本追求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精神所奉行的邪恶、虚伪、建立帝国和无原则的政策，将使他们掉过头来反对帮助他们恢复的超级大国，就像德国在过去所做的那样，当它们成为可怕的法西斯强国时，会攻击美国的盟友，甚至与后者开战，就像希特勒时期德国那样。

美国将努力在中国力量和正在崛起的日本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但某一个晴朗的早晨，这种平衡将从它的掌握中溜走，中日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联盟将成为一个不仅是苏联，还有美国本身的威胁，因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集中在它们在亚洲和其他地方的统治目标上，集中在削弱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目标上。

在北约中，美国占有主导地位，具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然而，尽管它是统一的，在北约内部，从其各成员国的影响和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眼中的存在的观点出发，已经开始出现分化。

在本组织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年比一年强大。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以及武器贸易都超出了欧洲共同市场的范围。现在我们可以说，西德的政策具有极权主义法西斯复仇主义的特点，谋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这既不适合英国，也不适合法国，这是美国最初在北约的两个主要伙伴。

西德寻求两个德国国家的统一，以创建一个强大的具有极深的军事潜力的国家，这将会威胁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如果发生全面的战争，再与日本和中国结盟，就可能成为整个世界的威胁。它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密切。在欧洲国家中，它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占有主要地位。西德是欧洲最大、最强大

的对华信贷、技术和现代武器供应商。

英法两国对中国也很感兴趣，因此正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然而，中国对波恩【6】更感兴趣。这让英国和法国感到担忧，因为变得更加强大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可能会比北约和欧洲共同市场的其他伙伴更具统治力。因此，我们注意到，英国和法国政府都谈到了与中国的友谊和关系，但他们也没有忘记强调，他们也想进一步发展与苏联的经济和友好关系。波恩也这么说，但它正在迅速发展与把自己视作苏联主要敌人的中国的关系。施特劳斯【7】周围的法西斯集团，希特勒时代的将军，波恩真正强大的复仇主义者，公开宣称自己是中国最亲密的盟友。因此，中国并不像法国和英国那样看待联邦德国。

注：

【1】译者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1950 年开始南斯拉夫在工人自治基础上逐步确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制度，反修正主义者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

【2】译者注：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石油生产国为协调成员国石油政策、反对西方石油垄断资本的剥削和控制而建立的国际组织，1960 年 9 月成立。

【3】译者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简称 SALT，指在美苏两国之间举行的一系列谈判会议，意在达成双方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

【4】译者注：1978 年 8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出席，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圆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条约简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或“中日友好条约”。

【5】译者注：1967 年 8 月 7—8 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

【6】译者注：西德的首都

【7】译者注：似指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1915—1988，西德右翼政客，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略

赫鲁晓夫在夺取了苏联的国家政权后，就把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恢复资本主义和把苏联变成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作为他的主要目标。

在斯大林死后，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赫鲁晓夫和周围的组织首先发动攻击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开始通过攻击斯大林，把世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捏造的一切污蔑都指摘到他身上方法来废黜列宁主义。因此，赫鲁晓夫成为反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革命的资本主义愿望的代言人和执行者。他们开始有系统地清算苏联的整个社会主义结构，他们将苏维埃制度自由化，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改造成资产阶级国家，把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改造成资本主义经济文化。

苏联从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战略和战术。赫鲁晓夫制定了一项政策，使他们能够用列宁主义的措辞来掩饰他们的一切活动。他们把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加以修饰，把它当作新时期的马列主义来欺骗无产阶级和人民。因此，他们可以告诉国内外的共产主义者，“在世界发展的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条件下，苏联的革命正在继续。”，这场革命不仅在那里被宣传成继续，而且据他们说这个国家正在进入建设一个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党和国家会消亡。

共产党被剥夺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身份，被剥夺了国家和社会唯一的政治领导机构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由官僚和克格勃【1】控制的政党。苏联修正主义者把他们的党称为“全体人民的党”，把它缩小到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党，而是新苏维埃资产阶级的党。

另一方面，苏联修正主义者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把“同美帝的和平竞争”作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取得胜利的道路。他们还宣布，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变成还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以外的其他方式取得胜利。他们认为，国家权力可以通过改革，以和平、议会和民主的方式获得。

赫 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为赌注，竭尽全力将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即在所有领域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修正，强加给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他们要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采取这种修正主义路线，把自己变成反革命的政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盲目工具，为资本主义服务。但这并没有完全达到他们的期望。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一贯执行马列主义和捍卫其纯洁性方面仍然毫不动摇。在这些时刻，也有一些其他的党，不是纯粹出于马列主义的原因，动摇了，没有完全接受赫鲁晓夫的方针，而有些党不情愿地接受了，但后来还是服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也反对赫鲁晓夫主义，但事实表明，它的出发点和目的与促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投身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的出发点和目的完全相反。

随着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掌权，他们也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制定了纲领。同美帝一样，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也以扩张和霸权主义为外交政策基础，方法为军备竞赛、高压和讹诈，以及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侵略。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建立社会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统治。

在东欧国家，苏联正在实施典型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这些国家的经济已变成苏联经济的附属物。《华沙条约》【1】服务于苏联，使这些国家处于它的控制之下，使它能够在那里驻扎大量军队，这与占领没有什么不同。《华沙条约》是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高压、勒索和武装干涉政策服务的侵略军事条约。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同体”、“社会主义分工”、“有限主权”、“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等理论也服务于这种新殖民主义政策。

但是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并不满足于它对附庸国的统治。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苏联现在正在争取新的市场，争取势力范围，在各国投资，垄断原料来源，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扩展其新殖民主义。

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有一个完整的战略计划，包括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思想和军事活动，目的是扩大它的扩张和霸权主义。

与此同时，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正在用与美帝完全相同的手段和方法来破坏人民的革命和解放战争。通常，社会帝国主义者通过他们的工具——修正主义政党来运作。但是，根据场合和情况，他们还试图贿赂不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提供奴役经济的“援助”，以便在这些国家立足，煽动不同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支持一方或另一方，组织阴谋和暴动，使亲苏联政权掌权，甚至采取直接军事干预， 像在古巴，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地方一样。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援助和支持革命力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借口，进行干涉和霸权主义、新

殖民主义的活动。实际上，他们帮助反革命。

修正主义苏联试图通过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奉行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政策的国家，作为新的民族国家、不发达国家的盟友、朋友和捍卫者等面貌，开辟实现其扩张主义、新殖民主义计划的道路。苏联修正主义者鼓吹通过与苏联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建立联系，这些国家在自由和独立的道路上，甚至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都能取得成功。他们宣称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还炮制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倾向国家”等理论。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略，不管他们装什么样子，都与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掠夺性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它想把它的霸权和统治扩展到所有大陆上的所有国家。

修正主义苏联所奉行的这种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必然与美国所奉行的和中国也已开始实行的政策发生冲突。这是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分裂斗争中的利益冲突。正是这些利益瓜葛,让一个超级大国对抗另一个超级大国,推动它们使用所有的力量和手段处理削弱其竞争对手或竞争对手们,尽管冲突尚未恶化到武装冲突的程度。

注：

【1】译者注：国家安全委员会（KGB），1954 年 3 月改组而来，是臭名昭著的苏联情报机关。

【2】译者注：1955 年西德加入北约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东德）签署了《华沙公约》，该条约由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起草，1955 年 5 月 14 日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署。

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战略

种种发生的事件和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国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泥潭。在这条道路上，它正在努力实现自己国家层面的一系列战略目标。

在国家层面上，中国社会帝国主义设定的任务为消除一切解放后可能会采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元素，并确立基层和上层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在本世纪末实现所谓的工业，农业，军队和科学的“四个现代化”，来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中国社会帝国主义者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国家内部组织机关，以确保中国新老走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中国修正主义企图以法西斯主义的方式，通过棍棒和压迫来建立这个组织和这种统治。它正在努力在军队和基层群众之间建立统一关系，以便后者为这支压迫人民的军队服务。

最引起中国领导人注意并可能在中国实施的形式和方法是铁托分子的形态和方法，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中国各部门和各界人士组成的许多委员会和代表团都被派去实地研究这一制度和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大体的经验。

这一制度的实施和实践已经起步。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不可能不看到铁托“自治”的失败，不可能不考虑到他们的国家的情况与南斯拉夫的情况完全不同。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有必要借鉴资本主义的许多形式和方法，他们认为这些形式和方法在美国、西德、日本和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已经证明了它们的“有效性”。显然，中国正在建立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将是各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中国传统形式方法的混合体。

中国修正主义要成为资本主义大国，需要一段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的召开，就是与这种必要性相联系的。确保这样的秩序。一方面要求建立法西斯独裁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党和国家历来存在的对立集团之间的相互和平与妥协，也必须毫不动摇地保持下去。时间将告诉我们，这种秩序与和平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证。

在把中国变成超级大国的政策中，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从美帝以及作为美国盟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获得经济和军事利益。

执行这一政策的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美帝方面，它认为中国的这一政策是对其维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加强新殖民主义、镇压革命和扼杀社会主义以及削弱其对手苏联的战略的极大支持。

正如卡特所宣称的，美帝想要与中国紧密合作。他强调：“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的核心要素，中国是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中国主张同美国尽可能密切地和平共处。有了这些观点和立场，中国就可以同那些以美帝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站在一起了。中国向帝国主义的转变，同苏联和以前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正日益成为现实。甚至帝国主义者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为这一“新现实”感到高兴，宣布“美国、苏联和中国意识形态冲突分裂相比 50 年代正在越来越不尖锐，世界越来越需要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

美帝就像卡特总统宣布的那样，愿意向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中国加强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他们在拍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的马屁，因为中国的战略是对美帝霸权目标的重要援助。

中国赞赏美国反对修正主义苏联的观点和行动，因为他们想要表明他们是为革命服务的，是为了削弱世界上最危险的大国苏联。就美国而言，美帝也赞赏中国反对修正主义苏联的观点和行动，因为正如卡特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所言，“中苏冲突创造了一个更多元化的全球结构”，美帝更喜欢它，并认为这与它的“世界应该如何组织”的概念相一致，或者换句话说，其他国家应该如何被煽动去互相残杀，以使美国更容易统治世界的概念。

中国的实用主义和唯利是图的政策，使其成为美帝的盟友，并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敌人和威胁。今后，从逻辑上讲，当中国意识到它已经达到了削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目标时，当它看到美帝越来越强大时——因为它需要依靠一个帝国主义去攻击另一个帝国主义——它就会站在另一边继续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对中国来说可能变得更危险，而中国就必然自动改变其以前的立场。

这是符合实际的。1956 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修正主义者把美帝视为主要威胁。后来，在 1969 年 4 月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宣布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两个超级大国构成了主要的威胁。后来，在 1973 年 8 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宣布只有苏联是主要敌人。这样的摇摆不定，这样实用主义地实行政策，如果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二次或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站出来支持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并宣布美帝为主要敌人，

也并非不可能。这样的状况将继续,直到中国达到了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强国的目标。如果是这样,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它的作用永远不是革命的，而是倒退的，反革命的。

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日本结盟。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种族主义联盟最近签署了《中日友好条约》，其目的是实现中日共同统治亚洲、东盟国家和大洋洲的战略计划。中国的修正主义者需要这个条约，需要和日本的友谊，这样他们就可以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一起对抗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并寻找机会消灭它及其在亚洲的影响。

但中国也希望利用与日本的关系获得信贷,从日本进口设备、技术和武器,以实现自己的大国抱负。中国十分重视同日本的全面经济合作，一半以上的对外贸易是与日本进行的。

为了实施扩张主义政策，社会帝国主义的中国正在努力扩大其在亚洲的影响力。目前它在印度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在印度,美国和苏联在未来可能带来的变化与结盟的背景下,有着各自的和共同的利益。现在，中国希望同印度开始改善外交关系。

但是印度对西藏有很大的野心。印度将试图清除中国在巴基斯坦可能拥有的那一点点影响力，因为巴基斯坦处于伊朗和阿富汗两侧的战略位置。美帝在中东石油产区占主导地位，围绕此处的竞争始于此。中国很难在那里立足。中国将奉行一项违背阿拉伯人民利益、支持美国利益的政策，直到它变得强大为止。与此同时，中国将帮助美国与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一道，在这一对美欧帝国主义至关重要的地区建立一道强大的屏障，阻止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渗透进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社会帝国主义者正把目光投向西欧。他们的目标是使西欧与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持北约、欧洲国家联盟与美国的欧洲共同市场和“欧洲联盟”。

在其战略计划中,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的目标是将其影响力和霸权扩展到它所称的“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理论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不是以梦想家的身份宣扬这一 "理论"，而是有明确的霸权主义目的，即中国应称霸世界。他的继任者都遵循和毛泽东、周恩来相同的战略。

中国的战略雄心也延伸到了所谓的“不结盟世界”【2】，这是铁托主义所提倡的。这些“世界”之间没有区别，互相重叠着。很难区分哪些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它们与“不结盟国家”的区别是什么，哪些国家属于“不结盟国家”，它们与“第三世界”的区别又是什么。因此，无论它们被称为什么，它们都是相同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重视与铁托和南斯拉夫在思想、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领域保持非常友好的党和国家关系的原因之一。

中国修正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共同意见并不妨碍他们利用这种友好关系,达成自己的特殊目的。

铁托正试图利用华国锋声明出的一系列观点: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马列主义的忠诚、南斯拉夫民族自治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铁托据称在践行马列主义的内外政策；来表明:铁托暴露出的反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者的诽谤——而在此基础上,他正在寻求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声誉。

华国锋方面，他利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在赋予所谓的中国向欧洲开放的政策。中国修正主义者还试图利用与声称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的铁托分子之间的友谊，将其作为渗透到“不结盟国家”并在那里建立统治地位的重要渠道。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时,华国锋把不结盟运动吹上了天，说它是“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不是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他对这场运动和铁托赞不绝口，因为他梦想着控制这场运动，使北京成为它的中心。

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政策，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政策，是反革命和战争的政策，人民会越来越憎恶它，反对它，越来越猛烈地与它斗争。

我们上面谈到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战争贩子，就算今天不拖入，明天也会把世界拖入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

美帝正努力把它的钩喙更深地刺入其他民族的经济中，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刚刚开始伸出
它的爪牙，试图让它们在其他国家植根，只为创建和巩固自己的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业。但还有“欧洲联盟”，它通过北约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它有个别的、而不是集中的帝国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中国也加入了成为超级大国的行列，日本军国主义也站了出来。这两种帝国主义正在结成联盟，以便形成一种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大战的危险就更大了。目前它们的之间的联盟是存在的，它们将会改变方向，而不是其内容(译者注：意思应是这些帝国主义的联盟形式无论怎么变化，本质是不变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联合国和由帝国主义组织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滔滔不绝地讲裁军的漂亮话，很蛊惑人心。可他们制造并保护其对战略武器的垄断，并大规模贩运武

器，不是为了保障各国的和平与安全，而是为了牟取暴利，镇压革命和人民，发动侵略战争。

斯大林曾说：

“各资产阶级国家在疯狂地扩充军备和重整军备。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闲谈，而是为了战争。战争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因为它是重分世界，重分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唯一手段。”（出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译者注）

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正把它们推向战争，它们必然会在“第三世界”、“不结盟”或“发展中国家”之间挑起许多局部战争。

卡特总统表示，战争只可能发生在地球的两个地方，中东和非洲。原因很明显：因为目前正是在世界的这两个地区，美国可获得极大利益。中东有石油，而在富裕的非洲，发展新殖民主义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超级大国之间在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试图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获得新的更高的地位。

然而，除了中东和非洲以外，还有其他超级大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区，比如东南亚。美国、苏联以及中国都在努力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瓜分市场。这也引起了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变成局部战争，这些战争的目的不是解放人民，而是建立或取代代表地方资本的统治集团，这些集团有时是倚仗着一个超级大国，有时是倚仗着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是人民不信任的两个怪物。同样，人民也不信任中国。

当超级大国无法通过经济、意识形态和外交手段实现其掠夺性利益时，当矛盾恶化到最严重的程度时，当协议和改革时证明无法解决这些矛盾时，于是他们之间的战争开始了。人民将会在战争中血流成河，因此，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不让自己被蒙骗，破坏和干扰帝国主义间的掠夺性战争，使它不具有世界性的规模，如果他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就发动解放战争，并取得胜利。

注：

【1】译者注：中共十一大于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进一步揭批了所谓“四人帮”的罪行，并重申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

【2】译者注：不结盟国家是参加不结盟会议的国家。1956 年铁托、纳赛尔和尼赫鲁在南斯拉夫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不结盟的主张。1961 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标志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不结盟运动的宗旨是：主张执行独立自主、和平、中立的政策，拒绝同任何大国结盟；加强成员国的团结和协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实践中，这些宗旨完全落空。

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中，铁托主义和其他修正主义思潮的作用

(注：“在帝国主义... ...”这一段关于铁托的部分参考了b站斯霍之声译文，在此表示真诚感谢)

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和反动派对革命、社会主义和人民进行的野蛮镇压中，他们得到了各派别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支持。这些叛徒和背信弃义者，从内部破坏、分裂和阻碍无产阶级的努力和人民摆脱社会和民族束缚的斗争，协助帝国主义执行它的全球战略。现代修正主义者开始诋毁和歪曲马列主义，混淆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脱离革命斗争，帮助资本，维护和延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制度。

在这场重大而危险的反革命赌博中，南斯拉夫的铁托修正主义者同我们上面提到的苏联修正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一样，发挥着头等重要的作用。

铁托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旧工具，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和解放运动时最喜欢的武器。

南斯拉夫人民为了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牺牲自己同纳粹-法西斯侵略者斗争。他们成功地解放了自己的国家，但没有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革命。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长期以来一直通过情报部门开展秘密工作，并且在战争期间，假装保留了第三国际下属党的特征，但实际上其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与马列主义和南斯拉夫人民在南斯拉夫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背道而驰。

南斯拉夫共产党上台后，继承了许多具有反马列主义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沙文主义特征，这种特征早在战争时期就已显现出来。这些特点在它背离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苏联和斯大林的态度、对阿尔巴尼亚的沙文主义式的立场和行动等方面显而易见。

南斯拉夫建立的人民民主制度是暂时的。它并不适合当权派，尽管这个派别继续自称 "马克思主义"。铁托等人不赞成社会主义建设，不赞成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爆发冲突的根源。这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而不是修正主义者宣称的所谓"过度干涉"之间的冲突。斯大林捍卫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纯洁性，铁托却保护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偏离主义（deviationist）、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追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的白劳德【1】和其他机会主义者的脚步。

在解放初期，南斯拉夫领导人假装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为榜样，并宣称在南斯拉夫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做是为了欺骗已经浴血奋战，并渴望真正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人民。

事实上，铁托分子不代表，也不可能代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苏维埃国家的组织形式，因为铁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代表，他的集团掌握着政权。这个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种"社会主义已在南斯拉夫建立"的观念，这是一种“带有人性面孔的”的“特定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五纵队，一切都是英美帝和铁托集团精心策划和协调好的。因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玩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游戏，并与之妥协，从而使自己与苏联对立。

从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为了追求他们的旧制度，英国和随后的美帝不仅帮助铁托与苏联决裂，而且还开展了破坏苏联的行为，特别是努力将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以便将苏联与所有这些国家隔离开来，并将它们与西方联合起来。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铁托主义的政策。

狂热的反共老手丘吉尔直接地以个人身份参与来确保铁托和他的团体为资本主义服务。在战争期间，他派出了他最信任的朋友，正如英国领导人所说的，以及后来他自己的儿子，来担任铁托的工作人员。最终，他自己在 1944 年 5 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与铁托会晤，以确保铁托不会耍花招。在他的回忆录中，丘吉尔写道，在与铁托的会谈中，后者表示愿意之后发表一份公开声明，称“战后南斯拉夫不会建立共产主义”。

铁托以巨大的精力为他的主人服务，丘吉尔赞美了他的"伟大"的服务，并告诉他：“现在我明白你是对的，所以我和你在一起，我比以前更喜欢你”。这就好像一个情人对他的爱说出的最温暖的誓言。

几乎在南斯拉夫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完全决裂之前，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向南斯拉夫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政治、思想和军事援助，这种援助后来变得更加频繁。

提供这种援助的条件是该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并不反对南斯拉夫继续披着社会主义的皮，相反，南斯拉夫应该保持其外在的社会主义色彩，因为这样它将成为反对社会主义和解放

运动的一个更有效的武器，这很符合南斯拉夫的利益。这种“社会主义”不仅与列宁和斯大林所设想和实践的社会主义有根本上的不同，甚至会站出来反对列斯的社会主义。

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南斯拉夫成为美帝的“社会主义”喉舌，是一个协助世界资本的间谍破坏机构。从 1948 年到今天，铁托主义的特点是狂热地反对马列主义，在世界各地组织宣传运动，将南斯拉夫体系假装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秩序，“新社会”，一种“不结盟社会主义”，不再像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尝试并且正在产生“辉煌的成果”。这种宣传的最终目的是引导世界各地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人民和进步力量走到一条死胡同。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采取托派和其他受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鼓励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列宁时期于苏联采取的治国方式，目的是破坏那里的社会主义建设。铁托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采取了这些形式，以完全歪曲马列主义的工农业建设原则。

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具有行政和组织政治领导的特点，以致民主集中制被消灭，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作用变得无足轻重。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看起来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名字，但在内容、形式、能力和目标上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联盟成为一个没有骨气的前锋，被剥夺了马列主义政党的特征，保留旧的形式，但不再扮演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角色，不再是领导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力量。但是，根据铁托修正主义者的说法，南共盟据称只需承担一般的“教育”功能。

铁托集团的领导层将南共盟置于国家安全管理局【2】的控制之下，将其变为情报机关的隶属，变为法西斯斯组织，并将国家变为法西斯专政。我们完全清楚这些活动的巨大危险，因为科奇•佐治【3】，被铁托集团收买的代理人，试图在阿尔巴尼亚实现同样的目标。

铁托、兰科维奇【4】和他们的机构完全清算了任何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真正色彩的事物。铁托主义对那些企图消灭这个机构、这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组织的内部分子进行了激烈的镇压，并反对在国外进行的一切旨在揭露这个冒充社会主义政权本质的马列主义宣传。

铁托集团迅速放弃了早期开始的农业集体化，建立了资本主义国营农场，鼓励在农村发展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恢复了富农分子的名誉，把土地抛向私人市场，使资本主义势力在城镇中繁荣发展，并进行了第一轮加强资本主义经济方向的改革。

与此同时，铁托资产阶级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形式来伪装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形式被发明出来，他们称之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他们将这个制度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声称这种制度是最真实的社会主义。

起初，“自治”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出现，之后扩展到国家组织领域和该国所有其他生活领域。

南斯拉夫“自治”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列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公然否定。“自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无政府-工团主义形式，在它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依赖于国际资本。

“自治”制度，具有民主集中制的消灭、国家统一管理的作用的消灭、无政府主义的联邦制、"反国家"意识形态等典型特征，带来了永久性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带来了各共和国、各地区的薄弱而不平等的发展，巨大的社会阶级差异，民族仇恨与压迫，以及精神生活的堕落。它带来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分裂，让他们的不同分支进行恶性竞争，促进了资产阶级小团体、地方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不仅没有在国家和社会中发挥支配性作用，“自治”制度反而使其处于甚至无法捍卫自己的一般利益的状况下，使其丧失了作为一个紧密联合的阶级进行行动的可能。

从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从美帝，大量的资本以投资、信贷和贷款的形式涌入南斯拉夫。正是这种资本构成了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仅其负债就超过 110 亿美元。南斯拉夫从美国获得了 70 多亿美元的信贷。

尽管铁托分子领导人从国外得到了许多荣誉，但南斯拉夫人民并没有享受，也没有享受到这种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辉煌成果”。相反，南斯拉夫存在着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造成国内大规模失业和大量劳工移居国外的制度在盛行，这使南斯拉夫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列强。南斯拉夫人民正在被疯狂剥削，以符合当权阶级和在该国投资的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南斯拉夫领导者并不关心物价每天都在上涨，工人阶级的贫困不断增加，国家不仅债台高筑，而且还深深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危机中。南斯拉夫只有有限的独立和主权，因为抛开外在因素，它本身完全没有经济潜力。它的大部分资产存在于与各种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共同所有权中，因此必然会遭受危机和外国剥削

的破坏性影响。

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给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提供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世界资本主义给予南斯拉夫“自治”这样巨大的政治和财政支持，并与铁托的宣传协调一致，将这一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式”向全球各国进行宣传，这并非偶然。

这样做是因为南斯拉夫的“自治”形式提供了一种从思想上政治上颠覆和破坏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解放运动的方式，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渗透开辟了道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希望将自治作为不同国家的后备制度，资本主义牺牲人民的利益，努力寻找各种形式的政府，以便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南斯拉夫的“不结盟”理论和实践，使帝国主义者们受益匪浅，因为这些理论和实践帮助帝国主义者更好地欺骗人民。这既符合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也符合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在“不结盟国家”中树立和增强自己的影响，把爱好自由的人民从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引开。因此，卡特、勃列日涅夫和华国锋，大肆赞扬铁托分子的“不结盟”政策，并试图利用这一政策达到自己的目的。

铁托主义一直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武器，是扑灭革命火焰的“灭火器”。它与现代修正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目标是一致的，在意识形态上是统一的。他们同马列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作斗争的方法、形式和策略是不同的，但是反革命的目的是相同的。

在资产阶级和反动派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斗争的猖狂行动中，欧洲的修正主义政党和其他大陆各国的修正主义政党，首当其冲，不遗余力地为虎作伥。

西欧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正在努力编造一种关于“新社会”的理论，他们标榜为是社会主义类型的，这将通过“体制改革”以及与社会民主党、甚至右翼政党的紧密合作来实现。他们认为，这个“新社会”将通过“社会改革”、“社会和平”、“议会道路”和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性妥协”，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

欧洲修正主义政党，如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修正主义政党，以及紧随其后的所有其他西方修正主义政党，都否认列宁主义、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都走上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他们将这条反马克思主义路线命名为“欧洲共产主义”【5】。“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伪共产主义思潮，它既反对也不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集团。这种摇摆不定的立场可以用他们的目标来解释，即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在欧洲大锅中“沸腾着的”各种观点共存。“欧洲共产主义者”可以团结任何一个人----除了那些为革命的胜利和马列主义思想的纯洁性而斗争的人。

一切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都在不遗余力地帮助超级大国进行他们的罪恶活动，镇压革命和人民。所有这些思潮支持资产阶级所谓的改良只有一个目的:通过对革命设置一千零一个物质、政治和意识形态障碍来扼杀革命。他们正在努力使迷惑和分裂无产阶级及其盟，因为他们知道，由于派系斗争而分散和分裂，后者将无法在国内或国际上建立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对于对抗世界资本主义腐朽的攻击是必不可少的。

现代修正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联盟害怕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特别是在某些受到极右势力威胁的国家。为了避免法西斯专政，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努力在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面中“缓和”矛盾，“减弱”阶级斗争。因此，为了确保“社会和平”，这些联盟的主体不得不相互让步，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达成妥协，就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政体达成协议。因此，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公开继续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修正主义政党却竭力歪曲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

改良主义工会，特别是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工会，他们与统治阶级妥协，只为了经济利益而罢工，而不是为了政治要求和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目的而罢工，工会已成为欧洲修正主义政党的中坚力量。当然，他们讨价还价的目的是在需求和出价之间取得平衡——一方乞求施舍，另一方决定施舍的规模。改革主义工会和修正主义政党，以及拥有政党、国家权力和工会的统治阶级，都受到革命、无产阶级及其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威胁。因此，他们在寻求一种反动的妥协，一种不可能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一样的解决办法------原因是各个国家的资本的力量不同，危机的深度不同，内部矛盾的程度也不同。

注：

【1】译者注：白劳德（Earl·Browder），1891——1973，1934 年任美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35～

1940年任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上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道路，1944 年5月在美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美国共产党，另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自任会长。1946年2月，威廉•福斯特重建的美共将其开除出党。

【2】译者注：南斯拉夫国家安全局（UDBA）,1946年由兰科维奇改组的情报组织，拥有庞大的秘密警察网络。

【3】译者注：克奇・佐治（Koçi・Xoxe），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1937年成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受到南斯拉夫支持。在苏联、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决裂后，1948年因被当作“铁托集团的代理人”而开除出党。1949年以“企图并实行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被判处绞刑。

【4】译者注：兰科维奇（Aleksander Rankovic）1902——1983，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副总统。1966年9月14日，被塞共盟开除出党，同年10月南共盟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将兰科维奇开除出南共盟的决定。

【5】译者注：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由欧洲旧共产党推行的一种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1975年7月意共与西共举行双边会谈并发表宣言,同年11月意共与法共会谈并发表共同声明，被认为是欧洲共产主义正式形成的标志。1977年 3月，意共、法共、西共领导人在马德里会晤，通过《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被称作“欧洲共产主义的宣言”。

革命———战胜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阴谋诡计的唯一武器

一切敌人，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者和各种修正主义者，无论联合起来还是单独地，都在进行斗争，误导进步的人民，败坏马列主义的名誉------特别是歪曲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镇压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人民抵抗和民族解放斗争。

马列主义的敌人有充足的战斗力，但是革命的力量也十分强大。这些力量同敌人进行着煽动、抵抗和斗争等活动，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和反动派们的安定，使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出自《共产党宣言》——译者注）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至今仍然有效。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带来的危机已被消灭，因为它们认为革命因修正主义的背叛而遭受的沉重打击的是无可救药的，他们低估了马列主义的力量，高估他们所拥有的物质、压倒性的的军事和经济潜力。这只是他们的痴心妄想。世界无产阶级正在集结力量。无产阶级和爱好自由的人民，从他们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对铁托分子、赫鲁晓夫派、中国人、“西欧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背信弃义，日益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时间是为革命而工作，为社会主义而工作，而不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工作，不是为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工作。革命的火焰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被压迫人民的心中燃烧，他们要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和主权，要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消灭帝国主义和它的仆从。

列宁时代的现象-------脱离第二国际之后，创立了新的马列主义政党，今天仍在发生。修正主义的背叛，在任何地方都必然导致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和加强，这些政党高举起马列主义和革命的旗帜，而修正主义者却拒绝这些旗帜，把这些旗帜践踏在泥中。他们把反对光荣的列宁主义革命战略和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的重担，交给了他们计划的世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全球战略。这样，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斗争的目标和正确道路，充分认识到斗争所必需的牺牲，团结、组织、领导和带领人民群众走向胜利的重任，就落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肩上。

我们马列主义者，站在一场伟大的斗争中的前沿。这场斗争由当今的无产阶级和渴望自由的被压迫人民发动，一方面，对抗野蛮贪婪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这也要求在战斗中必须彻底了解共同敌人或不同国家中的个别敌人使用的目标、策略、方法和形式。如果我们不能坚定地忠于马列主义，我们就不能对这些明察秋毫。我们必须看到在目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的链条上有一系列薄弱环节，将来也会有薄弱环节，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和人民必须进行不断的活动，进行不屈不挠和勇敢的、有组织的斗争，一个接一个地打破这些环节。当然，这需要工作、奋斗、牺牲和自我否定。勇敢的个人和人民，在革命利益的激励下，能够而且必将直面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反动派的互相联系的强大威胁，建立新的共产主义联盟，并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正是革命者、马列主义者、各大洲各国人民的不懈斗争，才给反动势力造成了困难的局面。

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都没有理由害怕一段时间以来在革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毫无根据的谬见。共产党员必须争取那些犯错误的人，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改过自新，当然不能自己陷入机会主义。原则斗争的过程中，一开始会有一些人摇摆不定，但是，只有犹豫不决的人才会动摇，而在坚决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人之间，在正确认识自己国家、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利益的人之间，不会发生动摇。不过，当动摇的人看到同志们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主张，他们的斗争性就会进一步加强。

如果马列主义根据目前的国际条件和各国的国情，被正确地、坚定地运用，如果他们不断地加强各民族无产阶级的统一，在残酷地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派别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他们一定能够克服他们在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不管这些困难有多大。马列主义及其不朽的原则，如果运用得当，将无法逆转地将世界资本主义埋入坟墓，带来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从而使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第二章

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仍保持完整有效性

在当前形势下，赫鲁晓夫分子、铁托分子、“欧洲共产主义者”、中国修正主义者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形势变化为借口攻击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这种情况下，深入研究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著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必须回到这些著作上来，对列宁天才的著作提出的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进行十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仔细研究这部著作，我们就可以看到修正主义者们以及为他们一员的中国领导人是怎样歪曲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是怎样理解帝国主义的目的、战略和策略的。他们的著作、宣言、立场和行动表明，他们对帝国主义性质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是站在反革命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观察帝国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各党派和他们的思想家考茨基及其同伙也是如此，列宁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列宁的这些著作，忠实地坚持他天才的分析和结论，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当下，帝国主义完全保留着列宁描述的相同的特点，这样，列宁主义把我们的时代定义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无可动摇的，而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胜利也是必然的。

众所周知，列宁从生产、资本集中和垄断这几个方面开始分析帝国主义。今天，同样，只有在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之基础上，才能正确、科学地分析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现象。

当今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日益集中，这导致了实力强大的企业兼并或吸收小企业。其结果是，劳动力大量集中在大型托拉斯和康采恩手里。这些企业还把巨大的生产力和不可估量的能源和原材料集中在它们手中。目前，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也在利用核能和最新的技术，这些技术的所有权完全归于这些企业。

这些大企业组织具有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他们弄垮了大多数小企业主或实业家，而在国际上，他们已成长为巨大的康采恩，垄断许多国家的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交通等各个部门。无论这些康采恩延伸到哪里，无论生产被少数千万富翁和资本家集中在什么地方，小企业主和实业家被清算的趋势都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和明显。这就又导致垄断进一步加强。

*“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列宁说，*“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译者注）

谈到帝国主义的这一特点，他补充说，

“…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译者注）

资本主义在当今条件下的发展，充分印证了列宁的上述结论。垄断已成为当今社会最典型、最普遍的现象，它决定了帝国主义的面貌和经济本质。在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生产的集中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例如，1976 年，美国有近 1700 万人，占就业人口的 20%以上，受雇于美国最大的 500 家公司。百分之六十六的商品来自这些公司。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上只有一家美国大公司，那就是“美国钢铁公司”，股票资本总和超过 10 亿美元，而 1976 年价值达到亿万美元的公司数目大约是 350 家。1975 年的时候，通用汽车公司，这个超级垄断企业，总资本超过 220 亿美元，剥削了近 80 万名工人；接下来是新泽西州的垄断企业标准石油公司，该公司主导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石油工业，剥削了 70 多万工人；在汽车工业中有三大垄断企业，占该部门产量的 90%以上;在航空和钢铁行业，四家大公司分别占到 65%和 47%的产量。

同样的过程已经并且正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发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3%的企业集中了全国 50%的生产和 40%的劳动力。在英国，50 家大型垄断企业主宰着一切。英国钢铁公司钢铁产量占全国钢铁产量的 90%以上。在法国，两家公司将四分之三的钢铁生产集中在他们手中，四家企业拥有全部的汽车生产，而另外四家控制着石油产品的全部产量。在日本，十家大型黑色冶金公司(译者注：黑色冶金工业指铁（也包括锰、铬、钛和钒）和铁合金的生产)生产全部生铁和四分之三以上的钢铁，而八家公司垄断了有色冶金。其他行业和部门也一样。(资料来源:《统计月报》，联合国，1977 年;《统计年鉴》，1976 年;美国《财富》杂志，1976 年；等等)

在这些国家仍然存在的中小企业直接依赖于垄断者。他们接受垄断者的命令并为他们工作;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信贷和原材料、技术等。实际上，它们已成为垄断企业的附属物。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造成了无技术差别的巨大垄断，这在今天是普遍存在的。企业及其工业生产、建筑、运输、贸易、服务、基础设施等全部分支部门，都在这些巨大的“联合企业”垄断下运作。从儿童玩具到洲际导弹，他们生产一切。

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已经增加和正在不断增加的经济实力，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情况：竞争的受害者不仅是“小婴儿”----也就是过去典型的非垄断企业，甚至可能波及到大型金融企业和集团。由于垄断企业对高垄断利润的贪得无厌和竞争的极度激烈，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一进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并购规模是二战前的 7 到 10 倍。

工业、贸易、农业和银行企业的联合与合并导致了新形式的垄断与大型工商型或实业型公司的创立，这种形式不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过去，垄断者是在其他独立公司的帮助下进行货物运输和联合销售，而今天，垄断者控制着生产、运输和销售。

垄断者不仅试图消除被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还扩大了他们的魔爪，垄断所有的原材料资源，垄断所有富含铁、煤、铜、铀等重要矿产的地区。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涉及领域的扩大和发展，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呈现出巨大的规模。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指国家机器服从于垄断和垄断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统治的确立。这样，国家为了金融寡头的利益，直接干预经济，通过剥削全体劳动人民，保证当权阶级的最大利益，并扼杀革命和人民的解放斗争。

国家垄断财产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具特色的基本要素，并不代表一个资本家或一群资本家的财产，而是代表资本主义国家的财产，资产阶级政权的财产。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部门占总产量的 20%至 30%。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表着生产和资本的最高集中阶段，是今天在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财产的主要形式。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为当权的新资产阶级服务的。

在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例如确立在企业中以利润挂帅，在组织、管理和报酬方面运用资本主义方式，建立经济特区、类似于苏联、南斯拉夫和日本的托拉斯和联合企业，向外国资本敞开大门，与外国垄断企业建立直接联系，等等，经济呈现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形式。

目前，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中，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垄断已达到国家级水平。欧洲共同市场、经互会【1】等代表着各帝国主义列强垄断的联盟，实际上也推动和实现了这一趋势。

在分析国际垄断的形式时，列宁谈到了卡特尔和辛迪加。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今天，垄断资产阶级也找到了剥削劳动人民的其他形式，即跨国公司。

从外表上看，这些公司试图给人一种它们由许多国家的资本家共同拥有的印象。事实上，跨国公司虽然在许多国家开展业务，但就其资本和控制权而言，跨国公司主要属于一个国家。他们通过吸收当地大大小小的公司来进行越来越大的扩张，而这些公司根本无法应对残酷的竞争。

跨国公司设立子公司，并将其企业扩展到那些利润前景似乎最稳定的国家。例如，美国跨国公司“福特”在其他国家建立了 20 家大型工厂，雇佣了 10 万名不同国籍的工人。

跨国公司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依存，这是建立在跨国公司剥削阶级性质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其作为一种工具，为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统治与扩张的目标服务。

由于跨国公司经济上的主要作用和在整个国家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些跨国公司单独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许多情况下，它相当于甚至超过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或生产总和。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通用汽车公司”的产量，比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业产量加起来还要多。他们进行干预，以确保自己在经营所在国享有特殊优惠和特权。例如，1975 年，美国电子产业主们要求墨西哥政府改变其规定了一些保护措施的《劳工法》，否则他们将把产业转移到哥斯达黎加，并为了施加压力，关闭了许多工厂，解雇了近 12000 名墨西哥工人。

跨国公司是帝国主义的杠杆，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主要形式之一。它们是新殖民主义的支柱，并影响到它们遍及的国家主权和独立。为了打开他们的统治之路，这些公司不惜犯罪，从策划阴谋和扰乱经济，到直接收买高级官员、政治和工会领导人，等等。被隐蔽的丑闻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修正主义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并开展业务。他们也开始渗透到中国。生产与

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是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并导致了生产的广泛社会化，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剥削性质。相反，它们增加并加剧了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使他们越来越贫穷。这些现象充分证明了列宁的论点，即在生产和资本集中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

“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但仍然，“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译者注）
垄断企业和跨国公司仍然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大敌。

我们这个时代生产和资本集中过程的强化，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以及其他种种矛盾。今天，正如过去一样，从野蛮剥削工人中获得的巨额收入和超额利润被少数资本主义巨头所侵吞。同样，工业的各个联合部门所配备的生产资料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工人阶级仍然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奴隶，其劳动力也仍然是市场的一部分现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再仅仅剥削几十上百的工人，而是剥削成千上万的工人。由于资本主义对这支庞大的劳动力大军的无情剥削，仅 1976 年美国企业就攫取了超过 1000 亿美元的剩余价值，而 1960 年这一数字为 440 亿美元。

列宁揭露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他们鼓吹有可能消除资本主义中由于垄断的出现和发展而产生的对立矛盾。他以科学的论据证明，垄断作为对劳动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帮助私人占有劳动成果的工具，使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垄断者统治的基础上的。这个上层建筑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维护并代表着垄断企业的掠夺性利益。垄断者支配着国家内部和外部政策、经济、社会、军事和其他政策。

当今生产和资本集中的现实，也暴露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领袖的那一套说教有多么可笑：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资产、托拉斯等可以和平地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今天的垄断资本主义将逐步融入社会主义”。

列宁教导我们，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也是货币资本更加集中的基础，它集中在大银行手中，使金融资本诞生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银行与垄断企业一起，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垄断企业和康采恩的货币资本，还一并吸收了小企业和投资者的资金。这样，那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并为他们服务的银行就成为了主要开展金融手段者。

大企业、卡特尔和垄断集团为了吞并小企业而进行的同样进程也在对小银行一个接一个的清算中发生。为此，正如大企业创造了垄断一样，大银行也创造了银行业康采恩。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一现象已经占据了巨大的比例(译注：这里没有说明是在什么地方占据比例，但根据语意，意思很可能是在经济界中，即清算十分猖獗)，今天，它仍然非常迅速地继续增长。今天的合并和收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仅小银行，而且中型和相对较大的银行遭到这种待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矛盾的日益严重，竞争斗争的扩大和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和货币体系的严重危机。
26 家大型金融集团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最大的是摩根集团，拥有 20 家大银行、保险公司等，占据着 900 亿美元的股本。

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资本集中和垄断的程度也很高。在西德，70 家大银行中的 3 家拥有超过 58%的银行资产。在英国，所有的银行活动都由四家银行控制，这四家银行被称为“四巨头”。日本和法国的银行资本集中度也很高。

列宁证明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是相互联系的。起初，银行对他们借给实业家的贷款的命运很关切。为了确保接受信贷的实业家之间达成协议，避免彼此竞争，银行会进行调解工作，因为银行本身也会受到竞争的影响。这是银行与工业资本联锁的第一步。随着生产和货币资本的不断集中，银行成为生产企业的直接投资者，设立股份制公司。这样，银行资本就渗透到工业、建筑、农业、交通运输、流通领域等各个领域。对这些企业来说，它们购买大量股票，成为银行的参股者。今天，银行和垄断企业的董事都是彼此理事会的成员，从而形成了列宁所说的“私有联盟”。由此产生的金融资本包括各种各样的资本:工业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列宁在描述这个过程时说：

“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译者注）

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资本有所增加，并经历了结构上的变化，但它的目标仍然与它一直以来的目标完全相同，即通过剥削国内外广大劳动人民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近年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保险公司大幅增加，成为银行的竞争对手，它们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例如，在美国，1970 年与 1950 年相比，银行资产增加了 3.5 倍，而同期保险公司的资产增加了 6.5 倍。

通过掠夺人民积累的资产，这些公司得以向垄断企业提供高达数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这样，保险公司就与工业与银行业的垄断企业进行合并、联动，成为金融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

垄断资产阶级在对利润的贪得无厌驱使下，把工人养老基金、人民储蓄等一切暂时可用的货币手段都变成资本。

集中的金融资本不仅从康采恩、小实业家等吸收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润中，而且还从发行证券和提供贷款中获得异常巨大的收入。就像储蓄存款一样，在发行证券和提供贷款中，只有一小部分利润流向了贷款人，而银行本身从这些活动中赚取了巨额利润，通过这些活动，它增加了自己的资本和投资，当然，这就为金融资本创造了源源不断的额外利润。金融资本主要投资工业，但它也将其投机网络扩展到其他地方，如土地、铁路和其他分支机构和部门。

银行确实有可能提供大量的信贷，这是生产高度集中和垄断统治所需要的。这样，就为大垄断联合企业在国内外加紧对劳动群众的野蛮剥削，以保证其最大利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资本主义在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复辟，那里的银行呈现出垄断的所有特征。在这些国家，银行为剥削国内外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就像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顾客购买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分期付款贸易额迅速增长。这种信贷的提供保证了资产阶级市场的商品销售，资本家从高利率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而债务人则被债权人和资本主义公司束缚着手脚。

银行和借贷机构对劳动人民的借款和其他劳动人民承担的债务，目前已大大增加。仅在美国，1976年人民从这种信贷中所欠的债务已达到 1670 亿美元，而 1945 年只有 60 亿美元，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民的债务已超过 460 亿马克。

银行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垄断，导致金融寡头对政治经济的统治日益加强，并利用一系列的形式和方法，增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束缚、贫困和苦难。

金融资本的发展使一小群有权势的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集中了真正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使整个国家的人民都能感受到的力量。这些无所不能的人是垄断企业和银行的领导者，构成了所谓的金融寡头。从大公司现在已经转变为股东公司，甚至一些工人也可能持有一些象征性的股份的事实出发，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声称，资本现在已经丧失了马克思论证“资本”或列宁分析帝国主义时期带有的那种私人性，转而成为了全民的资产。但这是无稽之谈。今天，同过去一样，强大的私营工业——金融集团控制着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有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福特家族、芝加哥、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集团;英国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贝林家族、塞缪尔家族等金融集团；西德有克虏伯、西门子、曼内斯曼、蒂森、格林等;意大利有菲亚特、阿尔法-罗密欧、蒙迪森、奥利维蒂等；法国有众多大家族；等等。

金融寡头作为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拥有者，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确立了对经济和政治的统治。他们甚至将国家机构隶属于自己，将它转变为手中的工具，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金融寡头解散、认命政府，决定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在国内生活中，金融寡头同反动势力和维护其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所有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制度相联系，而在外交政策上，它又保护与支持一切保守和反动势力，这些势力支持它，为它的垄断扩张开辟道路，为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而斗争。

金融寡头，毫不犹豫地利用各种手段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各个领域建立起政治权威。

*“……金融资本，”*列宁说：*“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译者注）

今天的情况证明，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到处都在加剧。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同时，经济和金融的扩张，伴随着政治和军事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修正主义者当下的宣传忽视了这一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不只发生在一个国家，还会发生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中。欧洲共同市场的联合银行，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国际银行，以及经互会的投资银行就具有这种性质。同样，西德-波兰银行或英-罗马尼亚银行、法-罗马尼亚银行或英-匈牙利银行、美-南斯拉夫银行、英-南斯拉夫银行以及其他银行公司的合并，都是资本主义类型的银行联盟。苏联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开设了很多银行，这些银行无论在苏黎世、伦敦、巴黎、非洲、拉丁美洲还是其他地方，都成为资本主义银行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中国也被越来越深地卷入资本主义银行一体化进程的漩涡。除了自己设在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的银行，明天中国还将在日本、美国和其他地方设立银行。与此同时，它正允许帝国主义列强的银行渗透

入中国。

列宁强调，当下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输出，今天帝国主义的这种经济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有美国、日本、苏联、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

在一段时期内，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外输出资本，这些国家从殖民地吸走了地上和地下的财富。后来，由于战争及危机的影响，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受到削弱，而美帝则使自己富强起来，成为超级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下，美国资本的大量出口对其他资本主义列强是十分有害的。

今天，美国资本以投资、信贷、贷款、合资公司合作或设立大型工业公司的形式输入到任何国家，甚至是工业化国家。美帝垄断资本投资于欠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低，而劳动人民的剥削程度高。它投资是为了获得原材料，垄断市场，销售工业产品。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垄断企业与公司恰恰会向那些需要投资和技术来支持经济发展的国家出口资本。

资本在这些地方的投入为金融康采恩和垄断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是因为由于在贫穷、不发达的国家，土地非常便宜，大片的土地，连同土地蕴含的财富，可以用很少的钱买到。劳动力也很便宜，因为处于饥饿边缘的人们被迫以极低的工资工作。据计算，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国家每投资一美元，就能获利五美元。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仅在 1971 年至 1975 年期间，美国对新成立国家的直接投资就达到 65 亿美元，而同期在这些国家的利润接近 300 亿美元。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掩饰资本的输出，也采取提供信贷的做法。通过这些所谓的信贷或援助，资本主义的大康采恩和其所属国家给受援国和人民施加上沉重的压力，使他们被控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或信贷，既来自于对这些国家财富的掠夺，也来自于对发达国家劳动群众的剥削，并且会给予不发达国家的富人。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例如美国的大型垄断企业，从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汗水中获利，当他们输出资本和发放贷款时，这些恰恰代表的是这些国家人民的汗水和鲜血。另一方面，这些垄断巨头为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信贷，实际上都用在了这些国家封建资产阶级的统治上。

新成立的国家所得到的信贷是其人民脖子上戴着的帝国主义锁链的一环。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国家的债务每五年翻一番。欠发达国家欠帝国主义列强的债务从 1955 年的近 85 亿美元增长到 1977 年的 1500 多亿美元。

世界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发展科技和专业，以便从地下资源的发现、农业的集约化等方面获得成倍的利润。所有这些技术，科技革命本身，以及新的经济剥削方法，都是为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垄断而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资本主义从来不会在没有事先计算好自己将获得的利润之前，就进行投资、提供贷款或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到处伸展开蜘蛛网的大垄断企业和大银行，除非被提供有关开采一个矿场、土地、从沙漠中开采石油或水等等收入的具体数据，否则永远不会给予信贷。

还有其他形式的信贷，比如那些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信贷，而这些国家试图掩盖他们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是以贸易信贷形式提供的大额信贷，当然，这些信贷必须在短时间内偿还。这些给受援国的信贷是由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共同提供的，这些国家事先计算了它们将从受援国获得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同时考虑到受援国的经济潜力和支付能力。资本家决不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信贷。他们只会提供信贷来破坏社会主义。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接受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国家的任何形式的信贷。

和赫鲁晓夫的苏联修正主义一样，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也使用了许多“列宁主义”、“革命性”的口号、语录和短语，但他们真实行动是反动的、反革命的。中国领导人甚至试图表现出他们机会主义的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以及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仿佛他们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这些修正主义者利用这种伪装，目的是把无产阶级群众和人民蒙在鼓里，这样他们就不会把不满转化为进行革命的有力武器。

让我们以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为例，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原则是正确的。每一个独立的、不稳定的、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动员所有人，并正确制定其经济政策，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对国家的所有财富进行适当和最合理的利用，并节俭地管理这些财富，必须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增加财富，并且绝不允许他人对其进行掠夺。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大方向，外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是相辅相成的。

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达成的信贷协议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这些信贷构成了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国际主义援助不产生资本主义，不使人民群众贫困，相反，它有利于发展工农业，有利于工农业的协调，有利于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

首先，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应该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必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决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或任何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依赖于更强大的国家。如果国家间的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大国剥削弱小国家的基础上的，那么就必须拒绝这种"援助"，因为它变成了奴役。

列宁说，金融资本已经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撒网。资本家的垄断企业、卡特尔和财辛迪加是有系统地运作的，他们首先占领自己国家的内部市场，控制工农业，奴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赚取超额利润，然后争取一切可能性去垄断世界各地的市场。金融资本对此起着直接作用。

今天，我们看到，这完全符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学说，两个超级大国，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占领市场，正在争夺世界的分配权。例如，石油问题在世界各地都很严重，它首要是美国大垄断企业的领域，但英国、荷兰和其他石油公司也参与其中。美国人正在石油问题上耍花招，以便完全垄断它。他们在沙特阿拉伯、伊朗等产油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建立了大规模的设备，并通过向国王、酋长和伊玛目行贿巨额美元，将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控制起来。这些国家的财阀允许石油生产国的统治者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投资，甚至购买各种垄断公司的股票，以及豪华酒店、工厂等。

例如，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半封建国家，在那里贫穷和蒙昧横行，尽管它每年能开采出 4.2 亿吨石油，但工农群众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国王和大地主阶层仅在华尔街银行就存入了 400 多亿美元。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一样。这些统治集团向帝国主义列强作出各种让步，掠夺他们所统治国家人民的资产，目的是为他们自己谋取利益。

石油生产国所作的投资属于统治集团的财产，当然，这些集团的资本与美国或英国资本在很小的规模上构成了一个联盟。从表面上看，石油生产国的统治集团似乎与美、英、法帝国主义有某种投资伙伴关系，据称还影响着后者的经济。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美帝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得到的利润，与分配给这些集团的利润相比，是十分巨大的。

这是当今新殖民主义的一个特点，它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一些国家的财富，谨慎地向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统治集团、封建统治集团让步，当然，不损害自己的利益。这个例子证实了列宁论点的正确性，即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很容易地相互关联，正如私人垄断企业的利益可以与国家垄断企业的利益相互联系一样。大型垄断企业也可能与实力较弱但控制大量资产的垄断企业合并，尤其是控制铁、铬、铜、铀等地下资源的垄断企业。

政府贷款、信贷和援助已成为当今资本输出最广泛的形式之一。特别是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也在实行这种输出。

除了榨取资本主义利润，这些信贷、"援助"和贷款也有政治目的。给予这些国家信贷旨在支持和巩固特定集团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而这些集团会保卫债权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由于各国政府之间缔结了关于这种信贷的协定，这些协定使债务国对债权国的经济和政治依赖更加严重。这种资本输出形式的一个经典例子是"马歇尔计划"【2】，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美国在西欧国家政治和军事扩张的经济基础。苏联修正主义者所谓的援助，据称是为印度、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建立国营工业部门而提供，其性质是相同的。

目前，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了从资本积累中获取的利润极速增长的发展阶段。资本的积累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这些利润进入了垄断者——即金融寡头的口袋，他们不把这些收入用来为贫困的劳动人民服务，而是把它们输出到那些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大利润的国家。这些国家被中国称为"第三世界"。然而，他们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这类投资。

有关美国资本渗透到欧洲的过程及其政治和经济目标，人们已经写了很多书。美国作家杰弗里·欧文【3】在书中对这一点给出了明确的描述。在"国际公司"一章的开头，他说美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即美国公司代表的不是拥有海外利益的公司，而是国际公司。这些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这意味着，美国各大公司不仅要考虑覆盖自己的国家，满足美国国内工业和客户的需要，还要考虑把网撒到国外。这些公司把他们的"过剩资本"投资到其他国家，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像"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美孚"、"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等巨头公司，近一半的利润来自于对外国的掠夺和剥削。大约 500 家公司每年在国外获得大约 100 亿美元的利润。在国外投资的这类企业有 3000 多家。

这就是“跨国公司”、“国际资本主义”等公式和术语在新闻和银行业务中的日常应用。

杰弗里·欧文说，1929 年，超过 1300 家欧洲公司被美国公司拥有或控制。这是美国进军欧洲工业的第一阶段。当时愈演愈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压力，暂时阻止了美国资本的入侵。从 1929 年到 1946 年，美国公司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从 7500 万美元下降到 7200 万美元。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50 年，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增加到 11.2 亿美元，其中一半集中在拉丁美洲国家和加拿大。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是为了开发这些原材料：石油、铜、铁矿石、铝土矿以及香蕉和其他农产品。在加拿大，他们主要从事采矿和石油，由于邻近和其他有利于渗透的条件，它们被大规模开发。

20 世纪 50 年代的欧洲也成为美国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他们在欧洲大陆的通讯、大规模生产产品和复杂设备方面的投资迅速扩大。伴随着投资，美国商品和产品大量涌入。

作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的形势给美国投资带来了更大的推动力。以下是这些海外投资增加的数字:1946 年，这些投资总额为 72 亿美元，然后在 1950 年开始增加到 112 亿美元，1964 年增加到 443 亿美元，1977 年增加到 600 多亿美元。

美国公司不断将业务扩展到世界范围，使得它们与当地公司的竞争更加激烈，也增加了当地公司对美国巨头统治的恐惧。这一问题在不发达国家更为严重，在这些国家，美国公司控制着工业的主要部门，并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些庞大的美国公司控制着当地的经济和政府，实际上他们就在经营这些经济和政府。美国石油公司和墨西哥政府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是众所周知的，直到 1938 年墨西哥政府的反对政策崩溃才结束。英国石油垄断企业与伊朗政府之间也产生了类似的斗争，导致摩萨台【4】被推翻。这种毁灭性的冲突一直在进行，并以美国大型托拉斯的胜利而告终。

大型石油公司的业务遍及全球。对他们来说，完全控制这个分支的所有资本和生产，控制他们投资的国家的政府等等，已经成为正常而必要的，因为，如果它们缺乏这些因素，那么在协调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上就会出现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外国大公司反对当地资本家努力争取比美国投资者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允许的利润份额更大的份额。

在欧洲、加拿大、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美国公司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它们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许多国家的经济。这些国家的政府非常害怕美国，因为美国使自己已经成为了欧洲经济的领导者，正如它在军事方面所做的那样。因此，欧洲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阻止已经并正在越来越多地涌入这些国家的美国资本的入侵。

中国领导人声称，自 19 世纪以来，工业化欧洲国家正在美国进行更多的投资。但是，众所周知，欧洲资本在美国的投资主要以证券、股票、债券、存款等形式进行，而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在欧洲经济最重要的部门中占有主导地位。

杰弗里·欧文竭力为美国增加投资而辩护，他声称欧洲国家希望并正在努力发展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例如电子和计算机产业。这些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出口增长和整体经济增长。

但是美国公司在这个领域比他们的欧洲竞争对手更先进，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科技的进步。例如，在计算机制造方面，两家欧洲公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保护自己免受美国 IBM 的竞争——美国 IBM 控制着美国 70%以上的市场，甚至更大的世界市场份额。

同样，美国大公司有可能与当地企业成立合资企业。为了掩饰他们的剥削，许多公司避免拥有百分之百的子公司所有权，并在 49% - 51%或各 50%的共同投资基础上设立公司。这就是美国人在日本的做法，也是他们在宣称自己在自食其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做法。而实际上，铁托分子在经济上分裂南斯拉夫，分给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大公司。这样做也限制了南斯拉夫的自由和独立。许多美国大公司，如“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通用电气”等，实际上都有百分之百拥有其外国子公司的倾向。然而，欧文认为，这些子公司永远不会忘记国有化带来的问题，它们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与当地投资者一起设立公司的问题，而是鼓励国际投资者去持有母公司的股份的问题”。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国际”概念，尤其是“通用汽车”是这一概念的狂热拥护者。

美帝资本或美国工业机构的这些倾向——投资于美国以外的地方，以便建立殖民地、实现帝国梦，只是少数几个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尽管中国修正主义者掩饰，但美帝丝毫没有被削弱。相反，它已经变得更加强大，在外国获得了很大的优惠，并且经营着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它也给其他国家的政府造成了无数的困难，经常在这些国家制定法律，并控制和指导许多政府。当然，这个过程有起有落，但总趋势并不表明美帝的衰落。

我们现在处在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输出其资本，并渴望剥削不同民族的时代。这个超级大国输出的资本来自于苏联创造的剩余价值，苏联已经转型为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的恢复导致了当今苏联社会的两极分化，一小部分人统治和剥削了绝大多数人。现在，由官僚、技术官僚和上层创造性知识分子组成的阶层已经被创造出来，并以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形式出现，这个阶级从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野蛮剥削中攫取和瓜分剩余价值。与古典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古典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是按每个资本家的资本总额的比例分配的，而在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它是根据上层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经济地位、科学地位、文化地位等来分配的。高工资、经常性奖金、专项奖金、奖项刺激、优惠待遇等，已经形成了从劳动人民的血汗中榨取剩余价值的一整套制度。代表“集体资本家”的阶层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护这种掠夺，这些法律法规保证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苏联经济现在已经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美、德、日等资本深入苏联的同时，苏联资本也在向其他国家输出，并以各种形式与当地资本融合。

众所周知，苏联首先在经济上剥削卫星国。但是现在它正在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和争夺市场、投资领域，以便掠夺原材料，在世界贸易中维护新殖民主义法律等等。

苏联新资产阶级一心想要扩大自己的霸权，便输出资本，但在这里，它不仅要面对强大的美帝的竞争，还要面对日本、英国、西德、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这些国家为了谋取暴利，不仅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输出资本，而且向修正主义苏联监视下的东欧国家输出资本，甚至向苏联本身输出资本。

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如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以及现在的中国，都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他们的国家，因为这些资本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但同时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经互会成员债台高筑。他们欠西方国家的债务高达 500 亿美元。

南斯拉夫是第一批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其经济领域的修正主义国家之一。首先，南斯拉夫获得信贷，然后购买特许，之后转向成立合资企业。在南斯拉夫，1967 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设立合资企业，其中 49%的资本由外国公司拥有。1977 年，南斯拉夫有 170 家这样的企业。南斯拉夫为资本主义公司的活动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确保了利润的最大化。

南斯拉夫的现象证明，外国资本在南斯拉夫的投资是使南斯拉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美国和其他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投资中没有任何损失。相反，他们获得了巨额利润，同时增加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痛苦。列宁说过，资本的输出是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因为资本主义只寄生于少数非常富有的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也将在中国获得巨额利润。我们看到，美国、日本、西德和其他国家的资本正以数十亿美元的规模涌入中国。中国与日本签署了联合开发长江油田和电力资源的协议，与德国人就煤矿等的建设达成协议，等等。在中国进行的和将要进行的投资必将给外国资本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但同时也会加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基础。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向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修正主义国家输出资本，无论给予或接受资本的国家是大是小，始终是资本剥削人民的一种形式。这种剥削导致受援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

列宁指出，垄断企业在占领国内市场后，为了重新划分和占领世界工业产品和原材料市场，会进行经济斗争。激烈的竞争及对利润的贪婪促使不同国家的垄断者达成临时协议，相互结盟 5 合并，以分割国际产品市场和原料市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拥有原材料和能源储备，也会把矛头指向其他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比它们自己的国家低，尤其是工人的工资更是低了好几倍。为争夺石油资源和市场而进行的斗争是臭名昭著的。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几十上百家私营企业和公司破产，而国际石油卡特尔，包括七大垄断企业(五个美国的，一个英国的，一个英国和荷兰的，有臭名昭著的埃索、德士古、壳牌等等)，成功控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60%以上的石油开采和石油销售，以及 54%的石油加工产业。

今天，铜、锡、铀和其他有价值的战略矿产也有类似的资源和市场划分。许多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都与前殖民地签订了特别的、所谓优惠的合作协议等等，这确保了它们享有几乎排外的经济和商业特权。所谓的美元地区、英镑地区、法郎地区或卢布地区表明世界上垄断者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分裂。

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与这些国家进行的歧视性和不平等的贸易，以不同的方式确保了利润的最大化。今天除了欧佩克国家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就有大约 340 亿美元的借方余

额。

在当前条件下，尤其是在这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垄断企业还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就生产配额、价格、市场等问题达成直接协议。欧洲共同体、经互会等组织的存在，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分化的明显证据。世界的这种经济分工、垄断的统治、垄断对其他国家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支配，使劳动力和资本的矛盾、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更加严重。

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试图调和“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和美帝，与这一现实是格格不入的是，它不希望看到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和其他垄断者对中国称作的“第三世界”的无情进攻正在增加各国人民对一切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列强的抵抗，扩大各国人民进行不可调和斗争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促使它们在世界各地谋求经济扩张的过程中相互竞争、磨擦。

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力图调和这些矛盾，并恰恰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和各种色彩的修正主义者长期以来所鼓吹的，是对列宁主义战略的公然反对，列宁主义战略不但不否认这些矛盾，而且旨在激化这些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解放做铺垫。

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时指出，随着垄断前资本主义过渡到它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各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领土分割就完成了。

“…应当说，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世界瓜分完毕。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瓜分了?----相反，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无主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已第一次被瓜分完毕，所以以后只能是重新瓜分，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译者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物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剥削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旧的古典殖民主义已经转变为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包括一整套系统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措施，帝国主义建立它们的目的是维护其统治，确保能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前殖民地和其他许多国家，而本身适应战后涌现的新条件。

这些新条件是什么?

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和美国都无力以武力维持战前的局面。例如，法国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维持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其他非洲国家殖民地地位。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上的力量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导致了法西斯列强的失败，但也极大地削弱了旧殖民主义列强，动摇了它们的根基。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没有卷入这场旋风的国家，反法西斯战争都引起了民族解放的问题。前殖民国家的人民为了摆脱法西斯的枷锁，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一起参加了战争，他们不能再回到殖民的奴役中去，也不能再容忍这种奴役。苏联对纳粹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中国的解放，极大地推动了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解放斗争。殖民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的状况。解放战争在印度支那、北非和其他地方爆发。

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许多殖民主义国家认识到，不给予任何自由和独立的对殖民地旧的剥削和管理方法已经过时。

殖民帝国主义列强得出这一结论，不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感情，也不是因为他们想给人民自由，而是因为殖民地人民的压力，以及这些列强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过于虚弱，不能维系旧的殖民主义。但是，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放弃对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剥削。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个帝国主义列强都被迫给予这些民族自治权，或答应他们在一段时间后获得自由和独立。在此期间，据称，他们允许建立独立政府的思想并为此在当地培训干部，实际上他们真正目的是准备其他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剥削和新殖民主义，同时在这些国家和人民中间制造一种假象：他们赢得了自由。这是战后世界帝国主义遭受大败的阶段，是帝国主义殖民制度危机更加突出的时期。在资本主义衰亡的这个时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帝国主义，美国抓住了这一机会，使名义上变得自由和独立的殖民地人民遭受了更严重的新剥削。它把帝国主义的势力扩展到其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前殖民地上。

尽管他们赢得了那种形式的“独立”和自由的承认，由于帝国主义不愿勉强承认这些，许多前殖民地人民被迫拿起武器。特别是法国帝国主义者，即使在战争之后，仍然试图维护法国的力量，或者说是威严。因此，阿尔及利亚、越南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开始了争取解放的长期斗争，并且最终取得

了胜利。在这里，我们不会详细讨论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哪种社会力量去进行斗争的，等等。事实是旧的法英帝国主义被削弱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正在衰落，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正在被革命运动与受欺压受奴役人民热爱自由的愿望所侵蚀的论点得到了证实。

在此期间美帝壮大起来，扩大了美元区，将法郎和英镑地区的领土置于其控制之下，而且，为了保护其建立在对人民最大化剥削基础上的霸权帝国主义力量，它在世界上许多名义上已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和亲美政治集团。当然，这种剥削也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有关。

金融资本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它在剥削无产阶级和征服世界的方面还要优于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确立了对人民的统治，并以各种粉饰太平的假自由、假独立的形式以及建立了一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等来为这种统治辩护。

随着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创立，以及美国资本的投资，美国固有的、堕落的生活方式也被输出。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输出创造了殖民地，今天，这些殖民地就是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这些国家有所谓的独立，但只是形式上的独立，换句话说，现在和过去一样，同样的资本输出过程正在进行，虽然形式不同，但却有“甜言蜜语”的解释和宣传。对这些国家人民的无情剥削没有改变，甚至变得更加残酷；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还在继续。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新殖民主义力量是美国。在 1973 年至 1975 年的三年内，美国在前殖民地、未独立或半独立国家的政府与私人资本的投资占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在这些地区总投资的 36%左右。

帝国主义列强与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条约和协定，都是帝国主义为使这些国家处于奴役状态而装备的武器。列宁强调：

“....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出自《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译者注）

这句话在今天和过去一样有效。

为了保持对人民的统治，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或新或旧的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邻国之间，或在某一国家内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煽动任何可能的冲突，然后，以法官或者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持者的角色，干涉别国内政，并为他们在那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存在辩护。事实表明，每当超级大国干涉别国人民的内政时，这些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其结果就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地位得到巩固。中东局势、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冲突、柬埔寨越南战争【5】等就是明证。

美国、苏联和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连同它们的投资在争取市场和势力范围时，也巩固了它们在接受这些投资的国家中的地位。这就导致了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摩擦，也导致了不相关、不相互依存的重大问题之间的摩擦。这些摩擦引发了局部战争，甚至可能导致全面战争。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由于这些原因而爆发的战争，无论是局部的还是普遍的，都是掠夺性的，而不是解放性质的。只有当人民起来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时候，只有当他们起来反对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资产阶级的时候，这才是一场正义的解放战争。

世界大资本的代表们正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对现有国际经济关系体系进行修正的必要性，以及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必要性，中国领导人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这种新的经济秩序将成为“全球团结的基础”。就苏联修正主义者而言，他们则谈论要建立所谓的国际经济关系新结构。

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列强所做的努力与制定的计划，它们要使新殖民主义继续存在，延长它的寿命，并保持它们对人民的压迫和掠夺。但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既不服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愿望，也不服从他们发明的理论。正如列宁所说，坚持不懈地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进行革命，才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

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时，也明确了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他强调，帝国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且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列宁指出：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是(1)垄断资本主义；(2)寄生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垂死的资本主义。”（出自《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译者注）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充分证实了这一结论。

正如列宁所证明的那样，帝国主义的一切社会经济弊病的经济基础是垄断。垄断对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无能为力。列宁把帝国主义的寄生和衰亡同垄断者抑制生产力的发展、深化各部门与国民经济的不协调发展、不充分利用人和物质的生产能力的倾向有机地联系起来，同阻碍科学技术新发展应用

于造福人民群众和整个社会进步的趋势有机联系起来。

对利润的贪婪和竞争，迫使垄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先进技术。但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其主要趋势是发展不平衡和制约发展。

例如，在美国，工业领域，特别是战争工业的研究和科学发展的开支从 1950 年的 20 亿美元增加到 1965 年的近 110 亿美元和 1972 年的约 300 亿美元。大公司经常在科学研究中遇到困难，但是一旦发现了什么，他们就买下专利并雇佣合格的工作者；然而，只有它们的自身利益需求时，他们才会应用这项研究。自然，发展和技术革命领域吸引了更大的投资兴趣，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大的盈利可能性。军工行业位居榜首，因为它的利润率是最高的。例如，1964 年，美国在航空和导弹领域的科学研究上投资了 35.65 亿美元。同年，10.00537 亿美元投资在电子和电信行业，1.96 亿美元投资于化工行业，1.36 亿美元投资于机械制造行业，1.74 亿美元投资在汽车行业，1.72 亿美元投资在科学仪器上，3800 万美元投资于橡胶行业，800 万美元投资在石油工业上，900 万美元投资在在甲烷工业，等等。

在今天的条件下，经济的军事化作为帝国主义衰亡的表现，已成为所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典型特点。但是，经济的军事化进程已达到空前的程度，特别是在美国和苏联。双方直接军事开支已增长到天文数字，达到每年 2400 多亿美元。美国和苏联在其霸权主义和统治世界的政策中，也在广泛地利用武器贸易，这是帝国主义衰落的另一个明显表现。他们每年出售价值 200 多亿美元的武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等，也从事军火买卖。这种帝国主义贸易的常客是智利、巴西、阿根廷、以色列、西班牙、韩国、罗得西亚、南非联邦等国的反动法西斯集团。这些客户中还包括那些拥有丰富战略原料或石油的国家，帝国主义向这些国家提供武器作为诱饵，诱使它们允许帝国主义掠夺它们的财富。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日益频繁爆发，清楚地证明了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寄生性质。危机的爆发，现在已经日趋严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消费的无政府性、自发性和非均衡性的理论的正确性，驳斥了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无危机”、或是资本主义向“受管制的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

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劳动人民的贫困程度一步步加深，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却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这种贫困程度的加深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在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社会向无产阶级和只有很有限人数的资产阶级分化的进程正在深化。

今天的帝国主义制度，拥有更大的经济上的可能性去腐化无产阶级的上层，即工人贵族阶级，因而把工人贵族阶级的人数增加到非常大的比例。金融寡头今天正在广泛地利用这种工人贵族来统治，欺骗和迷惑无产阶级，抑制他们的革命热情。列宁称为在言辞上为社会主义者，在行动上为帝国主义者的人通常就是从这种工人贵族中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工人党”、工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现代修正主义者等等，都属于列宁描述的范畴。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是同机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机会主义者是帮助维护和加强帝国主义的。他说：*“在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谎言。”*（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译者注）

帝国主义的衰亡也明显地表现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反应的增长和加强上。实践证明，当垄断资产阶级看到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它就把一切伪装起来，把工人阶级、群众甚至他们流血所赢得的少数权利都否认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的法西斯政权和独裁就是这方面的证据。

所有这种腐朽的、处于混乱状态的制度都是由庞大的禁卫军、动员和武装到牙齿的大批警察所支撑的。所有这些军队和警察部队的行动都是为了防止或镇压任何超出由统治阶级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所规定的限度的抵抗。军队干部和其他充当打手的干部生活富裕，工资丰厚。例如，在意大利，你只听到人们谈论军队、警察、宪兵，谈论被授勋但也被杀害的安全人员。

在这种资产阶级国家普遍存在的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强盗主义已经发展起来，并且蔓延开来，这是资本主义秩序本身所孕育的。这是它的堕落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制度所引起的绝望和混乱的反映。资产阶级竭力防止那些给资产阶级国家带来麻烦和烦恼的强盗行为。但它却利用和煽动黑社会来恐吓挣扎于贫困中的广大劳动群众。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犯罪已成为一种产业，从抢劫银行和商店扩展到绑架别人，并索要大笔赎金。在一些国家，黑社会组织成不同的集团。这些团体的名字往往带有“革命”或“共产主义”的意思。资产阶级允许他们自由行动，以便为法西斯政变的发生作好准备，并为其进行辩护。为了败坏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声，这种强盗活动被宣传得好像是由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秩序的“共产主义集团”进行的。

作为结论，我们可以说，整个帝国主义、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在当前形势下，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都处于被削弱和腐朽的阶段，旧社会将被革命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并将扩展，它将发展，尽管苏联修正主义者在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尽管机会主义在中国盛行，一种新的社会帝国主义正在那里兴起，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在旧的人民民主国家得到恢复，但还是取得了进展。社会主义将走自己的道路，通过斗争和努力战胜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绝不能像赫鲁晓夫和所有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通过改革和和平的议会道路来完成，坚持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走今天修正主义理论的歪门邪道，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的新阶段，是“资本主义怀中社会主义成分的诞生”，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下的定论来看，由于内部矛盾侵蚀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系不再有不可分割的权利去支配它曾经拥有的一切。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它证实了马列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正在衰落、腐朽的论点。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衰落是当今世界历史的主流。马克思、列宁是在具体事实、历史事件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论证这一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联合起来的趋势也导致了帝国主义的削弱。但是，中国对后一种倾向绝对化，不作必要的区分，不研究具体情况，没有走上正确的道路。一边宣称美帝正在衰落，不如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强大，一边又在赞扬第三世界。中国领导人作为时代的主要动力，实际上是在鼓励对资产阶级的投降和服从。

人民需要解放，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有通过斗争、通过努力和由军事领导者领导才能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教导我们，这种领导是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马列主义政党，必须从革命的准备和实行出发，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分析，权衡利弊，作出决定，制定适当的战略和战术。如果像中国人那样忘记了革命，无论是分析、行动、战略，还是战术，我们不能对任何帝国主义抱有任何幻想，不管它是强大还是弱小。帝国主义从其本质上创造了经济和政治扩张、发动战争的条件，因为它本质上是剥削性的、侵略性的。因此，欺骗想要解放的人民群众以“三个世界”等修正主义理论为指导就能实现解放，就是对人民和革命犯罪。

正如列宁所教导我们的，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我们马列主义者必须从这一点上认识到，我们必须同世界帝国主义，同一切帝国主义，同一切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这些势力竭尽全力剥削无产阶级和人民。我们强调列宁主义的论点，即革命现在是大势所趋。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新的社会，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将更加腐朽，并将通过革命走向灭亡。

列宁教导我们，必须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必须从广义上批评帝国主义，并且要使被压迫的阶级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反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马列主义对帝国主义今天发展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革命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和结论是无可动摇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从社会民主党人到赫鲁晓夫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企图歪曲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点，都是反革命的。他们的目的是否定革命，美化帝国主义，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

当列宁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辩护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希法亭和第二国际的所有其他机会主义者时，他指出：

“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译者注）

然而不幸的是，甚至“万里长城”现在也被攻破了，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中国。中国的机会主义者一点也不具有独创性。追随考茨基及其共犯的道路，他们也在美化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把美帝说成是正在退却的帝国主义，人民应当依靠美帝来抵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修正主义者的“理论”与考茨基的“理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考茨基试图通过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来捍卫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掩盖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扩张。今天，中国领导人也在这样做，他们为了支持美帝及其新殖民主义政策，炮制了据称是基于马克思或列宁的荒谬理论。然而，用列宁的话来说，中国的“理论”是陷入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泥潭。

考茨基的理论传播了一种错觉，即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另一种非兼并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列宁强调：

“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照这样说来，经济

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照这样说来，瓜分世界领土（这种瓜分恰巧是在金融资本时代完成的并成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容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这样一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译者注）

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忽视了垄断、金融资本在美国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事实，也忽视了正是这些主宰着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他们谈论的是一种不再寻求扩张、实际上正在退却的和平帝国主义。“忘记”斯大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的主要特征和要求的阐述：

“…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出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译者注）

因此，中国领导人的“新”理论表明，他们正在用新调子唱考茨基的老歌。

列宁在揭露想要对帝国主义列强在是否具有侵略性的基础上加以区分的第二国际的头目时，强调这一立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迫使第二国际的各党派采取沙文主义的立场，公开背叛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事业。列宁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国家无论是哪一方，都毫无疑问具有“更大的罪过”。

*“现代民主派要保持其为民主派，”*他说，*“就只有不追随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只有说‘双方都同样坏’，只有希望每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都失败。任何其他的决定，实际上都是民族自由主义的决定，同真正的国际观点毫无共同之点。”*（出自《打着别人的旗帜》——译者注）

在目前的条件下，按照中国的论点，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比美国的帝国主义更具有侵略性，如果中国的论点被接受，这将导致对革命和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公然背叛，从而走上第二国际的立场。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同样代表着社会主义、人民自由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主要敌人和危协。他们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捍卫者。

为了掩饰他们对人民的背叛，中国领导人表示，大垄断者与一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垄断者力量与人民之间甚至都能够避免冲突的局面。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论，企图把残暴的帝国主义说成是温顺的，制造一种令人欢欣鼓舞的假象，即所谓的资本投资将为投资国人民创造福利，从而不再存在帝国主义者与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对立矛盾。现在被中国领导人鼓吹的这套理论，已经被帝国主义者捏造出来，目的是扩大它在世界各地的统治，并协助统治各国的反动集团压迫自己的人民，当卖国贼。

这些“理论”以新的、改善了的形式重复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反动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揭露了考茨基反马克思主义的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声称，帝国主义可以通过各国资本家之间的协议来防止战争。

列宁在与考茨基的辩论中说：

“…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译者注）

列宁的这些教导在当前中国修正主义者正在谈论和狂热地努力去建立一切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和政权的一个联盟和一个巨大的世界统一战线，包括美国，来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时候，十分具有意义。

列宁强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是可能的，但建立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唯一目的是共同粉碎革命和社会主义，共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把《共产党宣言》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换成了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务实口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没有从马列主义的阶级立场来分析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而是以一种扭曲的眼光来看待帝国主义，忽视了马克思列宁明确界定的当代矛盾。按照这个“理论”，“社会主义”中国同美帝和第二世界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同其他帝国主义剥削人民，却又号召立志反对无论是美帝还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只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铁托的不结盟理论，也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反马克思主义。

这两种“理论”是美苏两国帝国主义的火车所行驶的同一条铁路上的铁轨，这一列火车满载着从世界各国人民掠夺来的财富。铁托分子和中国修正主义者正试图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这列火车的货运车上开一些洞，这样一些石油、糖、几美元、几英镑、法郎或卢布就会漏出来。这两条横亘在被压迫人民背上的铁轨，是要把被压迫人民永远束缚起来的，这是两种和其他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如托派的理论、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布哈林主义者的理论、赫鲁晓夫主义者的理论以及陶里亚蒂【6】、卡里略【7】、马歇【8】的支持者推崇的理论等理论一样反动的理论。

现实不断地证实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天才的论断。资本主义已进入衰亡阶段。这种情况引起了人民的反抗，推动他们进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集团的斗争，正在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进行着。量变将不可避免地转变为质变。这将首先发生在那些处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意识和组织能力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政治和思想认识。

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人民的野蛮镇压和剥削。但是，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不能继续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战后受到的压迫和剥削并不比战前少。
尽管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了种种努力，但在建立对人民的霸权的斗争中，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找到稳定的局面。由于要求解放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劳动人民群众意识在觉醒，以及帝国主义内部不可避免的矛盾，它不会找到稳定。

人民看到，并且将会看得越来越清楚，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仅仅基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还建立在富人阶级的基础上，他们使自己国家的人民处于奴役、剥削和恐惧之下，因此他们不会奋起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世界各国人民的广大群众也开始认识到，必须推翻今天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剥削制度。对各国人民来说，这不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在许多国家他们已经拿起武器。
因此，没有必要把世界分为三、四部分，分为“结盟”和“不结盟”，必须按照马列主义的学说，正确看待与解释宏大的客观历史进程。世界被一分为二，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新世界，两个世界进行残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新的社会主义世界将取得胜利，旧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社会将被推翻。

注：

【1】译者注：经济互助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于 1949 年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是由苏联组织建立的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

【2】译者注：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阵营，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

【3】译者注：杰弗里·欧文（Geoffrey Owen），美国经济评论家，长期担任伦敦《金融时报》的管理人员。

【4】译者注：摩萨台(Mossadeq)1882——1967，1951 年至 1953 年间出任民选的伊朗首相，但在 1953 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政变推翻。

【5】译者注：
中东局势主要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的冲突；
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冲突，指欧加登战争，是 1977 年到 1978 年期间，发生在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战争；
柬埔寨越南战争，是发生于 1975 年 5 月 1 日到 1991 年 10 月 23 日期间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民主柬埔寨。1975 年 5 月，红色高棉指挥的部队进入了富国岛，后被越南军队驱离。此后两国不断发生边境冲突。

【6】译者注：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意共创始人之一及长期领导人、第三国际的活动家，1925年离开法西斯意大利后主要负责第三国际工作，1944年回国直接领导意共游击队，并以反法西斯团结为名向天民党和社会党妥协。后提出“结构改革论”，成为欧共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

【7】译者注：卡里略（Santago Carrillo），1915——2012，西共领导人，早年参加工人社会党，长期从事青年工作。1936年任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同年6月加入共产党。内战失败后，流亡苏联，1960年1月当选为总书记。1975年——1976年与卡洛斯国王通过中介秘密谈判达成交易，1977年帮助王国政府安抚群众，巩固了君主立宪制政府。后成为欧共主义理论家之一。

【8】译者注：马歇（Georges Marchais），1920——1997，法共领导人，1943年投身抵抗运动，1947年加入法共，从事工会运动。1972年法共二十大上当选为总书记。同年与社会党的密特朗签署共同政府纲领，促成左翼力量的联合。他主张根据法国特点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民主的、发扬法国自由和人权传统的社会主义。

第三章

革命与人民

马克思以科学论证展示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建设一个更加先进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性。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指出现在是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这是摧毁旧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的新时代，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被压迫人民解放的新时代，是世界范围上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

这意味着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旧的剥削社会被取代的时代，这个旧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对被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而在新社会里，人对人的剥削一劳永逸地消除了。正是从这些基本学说和以马列主义对当今世界发展进程的分析中，我们党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世界正处在革命和人民解放问题亟待解决的发展阶段的论断。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种持续的、残酷的斗争。两大社会力量对峙着。一边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式的资产阶级，这是有史以来最凶残、最诡诈、最嗜血的阶级。另一边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完全没有生产资料，被同时又是思想、创造、工作、生产最先进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但却无法享受到劳动果实。

每一个阶级都努力团结自己身边的力量，为自己的目标准备着：无产阶级，为社会和民族解放，为革命作准备；资产阶级，为保持统治，为镇压革命作准备。资产阶级把最不祥的、倒退的、罪恶的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无产阶级则努力争取一切革命的、进步的力量都站在自己一边。

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会不断地逐渐增长起来，并必将以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胜利告终。但要使这场斗争取得胜利，就必须组织无产阶级，必须让他们有自己的先锋队，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领导他们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

世界上有许多意图或好或坏的、头脑发热的人，他们认为革命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但这些人错了。革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革命是在最薄弱的资本主义链条上爆发和进行的。革命要爆发和胜利，必须有适当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必须找到发动革命的有利时机。最主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必须决心准备把革命进行到底。列宁强调革命是由各国人民独立进行的，不是靠输出的。这并不意味着马列主义者无论在哪里作战，都不应该感到他们是团结一致的，不应该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最纯粹的感情互相联系，不应当帮助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相反，所有共产党人，所有无产阶级，所有各国的革命力量，都有义务通过宣传、鼓动、物质援助，以他们的决心和无私为榜样，并通过坚持马列主义，帮助每一个国家和世界各地的革命。当然，这种援助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准备，取决于这个或那个国家革命斗争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是分不开的。

正如列宁教导我们和生活所证实的那样，革命在每个国家都会分别取得胜利。因此，这种胜利，首先取决于各国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党能否在具体条件下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教诲落实到革命上来。

但是，围绕着这些学说，特别是围绕着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产生了许多混乱，埋下了很多“地雷”。铁托分子、苏联修正主义者、“欧洲共产主义者”、中国修正主义者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自作主张，在革命问题上误导人民，防止革命爆发。

今天，在问题出现，需要解决的时候，马列主义者有责任驱散修正主义者制造的关于革命的迷雾，揭露他们的阴谋和对革命的蓄意歪曲，揭露他们的反革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意图，并保证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教导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

我们必须捍卫和贯彻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

马列主义教导我们，并且经一切革命的经验证明：革命要爆发并取得胜利，必须要存在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列宁在他的《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书中阐述了这一学说，并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和其他著作中对其进一步发展。

列宁把革命条件作为革命的客观因素，描述如下：

(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

(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出自《第二国际的破产》——译者注）

但是，并不是每一种革命情况都会引起革命，列宁说。他说，在许多情况下，像德国1860-1870年的革命条件，或俄国1859-1861年和1879-1880年的革命条件，都没有转变成革命，因为没有主观因素，即群众对革命的高觉悟和高准备程度。

*“……革命阶级，”*正如列宁所说，*“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出自《第二国际的破产》——译者注）

在主观因素的准备上，正如列宁在早期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工人阶级革命党以及它对革命群众的领导、教育和动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党要做到这一点：既要根据具体情况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愿望和要求，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又要通过大量的工作，包括集中进行深入的、在政治上深思熟虑过的革命活动，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到自己的生活状况，认识到压迫和剥削，认识到资产阶级的野蛮法律，认识到革命作为推翻奴役秩序的手段之绝对必要性。

这样，贫困阶层就会非常激烈地反应，即使是富人，掌权的资产阶级，也会受到其他内外矛盾的动摇，也很难像以前那样继续支配。当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当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互联系时，革命就不仅有可能爆发，而且有可能胜利。

革命者们总是对列宁的这些天才论断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且不仅动脑筋思考，还对条件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分析。他们的行动，是要保证他们永远不会被革命条件所惊扰，所以他们不会在决定性关头才发觉自己被缴了械，反而能够利用这些来准备和发动革命。

对时局的分析能表明出什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出发，认为当今世界形势总体上是革命的，许多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或者正在迅速成熟，而在其他国家，这一进程正在发展中。当我们说当前的局势是革命性的，我们意思是今天的世界正在走向大爆发。总的来说，现在的局势就像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一场猛烈的大火，一场在进行着压迫和剥削的上层统治者阶级中燃烧的大火。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金融和军事、思想和道德危机之中。当前的危机，动摇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秩序的整个结构和上层建筑，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危机更加深刻和尖锐。

这场危机的后果显然是非常严重和毁灭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自1974年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变得不断恶化起来。它使工业生产下降了相当大的比例：日本下降了20%，英国下降了15%，美国下降了14%，法国和意大利下降了18%，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下降了10%。这场危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萧条。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些重要经济部门的闲置生产能力率已高达25%-40%，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这就是为什么工业生产仍停滞不前。大量剩余货物仍无法售出。

然而，尽管所有这些未售出商品仍处于存库状态，尽管许多生产力没有被发挥，但由于价格上涨，垄断企业的利润继续增加。物价每天都在上涨，而某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物价上涨，特别是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垄断企业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手中的一种非常方便的手段，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承担起危机的沉重负担。

以通货膨胀为借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主导的修正主义国家增加劳动人民的所得税，停发工资，同时减少垄断者的利润税，使货币贬值，等等。这些措施是针对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提高他们

的被剥削的程度，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

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恶化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生存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失业率已经上升到以前很少见到的比例，而且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社会的一大长期性溃疡。在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世界里，有 1.1 亿人被抛弃在街头。仅在美国，失业人数就不少于 700 万至 800 万。今天，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或者实际上就在挨饿中。亿万人因对明天的恐慌而饱受折磨。

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与无保障，以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式的修正主义政权实行的反动的、反人民的内外政策，使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增加起来并不断增加。这种恶劣的情况激起了他们无法遏制的愤怒，这在罢工、抗议、示威、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秩序的压迫者的冲突中以及许多事例——甚至是在真正的起义中表现出来。民众对统治他们的政权越来越怀有敌意。

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为了努力维护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会做出种种虚假的承诺和提议，以安抚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使他们不想革命。与此同时，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阶层差距越来越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前的危机还蔓延到政治生活，挑起了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矛盾。这方面的明显证据是，政府危机大幅增加，执政者频繁更替。

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被迫越来越频繁地更换政府班子的走卒，以欺骗劳动人民，使他们相信，新的班子比旧的班子好，使他们确信，这场危机引发的责任以及无法摆脱危机的责任在于旧的班子，而新班子会改善情况，等等。整个骗局一直在大范围地进行，特别是在竞选活动中，被关于自由、民主等虚假口号所掩盖。同时，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正在强化其野蛮的暴力武器、军队、警察、特务、法院，以及对无产阶级的一切运动和努力采取专政手段的控制。今天，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暴力和限制民主权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资产阶级认为不能用“民主”的方法和手段来统治的时候，法西斯在国家生活中的发展和建立法西斯的准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经济金融和政治危机不仅笼罩着垄断企业、政府、政党和各国内部的实力，而且还笼罩着国际联盟、经济、政治和军事集团，如欧洲共同市场、经互会、欧洲共同体、北约和华约。这些联盟和集团的伙伴之间的矛盾、摩擦、竞争和争吵，越来越公开和粗暴地表现出来。

超级大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军备竞赛和全面备战，以及在中东、非洲之角、西撒哈拉、印度支那等地挑起局部战争，可以看作这场危机和他们摆脱危机企图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行动方向是为一个或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计划服务的，它维持并发展了今天所占比例空前的军事工业和军火贸易。

但是，所有这些政治和军事手段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它不能也不可能治愈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制度的严重弊病。

说到当今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还必须加上前所未有的思想道德危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没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混乱和道德败坏。

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今天这样变种千变万化的资产阶级理论，包装在各种世俗和宗教下的右派的、中间派的或“左派”的、古典的和现代的、公开反共的和标榜自己是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道德败坏，这样堕落的生活方式，或是这样巨大的精神压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理论，费了很大劲建立起来，并被吹嘘为将人民从旧社会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指南，例如：“资本主义最终稳定论”、“人民资本主义”、“消费型社会”、“后工业社会”、“防范危机”、“技术革命”、“和平共处”、“没有军队、武器和战争的世界”、“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1】等等，现在基础都被动摇了。

总危机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南斯拉夫——危机的后果更为明显的国家，而且在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都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到处都在加紧压迫和剥削，都在遭受资本主义的弊病，都在遭受领导人和上层集团因权力和特殊利益而引起的争吵和冲突；到处都是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怒。因此，这些国家也存在着革命的巨大可能性。革命的规律在那里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一样的。

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形势，正是这种趋势的不断加深，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形势已经包围或者正在包围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因此，革命将成为常态。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在危机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在他们对革命会失败的预言和扼杀革命的

伎俩所遭受的落空和挫败中，他们正在企图寻找新的权宜之计，编造其他的欺骗性理论。

今天，现代修正主义者高举着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压迫和剥削人民、分裂革命和解放运动——总体上讲，欺骗群众的旗帜。但是，他们也会和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变成资产阶级纯粹的狗腿子。

在当前严重的经济、政治、思想危机的形势下，资产阶级要求修正主义奴才更加公开地出来支持它。这迫使他们越来越多地脱下伪装，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列宁说：

“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杲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出自《以后怎么办?》——译者注）

列宁的这一科学论断，在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今天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贡献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以意大利，一个典型的反映资本主义在其基础和上层建筑中衰败的国家为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基督教民主派、大资产阶级政党、教会聚集了一切宗教反动资产阶级和右翼分子在意大利执政。他们的政府正在统治一个处于破产状态的国家。从 1945 年至今，资产阶级上层一直处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在这一时期内，先后有 40 个左右的政府，如“单色”天主教民主党政府、“双色”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联合政府、“三色”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民社党联合政府【2】、“中左翼”政府、“中右翼”政府等。

意大利深刻的政府危机反映了国内普遍处于危机的局面，且从中找不到出路。争吵、冲突、政治谋杀和丑闻越来越频繁，如罢免利昂纳总统【3】、杀害天主教民主党党首莫罗等【4】，都是危机的后果。

意大利已成为美国的桥头堡。其破产的经济已落入美帝的魔掌，也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而它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分量最轻的成员。

由于这种情况，意大利广大劳动群众变得一贫如洗，而且在加剧。意大利是欧洲共同体国家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意大利是劳动力输出最多的国家，经济的进口要远远大于出口。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特别是西德和法国，通过限制从意大利购买食品，造成了意大利农业的困境。意大利黄油、牛奶和水果的出口价格急剧下降，而该国的生活成本却变得极高。意大利已经成为一个大罢工的国家，从重、轻工业到运输业，从邮递员到航空公司职员，甚至警察都参加了罢工。

在这种人民强烈不满的情况下，当群众和革命的利益要求将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这种巨大不满，转化为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和它准备发动的法西斯式进攻的斗争中去时，意大利的修正主义者和改良派工会、全体工人贵族、以及中国“三个世界”理论的支持者，都在充当救火队员，扑灭革命的火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

从法西斯党到贝林格【5】的修正主义政党，所有政党都在捍卫这个腐朽的资产阶级秩序。意大利修正主义党与资产阶级联合，正是为了保持这已经被动摇根基的资产阶级秩序继续掌握着权力。它试图通过传播它正在拥护和应用适用于本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谎言，来削弱和压制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力。

贝林格不仅早就与天主教民主党进行了谈判，甚至还与他们达成了协议，事实上，在没有正式参与政府的幌子下，在许多问题上，他是与他们一起统治的。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对由意大利议会多数的五个政党达成的政府计划大肆鼓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是意大利的“新政治阶段”。但贝林格所说的这个政治阶段，是将修正主义政党纳入意大利资本的计划中去。贝林格将此描述为一个严肃、现实和不可忽视的协议。他声称，这项协议不仅在政党之间的政治关系中，而且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将带来真正的变化。

因此，意大利修正主义者走的正是列宁为不同的机会主义者所预言的道路，他们寻求与资本联盟，以阻挠群众的革命运动。有了这样的联合，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走上了通过多元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显然，这不过是一场梦，意大利参议院院长阿明托雷·范范尼【6】把五个政党之间的这项协议描述为一个梦，一点也不错。

这是意大利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梦想，而资本力量那边这样做绝不是因为做梦，而是一个深思熟虑后的行动，目的是要清算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思想，阻挠意大利人民和无产阶级的主张，镇压他们为建设新社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意大利修正主义者现在得到了一些面包屑作为施舍，但是，他们却还声称政府需要修正主义政党的参与，他们试图把这个政党完全带入政府，就像一条鱼进入鱼群一样。总之，

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正试图完全卷入意大利垄断资本的反动混乱之中。

贝林格的党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彻底堕落的政党，带着一个完全的改良主义、议会路线、社民式纲领。它支持伪民主宪法建立的秩序——这个伪民主宪法本身就是由陶里亚蒂领导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也参与制定的。正是在这部宪法之下，反动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在过去 30 年制定意大利的法律，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所谓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却认为这种压迫是公正的，符合宪法。

不论在议会内还是议会外，意大利修正主义党和资产阶级其他政党，以天主教民主党为首，通过新闻机关、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实行着一种肆无忌惮地蛊惑意大利民众的政策，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使其日益混乱、瓦解。

意大利的反动派和教会非常需要所有这些活动。意大利修正主义党试图压制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以阻止革命，帮助资产阶级走出困境，避免现存秩序被推翻。

再举一个例子，西班牙。佛朗哥死后，胡安·卡洛斯国王【7】掌权。他是西班牙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西班牙大资产阶级看到法西斯政权在长期统治期间使国家陷入严重危机，得出了西班牙不能再像佛朗哥时代那样被统治的结论。因此，必须在政府形式上作出某些改变，佛朗哥声名狼藉的长枪党不能再继续掌权。经过一系列的政府首脑更迭，新国王最信任的人，改良的佛朗哥主义延续者，掌权了。西班牙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示威和罢工。通过它们，人们要求改变，自然不是已发生的这种“改变”，而是深刻和彻底的改变。那里的罢工、示威和冲突没有停止，仍在继续。人民群众要求自由和权利，要求不同民族的自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群众起义带入歧途，胡安·卡洛斯政府还将伊巴露丽【8】—卡里略(Ibarruri—Carrillo)的修正主义政党合法化。这个政党的首脑已经变成了西班牙君主政体的顺从的奴仆，变成了工贼，阻止了在现有形势下建立起来的革命大潮，并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镇压一切具有西班牙战争革命思想的分子和西班牙共和国的仰慕者。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的救火队角色，与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扮演的角色相同，尽管它的力量比后者要小。

法国、日本、美国、英国、葡萄牙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在维护资产阶级秩序方面，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使资产阶级秩序能够克服危机和革命的局面，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受压迫和剥削的群众陷于混乱和瘫痪中，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生活在“消费社会”和其他剥削社会是不可能的，他们正在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反抗中。

修正主义政党极为敌视列宁主义，这意味着他们对革命持敌对态度，因为正是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阐述得淋漓尽致，并在俄国付诸实践。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社会主义革命在阿尔巴尼亚等国取得了胜利。列宁主义理论处处昭示着革命胜利的道路，揭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关于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并没有没有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事实上，根据他们的说法，甚至是和平过渡，也不需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不需要无产阶级的专政。

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革命的时刻，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在极有可能爆发革命的时候，在极有必要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准备主观因素、树立指明了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群众夺取国家权力的真正道路的马列主义理论之正确性和普遍性的时候，资产阶级在对付和避免革命的过程中，修正主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争取受其影响的修正主义政党和工会参加反对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斗争。这正是美帝、世界资本主义和各国资产阶级的全部路线所要达到的目的。资产阶级希望修正主义政党公开地、完全地为资本服务，带着“共产主义”的色彩来运作，宣称自己为了改变现状而斗争，以建立一个新的混合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仅有统治阶级和富裕阶级，而且据说还有较贫穷的阶级，都将有自己的发言权，由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冒充自己的代表和拥护者。

当权的修正主义者，特别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苏联的修正主义者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正在世界资本主义遏制和消灭革命的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被宣布为列宁主义的敌人。他们是否定十月革命所体现的、列宁主义革命理论所反映的社会主义革命规律普遍性的最热烈的鼓吹者。他们鼓吹说，今天的世界是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所以不需要革命，不需要阶级斗争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把他们的资本主义式“自治”制度作为真正社会主义的典范，声称它是对付“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和对付资本主义罪恶的灵丹妙药。他们认为，这一制度的建立，不需要暴力革命，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不需要民主集中制。“自治”可以通过各级统治圈子之间、雇主和工人之间、政府和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协议和合作悄悄地建立起来。

正是因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列宁主义的敌人，破坏了革命，国际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帝才“慷慨”地向南斯拉夫提供了财政、物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援助。

换言之，苏联修正主义者并不排斥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而是用反革命的立场和活动，在实践中同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作斗争。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丝毫不亚于美帝和任何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革命将他们从王位上推翻，剥夺他们的权力和阶级特权，而在其他国家，革命破坏了他们统治世界的战略计划。

他们企图把自己描绘成十月革命的接班人，列宁主义的追随者，以欺骗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他们谈论“发达社会主义”【9】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为了把国内工人群众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任何不满、反抗和革命运动，作为“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加以镇压。在他们的国家之外，他们用“列宁主义”词句掩盖他们的反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和霸权计划打开了道路。

苏联修正主义认为，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革命是非常危险的，在他们看来，任何一次革命爆发，都可能演变成一场毁灭人类的热核世界大战。因此，他们建议在和平道路上革命，把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机关转变为劳动人民民主机关”作为今天最合适的道路。他们还提出“缓和”——所谓缓和紧张局势，宣称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并将导致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和平胜利——以此达到服务于苏联外交政策的目的。

为了蛊惑人心，他们并不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在理论上，他们是出来为它辩护的，说在具体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使用暴力革命。但是他们需要这些宣传，特别是为他们在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组织的阴谋和武装政变——以便在那里建立亲苏的反动政权和集团，把民族解放运动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并把他们置于霸权之下等等——来辩护。现在修正主义中国也变成一个狂热的革命灭火器。中国修正主义者整个内外政策都是针对革命的，因为革命打乱了他们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战略。

在中国，修正主义领导层正在野蛮地镇压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反对其资产阶级反革命立场和行动的任何革命爆发。它千方百计地掩盖当今时代的矛盾，特别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修正主义者说，当今世界只有一个矛盾，就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他们把这个矛盾表现为美国连同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们根据这一杜撰的论断，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同本国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保卫祖国和民族独立，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带来的危险。中国修正主义者以此向群众宣传放弃革命和解放斗争的思想。对中国修正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革命问题根本不是现在的问题，也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处在合适的革命时机中的地方。因此，他们建议无产阶级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学习理论，因为革命行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修正主义的政策是多么的敌对和反革命，分裂马列主义运动，阻碍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方面的统一。

中国的媒体，以及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完全没有提到大规模的示威和罢工——今天全体无产阶级都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组织起来了。这是因为他们不想鼓动群众的反抗，是因为他们不想无产阶级利用这些时机同压迫和剥削作斗争。他们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虚张声势的口号，听起来多么虚伪！

中国修正主义的主张不仅仅是当今世界上革命形势不成熟的主张，相反，更是要求无产阶级与马列主义政党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不为革命做任何准备。很久以前，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批评了意大利塞拉蒂的这种投降主义观点，他认为没有革命时机，就不应该采取革命行动。

列宁说：*“社会党人不愿意象我们那样在任何形势下都进行工作，就是说不愿意进行革命工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差别就在这里。”*（出自《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译者注）

列宁的这种批评，对于中国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其他一切反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修正主义者——比如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是一记沉重的耳光。

列宁称考茨基为叛徒，因为*“……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出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译者注）

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比考茨基走得更远。他们甚至不承认革命的必要性。

这一反动路线，深刻地说明了中国修正主义领导层的反革命政策和态度。中国修正主义领导层千方

百计地同美帝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成联盟，进行合作，并支持欧洲共同市场和北约。

通过同美帝（美帝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起，是无产阶级和人民最凶残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是他们的死敌——原注），其他帝国主义统治者和世界最黑暗的反动派结成联盟，谋求团结，并要求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弯腰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压迫，中国修正主义者自己同时也参加了这种压迫，同世界资本主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解放。

可以看到，世界资本主义以现代修正主义和他们的一切工具，正在各方面展开激烈的、多方面的斗争，以阻止革命的爆发。

他们正以强大而主要的力量克服危机，缓和或平息革命局势，以防止自己被拖入革命中。但是，危机和革命形势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不取决于资本家、修正主义者和其他任何人的意志和愿望。只有消灭了必然产生压迫剥削的资本主义秩序，才能避免这些现象。

帝国主义者、其他资本家和修正主义者都知道，革命不是在危机和革命形势下自发爆发的。因此，他们将注意力和主要打击集中在主观因素上。一方面，他们努力愚弄和欺骗无产阶级、其他劳动群众和人民，使他们不会自觉地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消灭国际马列主义运动而斗争，阻止它的建立、发展和增强力量，使之不成为革命的强大政治领导力量，使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不能够获得团结、组织、动员、领导群众革命和取得革命胜利的政治和思想能力。

但是，无论帝国主义者、资本家、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怎样挣扎，他们都不能阻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的挣扎，是同无产阶级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斗争相抗争的，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切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注：

【1】译者注：
“资本主义最终稳定论”、“人民资本主义”、“消费型社会”、“后工业社会”、“技术革命”、“防范危机”均为资产阶级首脑和其谋士炮制的学说和施政方针；
“和平共处”、“没有军队、武器和战争的世界”为苏修在赫鲁晓夫时期提出的口号；
“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是南斯拉夫和欧共派的口号。

【2】译者注：
1919 年天主教民主党前身人民党成立，在法西斯统治时期被迫解散，1943 年重建后成为意大利主要执政党；
1892 年意大利社会党前身意大利劳工党成立，1895 年改称现名，1922 年被意大利法西斯取缔，1943 年恢复公开活动，名为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1944～1947 年参加联合政府；
1947 年意大利民社党从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出来。
这三个党和陶里亚蒂领导的意共及其余一些小党如共和党等构成了意大利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秩序。

【3】译者注：乔瓦尼·利昂纳（Giovanni Leone ），1908—2001，天民党人，1963 年和 1968 年曾两度短暂出任意大利总理，1971 年至 1978 年任意大利总统。1978 年 6 月因被揭发有漏税等行为而辞职。

【4】译者注：阿尔多·莫罗（Aldo Moro），1916——1978，天民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两次出任意大利总理，1978 年被极左组织红色旅绑架并于 55 天后杀害。

【5】译者注：贝林格（Berlinguer Enrico），1922——1984，1943 年加入意共，1969 年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副总书记。1972 年意共十三大起连任总书记。贝林格继承和发展了陶里亚蒂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先后提出历史性妥协和民主代替战略。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之一。

【6】译者注：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1908——1999，天民党占主导地位长达三十多年的关键人物，历任意大利外交部长，，参议院议长和总理等职。

【7】译者注：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1938—— ，1975年11月27日即位，成为西班牙王国的国王，是西班牙的国家元首，也是该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推动了西班牙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转型，2014年退位。

【8】译者注：伊巴露丽（Ibárruri Dolores），1895——1989，1920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党，她常以“热情之花”为笔名宣传革命思想。1936年至1939年内战时期，她参与领导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叛乱的斗争。内战失败后流亡苏联，1942年接替迪亚士任西共总书记，同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60年起任西共名誉主席。1977年西班牙军事独裁者佛朗哥死后回国。后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9】译者注：1967年11月3日,苏共领导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报告中宣布;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已经建成。他说,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苏联人民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进行英勇和忘我劳动的结果。1971年他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再一次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

民族解放斗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们讲革命，不只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在由革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当今时代，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民族民主革命、反帝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列宁和斯大林所解释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

斯大林说：*“列宁主义已经证明……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 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出自《论列宁主义基础》——译者注）

这种联系在今天变得更加清楚与自然，因为随着旧殖民制度的崩溃，大多数人民通过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朝着独立迈出了一大步，而在这一步之后，他们又渴望走得更远。他们希望清算新殖民主义制度，消除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和外国资本的剥削。他们想要完全的主权和经济政治独立。现在已经证明，这样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只有消除外国人任何统治和对外国的依赖，消除当地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因此，民族民主革命、反帝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交织，是因为这些革命通过打击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也为社会的伟大变革铺平了道路，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反之，通过打击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破坏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社会主义革命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就是这样看待革命问题的。它是从马列主义立场看待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全力支持和协助热爱自由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因为这些斗争有助于破坏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和资本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因此，当我们得出革命是提上议事日程要去解决的问题的结论时，我们不仅要想到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想到反帝的民主革命。

革命形势的成熟程度，革命的性质和发展，不可能是所有国家都一样的。

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阶级比例、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情况和组织水平、外国势力对不同国家的干涉程度等，革命的具体问题很多，非常复杂。

目前，关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局势，以及那里革命的开展，人们议论纷纷。中国领导人把这些国家的革命、独立和民族解放问题放在全球的高度，好像可以通过整个“第三世界”的国家、阶级、政府等等的统一来解决，而忽略了个别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和问题。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表明，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反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主张维持现状，维护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这些国家的统治。

我们也要谈解放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阿拉伯和其他民族的问题。这些民族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必须去解决，但每一个民族也有非常复杂的具体问题。

这些民族的总的共同任务，是消灭一切外国的枷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地方资产阶级的压迫。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这些民族对外国的枷锁，以及对当地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枷锁充满愤怒和仇恨——他们投靠了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这些民族现在已经觉醒，不能再容忍掠夺他们的财富、汗水和鲜血，也不能再适应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落后。

这些人民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也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在同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同革命和民族与社会解放的主要敌人作斗争，同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作斗争的基础上，必须团结起来。

反对以色列——美帝最嗜血的工具——已经成为阿拉伯人民前进的一大绊脚石，这是所有阿拉伯人民的共同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并非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对他们应该是否要共同对付以色列和这种对付共同敌人的斗争应该具有的性质持一种看法。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角度看待这场斗争。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立场。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即以色列必须撤回自己的老巢，放弃对阿拉伯国家的沙文主义、挑衅、进攻和侵略态度与行动。我们要求以色列放弃阿拉伯人的领土，要求巴勒斯坦人获得他们所有的民族权利，但我们决不能接受以色列人民应该被消灭。

阿拉伯各国人民为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束缚、为加强其自由和主权所作的努力，也

是所有这些人民的共同问题。
但是，每一个阿拉伯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水平、国家组织、实现的自由和主权水平，以及其中许多民族宗族和部落的统一问题等。把所有这些不同的因素放在一起，要求所有这些国家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同时解决自由、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
在那些资产阶级利益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各帝国主义者投入了相当大的资金开发自然资产和剥削人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创造某些工作条件。在自然资产最丰富、殖民者利益最大的地方，对人民和人民财富的剥削也更为密集。当然，资产的开发也带来了一定的发展，但这不能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殖民者资助和帮助主要部落的首领，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和人民的财富出卖给帝国主义占领者。作为回报，他们从殖民者的巨额利润中得到了一小部分。
根据奴役他们的国家的情况和权力，有这些利润和外国赞助人的帮助下，部落首领在殖民地国家的支持和控制下建立了某种据称独立的国家。这样，在殖民者的帮助下，部落首领就变成了富有的资产阶级酋长阶层，他们把领土连同他们的人民一起卖了，一无所知地把人民置于外国殖民者和他们自己人的双重奴役之下。于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世纪君王、奴隶、租界里的无产阶级，在阿拉伯国家就形成了，互相对峙。上层阶级利用外国剥削者给予他们的金钱和利润，接受了欧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儿子甚至上过殖民者的学校，在那里获得了一些西方文化。他们自诩为人民文化的代表，但事实上，他们受过训练，使劳动群众处于奴役之中，使殖民者继续对劳动群众进行残酷剥削。拥有更多财富的阿拉伯国家发展得更快，不那么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发展得更慢，而贫穷的阿拉伯国家发展水平仍然很低。
有一个适合于实行完全压迫的组织，也有武装力量在他们手中，这样，殖民主义，封建君主的国家政权和拥有大片土地的资产阶级，把任何反抗的企图，任何要求，甚至一些非常有限的经济权利，都消灭在萌芽状态，更不用说政治要求和革命了。
在当今阿拉伯国家的发展中，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例如，沙特阿拉伯国王有着与波斯湾的埃米尔不同的问题，对经济、政治、组织和军事问题的看法也不同于他们——波斯湾的埃米尔从另一个角度和不同的范围看待这些问题。同样，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这些国家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的问题。
因此，当我们谈到阿拉伯各国人民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他们有许多共同利益，但他们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在一个国家不能像在另一个国家那样以同样的方式解决。同样，我们不能说在这些国家之间存在一个联盟和一个关于解决共同问题的单一意见。每个阿拉伯国家的问题都是不同的，这不仅是因为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的政府立场不同，而且还因为殖民国家和新殖民国家的态度，这些国家仍然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制定法律。
关于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言论也适用于非洲大陆的人民。非洲是一个由具有古老文化的民族组成的多元体。每个非洲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虽然有些不同，但都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大多数这些民族的觉醒只是最近才开始。在法律上，非洲各国人民普遍赢得了自由和独立。但是，真正的自由和独立是谈不上的，因为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殖民地或新殖民地状态。
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是由旧部落的首领统治的，他们夺取了权力，依赖于旧殖民主义者，或者是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现阶段这些国家的施政方法除了存在着明显的殖民主义痕迹外，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他状态。帝国主义者通过他们的康采恩再一次统治了大多数非洲国家，他们的资本投资于工业、银行等。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财富继续流向大国。
一些非洲国家曾为他们今天享有的自由和独立而战，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战斗就获得了自由和独立。英、法等殖民者在非洲殖民统治期间，压迫各国人民，但也创造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教育，这些国家今天的领导人，也是从这个资产阶级中产生的，其中有许多反帝分子，是争取本国独立的斗士，但大多数人不是忠于旧殖民者，以便在正式废除殖民主义之后与他们保持密切关系，就是对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
殖民者过去没有进行大规模投资。例如，在利比亚、突尼斯、埃及等国，情况就是这样。然而，殖民者榨干了所有这些国家的财富，夺取了大片土地，在一些特殊的工业部门，例如在原材料的提取和加工部门，发展了决不在少数的无产阶级。他们还把大量工人吸引到大国，例如法国，还有英国，作

为在殖民者矿山和工厂工作的廉价劳动力。
在非洲其他地区，特别是在黑非洲，工业发展仍然比较落后。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被瓜分了，特别是在法国、英国、比利时和葡萄牙手里。很久以前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地下财富，如钻石、铁、铜、金、锡等，并在那里建立了开采和加工矿物的工业。
在许多非洲国家，殖民者建造了大型而典型的殖民者城市；过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现在，一方面，当地的大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在那里不断增长和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贫困状况更加严重。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更具有欧洲特色。当地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它一般仍停留在部落所达到的阶段，在部落之外，在有高耸的摩天大楼的中心区没有被代表出来。这是因为，在殖民者生活着的大的中心区之外，赤裸裸的苦难和极端的贫困，饥饿，疾病，无知和对人民无情的剥削，在文化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显得至高无上。
由于殖民战争、野蛮的种族迫害和对非洲黑人贩卖，非洲人口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然不发达，数量不断减少，这些黑人被送到欧洲大都市、美国和其他国家，像动物一样在棉花种植园和其他农场工作，以及做着工业和建筑业最重的工作。
由于这些原因，非洲人民面前仍有一场很大的斗争。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由于各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状况、政治觉悟程度、不同信仰的巨大影响如基督教和穆斯林、异教徒思想等不同宗教以及旧的异教徒信仰等对人民群众施加着压力，各国的斗争将是不同的。由于许多国家实际上处于新殖民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集团的联合统治之下，这场斗争变得更加困难。那里的法律是由那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制定的，这些国家对统治集团进行补贴或控制，当新殖民主义者的利益需要或当这些利益的平衡受到破坏时，他们就建立或废除这些集团。
大地主、反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所奉行的政策，是要使非洲人民长期处于愚昧和束缚之中，阻碍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发展，阻碍他们争取这些权利的斗争。现在我们看到，那些过去统治这些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新帝国主义者，正试图通过干涉人民内部事务的各种可能方式，来渗透入非洲大陆。因此，帝国主义者之间、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领导人之间、人民和新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
人民必须利用这些矛盾，既要深化矛盾，又要从中受益。但是，只有无产阶级、贫苦农民、一切被压迫者和奴隶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反对大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及其整个制度的坚决斗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在这场斗争中，那些渴望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发展道路上自由独立前进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革命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将承担一种特殊的角色。只有通过他们不断地、有组织地斗争，才能使国内外压迫者、剥削者和政府的日子变得困难。这种情况将根据每个非洲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准备好。
英美帝没有给非洲人民任何自由。例如，每个人都能看到南非正在发生的事情。白人种族主义者，英国资本家，剥削者，在那里统治着，野蛮地压迫着这个弱肉强食的国家的有色人种。非洲的许多其他国家被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其他旧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康采恩和资本所支配，这些国家的实力有所减弱，但他们仍然掌握着这些国家经济的钥匙。
亚洲各国人民也走过了一条充满苦难和艰辛、残酷的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大陆（除了苏联亚洲部分以外）人口的十分之九处于欧洲、日本和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和半殖民压迫与剥削的状态。仅英国一个国家，其殖民地就达 563.5 万平方公里，居住者 4.2 亿多人。对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殖民压迫剥削使它们处于明显的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和赤贫状态。它们只是帝国主义大都市石油、煤炭、铬、锰、镁、锡、橡胶等原材料的来源。
战后，亚洲的殖民秩序也被打破了。殖民地国家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是通过人民群众对殖民主义者和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血腥战争取得建国的胜利的。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使中国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使蒋介石反动势力溃败，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这对于亚洲殖民主义的崩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段时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对亚洲人民和受帝国主义列强统治或依靠帝国主义列强的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解放斗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由于建国后中国领导人的路线，这种影响逐渐减弱。
中国领导人宣布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世界革命者和热爱自由的人民希望并期待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强大堡垒，他们热烈欢迎这一宣言。但他们的愿景和希望没有实现。虽然人们很难相信，但中国的现实和其十分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国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亚洲人民的斗争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的破坏而结束。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殖民主义者

虽然被迫承认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但他们希望保留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以便继续以其他的，新殖民主义的形式进行统治和剥削。美国渗透到亚洲，特别是远东、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使局势变得非常严重。这一地区对美帝的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重大。它建立了大型军事基地，并在那里部署了强大的舰队。与此同时，美国资本也牢牢地将该地区各国的经济拖入了血迹斑斑的魔爪。与此同时，美帝为镇压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裂活动和间谍活动。他们成功地把朝鲜和越南一分为二【1】，在这两个国家的南部建立了反动的傀儡政权。亚洲许多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了亲帝国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这样，中世纪的奴隶制，王公、国王、酋长、武士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绅士的野蛮统治就保存在那里。这些政权又把自己的国家卖给帝国主义，特别是卖给美帝，极大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沉重枷锁下又一次苦不堪言的亚洲人民，不能放下武器，必须继续争取解放以摆脱这种枷锁。总的来说，这场斗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无论这些党在哪里成功地同群众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使之认识到战争的解放目标，动员和组织他们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它们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印度支那人民，特别是越南人民，战胜美帝及其地主资产阶级傀儡的历史性胜利，向全世界表明，人民和无论大小的国家，当他们决心为自由和独立作出任何牺牲，无私斗争到底时，帝国主义，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有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有着一切现代战争手段来镇压解放运动，也不能征服他们。

解放武装斗争已经展开，而且仍在亚洲许多其他国家进行，如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沙文主义的立场和干涉，导致了革命力量和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分裂和丧失，这些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胜利。

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宣布支持这些国家的解放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又支持反动政权，以赞歌和数不清的荣誉欢迎和款待这些政权的头子。他们一贯奉行把亚洲国家的解放运动服从于自己的务实政策和霸权利益的战略和手段。他们总是给革命力量和革命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把这个政策强加于他们。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关心亚洲各国人民解放和革命的问题，只关心实现沙文主义的野心。他们没有帮助这些人民，反而阻碍了他们。

亚洲的革命和解放斗争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有力、那么迫切地要求解决，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复杂、更难解决。

这种复杂化和这些困难主要来自美帝的目的和活动，也来自苏联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大众、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目的和活动。

美国认为亚洲的战略、经济和军事地位对其帝国主义利益极为重要，因此，它的目标和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其在亚洲的战略、经济和军事地位。

苏联也在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地争取扩大在亚洲已经占据的位置。

中国则公开显示了自己要成为亚洲国家统治者的姿态，为此，中国与美国，特别是与日本结盟，并直接反对苏联。

日本也有统治亚洲的野心，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老野心。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如此害怕中日同盟，并且如此强烈地反对它。但美帝也不希望这一同盟如此稳固，以致超出了可能侵犯美国利益的限度，尽管它鼓励并“祝福”中日两国签署条约，因为这一条约可能遏制苏联的扩张，而苏联的扩张有损于美国统治。

印度作为一个大国——也有野心想成为一个在亚洲拥有原子弹和巨大影响力的大国——正发挥着特殊作用，特别是涉及到它处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在印度洋、波斯湾及其东部和北部边界扩张利益的节点上的战略地位。

英国帝国主义也没有放弃统治亚洲国家的目的。某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也有类似的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亚洲成为当今帝国主义之间激烈最竞争的地区之一，并因此他们在那里创造了许多危险的世界灾难的温床，使各国人民将为此付出代价。

为了平息亚洲各国的革命和解放斗争，为了为其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计划开辟道路，苏、中修正主义者处于激烈的竞争中，一直从事着分裂和摧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队伍以及热爱自由的革命力量的肮脏工作。这个工作使印尼共产党【2】遭受灾难，印度共产党【3】走向分裂和灭亡等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主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当地反动资产阶级联合统一，而同时苏中都在为自己的目的争取这个当地统治资产阶级的友谊。

苏、中社会帝国主义从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立场和野心出发，对亚洲各国的干涉，使这些民族的

解放运动面临极大的危险，甚至直接危及越南、柬埔寨和老挝【4】解放战争的胜利。

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亚洲国家革命和热爱自由的力量，必须正视和消除帝国主义赞助人武装起来的当地反动派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分裂和破坏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和苏中国修正主义正主义者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计划。他们还必须摆脱一系列旧的反动的、神秘的、佛教的、婆罗门教的和其他宗教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阻碍了解放运动。也要从根本上防止“新”的反动思想和观念，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毛主义和其他同反动理论一样的迷惑和欺骗群众的思想，否则将剥夺他们的战斗阶级精神，使他们走上错误和无望的道路。

摆在亚洲各国人民面前的解放斗争，确实是困难的，有许多障碍，但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存在容易的、没有大的困难和必须克服的障碍、不需要流血、不需要付出许多牺牲来换取最终的胜利的解放斗争和革命。

总的来说，拉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高于非洲和亚洲国家。但拉美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不低于绝大多数非洲和亚洲国家。

与非洲和亚洲国家不同，自 19 世纪上半叶以来，由于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的解放斗争，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早就独立了。如果这些国家在摆脱西班牙或葡萄牙殖民的束缚之后，没有再次受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其他外国资本的半殖民束缚，它们将取得更大的进步。本世纪初以前，英国殖民者才是这个大陆的主人。他们从这些国家掠夺了大量的原材料，建造了港口、铁路、发电站，以专门为特许公司服务，并在那里交易英国生产的工业品。

这种情况改变了，但不利于拉丁美洲人民，因为美国在其帝国主义发展阶段渗透进了拉丁美洲。美帝利用“门罗主义”所叫嚣的“美国为美洲人民服务”【5】的口号，来确立其对整个西半球的不可分割的统治。美国对本半球的经济渗透是通过军事力量、政治勒索以及美元外交手段，通过大棒和胡萝卜进行的。因此，在 1930 年，美国和英国资本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是平等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了这个地区经济的真正主人。它的大型垄断企业控制了拉丁美洲的主要经济部门。该大陆各国成为美帝“隐形”帝国的一部分，美帝开始在所有这些国家制定法律，任命和罢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规定其内外经济和军事政策。

美国的垄断公司通过开采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从拉丁美洲人民的辛劳、汗水和鲜血中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在这个大陆的各个国家投资的每一美元，他们就获得了 4-5 美元的利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尽管帝国主义国家在拉美的资本投资导致了一些现代工业的建立，特别是采掘业以及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但这些投资对拉美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和新殖民主义政策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扭曲的、片面的形式和单一的文化特征，把它们简单地变成了原材料的专门供应商：委内瑞拉—石油、玻利维亚—锡、智利—铜、巴西和哥伦比亚—咖啡、古巴、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糖，乌拉圭和阿根廷—畜产品，厄瓜多尔—香蕉，等等。

这种片面性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完全不稳定，完全不能迅速、全面地发展，完全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价格变化和波动的支配，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生产下降和任何经济危机的显现，都必然会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产生消极的、甚至更严重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巨头开始对工业、采矿、农业等各个部门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收购民族企业等。他们扩大了对整个生产部门的控制，把拉丁美洲国家的掠夺提高到最大限度。同时，他们鼓励以高利率提供贷款和融资，从而使这些国家更紧密地受到外国的控制——首先是美国的统治。仅巴西就向外国银行借了近 400 亿美元的债务，而墨西哥有将近 300 亿美元的债务。

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总体上是落后的，也是因为还有许多未完全丧失封建性质的大庄园残余，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就像亚洲和非洲那样，非常明显地落后。

在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寡头，一个依赖着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的，非常强大的的大垄断资产阶级，它和大地主一起掌握着国家权力，并且总是在美帝的支持下，和美帝一起，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农民和生活在赤贫中的其他劳动阶层。

这一发展也造就了数量相当大的工业无产阶级，它同农业无产阶级、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工人一起，占人口的近一半，不像非洲和亚洲——在大多数亚非国家，工人阶级数量都很小。

除此之外，在拉丁美洲，从阶级中脱颖而出的农民和工人阶级，在不断争取自由、土地、工作和面包的斗争中获得了丰富的武装革命传统，这种传统在反对地方寡头、外国垄断和美帝的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拉丁美洲人民是最为反抗国内外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民族之一，他们的斗争和流血最多。

在这些斗争中，他们取得了好几次的胜利，胜利还不小，但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仍然没有取得民主自由、消灭剥削、确保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彻底胜利。拉丁美洲人民对古巴人民的胜利怀有许多希望，抱有许多幻想，这成为他们摆脱当地资本主义和地主统治者以及美帝束缚的斗争的鼓舞和动力。然而，当他们看到卡斯特罗的古巴不是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而是在向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时，这些希望和这种激励很快就消失了，当古巴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和雇佣兵时，这种希望和激励更迅速地消失了。

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就像在所有大陆一样，情况是复杂的。

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条件都是革命性的，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和消灭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的革命已提上了日程。当然，由于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特殊情况和问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对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依赖程度的不同、温和派的多少、法西斯分子的多少、资产阶级政权的强大等已知原因，这些革命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性质、相同的发展过程和相同的解决办法，但有一点显然是必要的，那就是反帝、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更加紧密。

拉丁美洲在革命主观要素的准备方面也有许多优势，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准备程度比较高，愿意同国内外的压迫和剥削作斗争，争取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然而，不仅是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加上地方的反动派，还有地方的修正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其他机会主义走狗，以及苏联修正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都在极力阻挠、迷惑和反对这要素的充分准备。

坚持把拉丁美洲作为其专属领土的政策并从中获取巨大的超常利润的美帝，正在用一切手段——军事力量、特务、煽动和欺骗——来阻止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在那里占主导地位，并确保革命不会在这些国家爆发和胜利。因此，它既要维持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国的完全依赖，又要维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地主统治秩序。

为此，美国手中的一个重要武器是所谓的美洲国家组织，它由美国总统、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指挥。这个组织的《宪章》【6】赋予美国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甚至军事手段进行干预的权利，以维持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内外现状。

同时，美国的大垄断企业通过组建以美国为中心、由美国控制的跨国垄断公司，并大量利用国家资本，完善了在这些国家的剥削方式，通过这些方式，他们也确保了对地方政府和国家机构的控制。但是，美国所采用的这些和许多其他手段并不能解决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所产生的问题，而这场危机也使拉丁美洲国家陷入困境。

既然地方资本家和地主不依赖于美帝，不得到美帝的支持就不可能存在，那么革命作为国家和社会解放的唯一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劳动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众的意识中的深度和广度就越来越加强。

为了避免革命，美帝和地方资本家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到更加直接的威胁时，便通过“军事公告”（军事政变）建立军事法西斯政权。这就是他们在巴西、智利、乌拉圭、玻利维亚和其他地方所做的。另一种方法是，在委内瑞拉、墨西哥，或者像现在在巴西所做的那样，组织在基本的自由权方面具有明显局限和巨大差距的民主资产阶级政权，试图以此缓和革命的紧张局势，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以及美国政府及其总统（更加突出）关心人权问题。

但是，这种手段和伎俩不能解决危机问题，不能避免革命局面，不能把革命从议事日程上抹去。拉美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革命任务。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即进行革命，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建立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他们必须在许多方面进行斗争，去反对地方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寡头，反对美帝，反对各种资本的走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如亲苏联和卡斯特罗的修正主义者、亲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等。他们不仅要对付各种各样躲在阴暗面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而且要摆脱一些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盲动主义、游击主义【7】、冒险主义的观念和做法所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作风，这与真正的革命没有什么共同点，反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处理。

就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好战传统而言，积极的革命方面占主导地位。它是革命准备和发展中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尽可能广泛地利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赋予传统新的内容，不受消极的游击主义因素的影响。

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政党在执行这些伟大的任务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拉丁美洲几乎每个国

家都成立了这样的政党，而且大多数政党都在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准备工作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反对修正主义和其他机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反对卡斯特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观点和做法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在实践这条路线的斗争中积累了充分的经验，成为过去一切革命传统的继承者，以进一步利用和发展这条路线，使之有利于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中群众基础的准备和提高。

今天的革命形势使得这些政党必须尽可能地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协商，能够从彼此的经验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协调他们在共同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对苏联、中国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问题上，以及革命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

现在各国人民已经觉醒，拒绝再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枷锁之下，现在他们要求自由、独立、发展和进步，对外国和国内的压迫者充满愤怒，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已经成为一个沸腾的大熔炉，新老殖民主义者发现，很难通过以前的方法和形式来统治和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如果这些方法和形式还管用的话。他们除了掠夺和剥削这些民族的财富、辛劳和鲜血， 一无是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努力寻找欺骗、掠夺、剥削的新方法、新形式，做一些施舍——这些施舍仍然不利于群众，而利于资产阶级的地主统治阶级。

同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和巩固自己，而且社会帝国主义的中国也开始狂热地努力以进入那里。

修正主义苏联打着所谓的列宁主义民族解放斗争援助政策的幌子进行扩张主义干涉，冒充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天然盟友。苏联修正主义者利用和传播社会主义色彩的口号，作为渗透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一种手段，目的是欺骗那些渴望解放自己、消除压迫和剥削、知道实现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唯一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民族。

苏联也让它的盟友，或者更准确的说，让它的卫星国参与干涉。我们在非洲具体地看到了这一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古巴雇佣军以协助革命为借口进行干预。这是个谎言。他们的干预不过是一种旨在占领市场和奴役人民的殖民主义行动。

苏联及其古巴雇佣军对安哥拉的干预就是这种性质的。他们从未有过协助安哥拉革命的丝毫意图，他们的目的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要把爪子伸进在葡萄牙殖民者被驱逐后赢得了一定独立的非洲国家。古巴雇佣军是苏联派遣的殖民军队，目的是占领非洲黑人国家的市场和战略地位，并从安哥拉继续到其他国家，使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也能建立一个现代殖民帝国。

在苏联及其雇佣军帮助人民获得自由的幌子下，古巴装备着火炮和机关枪介入其他国家，声称要建设苏联和古巴都不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两个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干预安哥拉，是为了帮助一个资本主义集团夺取政权，这与安哥拉人民为争取脱离葡萄牙殖民者，获得自由而斗争的目的背道而驰。阿戈什蒂纽·内图【8】在玩苏联的游戏，在反对另一派的斗争中，为了自己夺取政权，他号召苏联人帮助他。两个对立的安哥拉部族【9】之间的斗争没有任何的人民革命性质。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派系争夺权力的斗争。他们每一方都得到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阿戈什蒂纽·内图在这场比赛中获胜，而不是社会主义获胜。相反，追随别国的干涉，苏联在那里建立了新殖民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的中国也在努力向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渗透。

扎伊尔就是中国如何干预的一个例子。扎伊尔是一个由围绕蒙博托【10】的集团统治的国家，这个集团是非洲大陆上最富有、最嗜血的集团。在最近扎伊尔爆发的战斗中，摩洛哥谢里菲【11】王朝的摩洛哥人、法国空军和中国都向杀害帕特里斯·卢蒙巴【12】的凶手蒙博托提供援助。法国人提供的援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干预是为了捍卫他们在加丹加【13】的特许权和康采恩，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人，以及蒙博托和他的集团。但是中国修正主义者在加丹加想要什么？他们在那里协助谁？他们是否在帮助被蒙博托及其集团以及法国、比利时、美国和其他特许权持有者镇压的扎伊尔人民？或者，他们不是也在帮助嗜血的蒙博托集团吗？事实上，中国修正主义领导层并不是间接地，而是相当公开地协助这个集团。为了使这一援助更加具体、更加具有示范性，中国派出了外交部长黄华【14】以及军事专家和军事经济援助。因此，它采取了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的方式。中国的干涉与摩洛哥国王哈桑【15】和法国的干涉具有完全相同的特点。

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干涉扎伊尔的事务，而且还干涉非洲和其他大陆的民族和国家的事务，特别是干涉那些他们千方百计想要渗透进去的国家的事务，以便在那里建立经济、政治和战略基础。

即使是美国也不敢像中国那样公开援助智利法西斯刽子手皮诺切特【16】。实际上，美国人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帮助其他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尽管他们在那里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这并不意味着美帝正在放弃自己的利益。他们确实捍卫这些利益，非常有力地捍卫它们，但方式更微妙。
所谓社会主义中国，就是以它所坚持的立场，违背各国人民、各国共产党、各国革命分子的利益和愿望，违背拉丁美洲一切进步人民的愿望。

中国正在保护着统治各国人民的，用恐怖和其他手段压制革命、无产阶级和争取国家和社会解放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努力的独裁者。有了这样的立场，中国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在马列主义的幌子下，它试图表明它是把革命的思想输出到各个国家，但事实上，中国正在输出反革命的思想。这样就帮助了美帝和法西斯当权集团。

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也在同一程度上努力防止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人民逐步发展革命斗争，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野蛮剥削，这些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一致，是在吸食他们的鲜血。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依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的国家里，革命家、进步分子和爱国者的责任，是使人民认识到这种压迫和剥削，继而教育、动员和组织人民，使人民投入解放斗争，始终牢记革命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全民族进行的。为此，必须深入分析每一个国家的国内外形势，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阶级力量的比例，阶级之间的对立情况，人民和执政的反动集团之间的对立情况，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情况。在此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即必须采取的步骤和必须使用的策略。

革命力量所需要的，是精干的工作、决心和智慧，首要的是要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事业、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他们国家的解放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因此，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党，革命党必须能够忠实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教诲，把这些教诲同每个国家的情况，同每个单独个人的情况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些政党中的每一个党都必须深刻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心理和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不能任性地、冒昧地行事，不能以布朗基主义【17】的作风行事，要坚持不懈地团结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广大的人民群众。

各国革命家和人民群众要时刻做好准备，牢记反动资产阶级和当权的大地主、外国压迫者的行径和新殖民主义者的阴谋。这些都是革命分子和人民群众必须成熟地面对的重要因素，必须有健全的组织和革命策略。

当然，不仅不能排除合作、协调和经验交流的联系，而且必须在各国革命力量和革命分子之间建立这种联系。因为他们有许多相似的条件，例如新殖民主义者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共同的文化，从这种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共同目标，所以事情会比较容易。他们共同的条件和利益，促使这些国家的革命进步分子进行协商，在行动中发展合作与协调，以对抗压迫他们的敌人的行动。

从马列主义的立场审视新殖民统治下各民族的衰败状况，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面临的任务是要给这些民族的革命和解放斗争提供无保留的支持和支持，使其不断前进，革命不断地建立起来，为了彻底的胜利。

注：

【1】译者注：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以北纬 38 度线为界，分别由美苏两军接收。在美苏的各自支持下于 1948 年 8 月朝鲜半岛南部成立大韩民国（亦称南朝鲜或南韩），1948 年 9 月朝鲜半岛北部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亦称北朝鲜或北韩）；
1945 年的八月革命以来，北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被胡志明和越盟控制着，并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正式承认，首都在河内。南部则在保大帝皇帝的统治下成立越南国，通常被称为南越，首都在西贡。国际管制委员会成立以监督停火和实行日内瓦公约，其中包括定时举行越南普选。1956 年，未能举行的选举结束了南北越的暂时分治，北部和南部都宣布独立，并展开冲突，并很快发展成越南战争。

【2】译者注：印尼共产党，1914 年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成立，1920 年加入第三国际。日本占领期间，一些党员投身于武装抗日斗争，一些青年党员与其他民族主义青年组织成员进行地下宣传活动 。1948 年转为公开活动。1951 艾地上台， 在苏中两国的默许下推行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苏加诺的统一战线政策，1965 年 9·30 事件爆发，次年军事独裁者苏哈托禁止其存在，此后印尼共倒向苏联。

【3】译者注：印度共产党，1920 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33 年 12 月建立全国性政党。1934 年被宣布为非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立场，1942 年获得合法地位。1946 年 7 月在安得拉邦特仑甘纳地区开始了持续 5 年的农民武装斗争。1951 年 10 月全国代表会议决定采取合法的议会斗争。1964 年因路线之争公开分裂，以南布迪里巴德、孙达拉雅为首的一派另建印共（马），以党主席丹吉为首的一派仍沿用“印共”名称。此后两党又发生数轮分裂。

【4】译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亚洲印支半岛发生了以越、老、柬三国以越南战场为主体的三次局部战争，印支三国人民击退了法帝和美帝的侵略，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抗，但三国领导人——首先是越南领导人被中、苏分化利用，陷入内斗和霸权主义的混乱中。

【5】译者注：“门罗主义”，由 1823 年 12 月 2 日美国第 5 届总统 J. 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内容为：

（1）要求欧洲国家不在西半球殖民。这一原则不仅表示反对西欧国家对拉美的扩张，也反对俄国在北美西海岸的扩张；

（2）要求欧洲不干预美洲独立国家的事务；

（3）保证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包括欧洲现有的在美洲的殖民地的事务。

并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此举是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标志。

【6】译者注：美洲国家组织由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前身是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成立于 1890 年 4 月 14 日，1948 年在波哥大举行的第 9 次泛美大会上改称现名。889 年 10 月～1890 年 4 月，美国同拉美 17 国在华盛顿举行第 1 次美洲国际会议，建立了“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其在 1948 年通过，1951 年正式生效的《波哥大宪章》，将原来的“美洲共和国联盟”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规定该组织的任务是巩固整个美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安排共同行动以对付可能的“侵略”；对成员国间发生的政治、法律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等等。

【7】译者注：原词 foquist，衍生于西班牙语 foquismo，似乎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创造出来的一种游击战理论。

【8】译者注：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1922—1979，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主席、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作为安哥拉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两次被捕入狱、流放，越狱和逃亡。1962 年当选为安人运主席，领导反葡武装斗争。1975 年 11 月 1 日，安人运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内图出任总统，宣布国家为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1976 年内图领导的“安人运”，在苏联价值 2 亿美元武器的援助和万余名古巴军队的支持下，击溃“安解阵”部队，并将“安盟”部队逐出城市。使安哥拉成为在非洲的苏联模式桥头堡。

【9】译者注：1975 年，葡萄牙被迫承认安哥拉独立，但是美帝和白人南非扶植的安盟和安解阵对安人运开战，苏联和古巴则积极支持安人运反击，此后安哥拉爆发了长期的内战。

【10】译者注：扎伊尔共和国，现名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1965 年 11 月，国民军总司令蒙博托发动政变推翻卡萨武布总统，自任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1930——1997，曾在比利时部队服役。1958 年加入刚果民族运动党，1960 年任陆军参谋长、晋升上校，同年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接管卢蒙巴政权，任国民军总司令，1965 年再次发动政变推翻卡萨武布，自任总统，元帅。任内以“国有化”为借口，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及亲信积累了大量财富。

【11】译者注：谢里菲（Sherifian）王朝或者阿拉维（Alawiyya）王朝，摩洛哥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封建王朝(1666 年～今)

【12】译者注：帕特里斯·卢蒙巴，1925——1961，1958 年领导建立刚果（金）民族运动党，任主席。参加领导了 1959 年 1 月爆发的刚果人民反对比利时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被捕入狱。1960 年 6 月刚果宣布独立后，任共和国总理兼国防部长。主张国家独立和统一，奉行反帝反殖和不结盟政策。1960 年 9 月被军事政变推翻，后被捕遇害。

【13】译者注：加丹加是中非高原的一部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南部和赞比亚中北部，是世界闻名的铜矿带。

【14】译者注：黄华，1913——2010，1976——1982 任外交部长

【15】译者注：摩洛哥国王穆莱·哈桑，1929——1999，在法国获法律学位后，任王家武装部队司令（1955）和副首相（1960）。1961 年在穆罕默德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迄 1963 年他沿袭父王的独裁统治。1972 年通过宪法，实行多党制，他于 1974 年开放党禁。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关于西撒哈拉的斗争中，他宣传摩洛哥的领土要求，并于 1975 年 11 月发起 10 万非武装摩洛哥人的“绿色进军”，进入这一地区。1977 年摩洛哥进行大选，支持他的人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

【16】译者注：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1915——2006，1951 年完成学业后前往军校任教，1953 年获少校军衔，1956 年—1959 年在厄瓜多尔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60 年出任智利陆军第七团团长，1963 年出任战争学院副校长，1966 年获上校军衔；1968 年获准将军衔并出任第六师师长；1971 年出任第二师师长并获得少将军衔；1972 年出任陆军总参谋长；1973 年 8 月出任智利陆军总司令，获上将军衔，同年 9 月 11 日发动军事政变夺权，政变后成立军事执政委员会并出任委员会主席，实行残酷的军事独裁并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

【17】译者注：19 世纪中期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法国布朗基为代表。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少数人的专政，从而过渡到共产主义。

真正的革命号召无产阶级和民族为新世界，社会主义世界而奋起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解释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日益加深。因此，无产阶级、被压迫阶级和民族拒绝再忍受剥削，要求改变生活，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秩序，要求打倒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这些愿望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不与内外阶级敌人发生冲突并进攻他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真正的工人阶级马列主义政党，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使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人民觉醒，并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军事上为这些冲突做好准备。

马列主义政党，所有革命者，无论数量怎样少，在人民心中树立形象，系统地组织群众，怀着巨大的关心和耐心，相信自己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能够推翻资本，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和人民谋利益。这样的政党，不认为自己小，就对抗不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和他们形成的观点。革命家的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证明，资产阶级创造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必须消灭之，必须形成代表伟大变革力量的真正的革命观点。

马列主义政党要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有革命性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响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革命地解决问题，以及消灭资产阶级秩序与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现状的斗争任务。

马列主义是赋予工人阶级革命党正确的政治路线，明确其战略目标和任务，并使其运用革命的策略和方法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的可能性的唯一科学。

在马列主义的启发下，按照国家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和国际形势，马列主义政党在任何时候，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知道如何定位自己，站在群众的前列，无论是民主的、民族的解放运动，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以马列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本国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革命战略和正确的政治路线，使马列主义政党可以明确界定既定阶段的战略目标，确定谁是主要打击的首要内外敌人。无产阶级内外的同盟者是谁等等。

马列主义政党的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而当他们的国家面临着民主和反帝国主义的任务时，他们的目标是不断地发展它，把它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尽快地去实现履行社会主义的任务。

马列主义政党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完全不同于假共产主义者和工党的战略目标。不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整个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和它的基础，前者就无法实现目标。他们坚持列宁的教诲：

"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管理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出自《国家与革命》——译者注）

后者鼓吹要维护旧的国家机器，尽管他们声称他们主张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改良，通过议会道路，甚至使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建立。

现在，许多所谓的共产党在捍卫现有资本主义秩序方面比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更热心。例如，在西班牙一些资产阶级政党要求用共和政体取代胡安·卡洛斯的君主政体之际，伊巴露丽—卡里略（Ibarruri—Carillo）的修正主义政党却厚颜无耻地为君主政体辩护。同样，在各资产阶级政党不公开这么做的时候，贝林格的修正主义政党以意大利资本主义国家压迫性法律的狂热拥护者的面貌出现了，这些法律的目的是反对民主自由。中国修正主义者则指示资本主义国家中走中国路线的政党，必须同最军国主义的集团一起战斗，加强军队和资产阶级暴力机关的力量，宣称是保卫祖国，但实际上是镇压革命，如果革命爆发的话。

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破坏革命和解放运动，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永久化，企图用各种方法迷惑和分裂革命力量，消除革命的敌人和朋友的区别。

典型的是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说教，他们把大垄断资产阶级、反动法西斯政权、北约和欧洲共同体，甚至美帝，当作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同盟。

就马列主义政党而言，他们认为建立真正革命战略的绝对必要条件是在革命的发动力量和敌人之间建立一条清晰的分界，并明确地找出主要的内外敌人，正如斯大林指出的那样， 瞄准主要敌人，但也不能低估和忽视与其他敌人的战斗。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革命的主要国内敌人，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被压迫和不独立的国家，都是站在资本主义秩序的顶端，用一切手段，用暴力和压迫，用蛊惑和欺骗进行抵抗，维护统治和特权，扼杀和消灭任何哪怕只是轻微危害其国家权力和阶级利益的工人运动的

地方大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在实际情况下

革命和人民的主要外敌是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像中国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劝告和号召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依靠一个超级大国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作战，或者借为了捍卫民族自由和独立之名而同帝国主义列强结盟，不过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修正主义者把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统治地位——革命战略的根本问题之一——作为他们的特殊攻击目标。

列宁写道：*“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出自《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译者注）

列宁把革命运动中对无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否定说成是改良主义最庸俗的表现。

在现代修正主义者中，有些人试图证明工人阶级已经去无产阶级化，并转化为企业的“共同管理者”，因此不再有需要无产阶级革命的地方，不需要一个与现存的社会秩序不同的社会秩序。还有人说，不只是工人，现在从事劳动和文化活动的人和所有的工薪阶层都是无产阶级，而且不仅工人阶级，社会其他阶级、阶层都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在今天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已经失去了意义。苏维埃修正主义者不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而在实践中却否定了它，因为他们剥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任何可能性。但即便在理论上，他们也消除了这种角色，因为他们捍卫声名狼藉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中国修正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一样，有时把农民，有时把军队，有时把中小学生，等等，放在革命的首位，这是不合时宜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决捍卫马列主义的论点，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世界革命变革的领导力量，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是最先进的阶级，是最关心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最关心社会主义的阶级，是革命组织和斗争的优良传统的承载者。它拥有社会革命转型的唯一科学理论，以及自己战斗性的马列主义政党引领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客观上，历史赋予它领导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斗争的使命。

新政权可以根据革命的具体情况和进入的不同时期，经历不同的阶段，取不同的名称，但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革命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胜利方向发展。马列主义教导我们这一点，所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无论革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马列主义政党都决不放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都无一例外地以某种方式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因为他们反对革命，因为他们主张维护和延续资本主义秩序。

无产阶级和马列主义政党与自己的同盟者一起作战。这也是革命战略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贫农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亲密盟友，这不仅与眼前的战略目标相联系，更是与长远和最终的战略目标相联系。城市劳动人民中的贫困阶层也是这样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同贫苦的农民和其他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一道，是革命的主要动力。

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同盟者，因为他们始终处于大资本的控制之下，面临着财产被完全没收的威胁。

无产阶级还在努力斗争，使人民中的其他阶层和自己结成同盟，例如被国内外资本剥削的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力量。在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知识界的分量增加了。但是，尽管它的地位、性质和工作的作用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它本身并不能也永远不能构成一个阶级，也不能像各种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与工人阶级合并。因此，正如列宁所展示的和历史所证明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思想政治理念所决定的。无论这种立场和这种理念有多大的变化，知识分子永远不能取代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作用。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知识分子中的进步派，使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同盟者。

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社会经济发展不大、对外资依赖较多、民主和反帝的革命任务特别重要的国家，中农和中等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没有联系，且渴望一个独立发展的国家——也可以是无产阶级的盟友。

把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同民主反帝革命结合起来，有赖于无产阶级的正确战略战术，有赖于工人阶级革命党的娴熟和智慧的手段。这样，无产阶级和它的党不仅可以说服小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服这种资产阶级，使他们把自己置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起来消灭外国的统治，消灭野蛮的大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人民，使他们士气低落，败坏他们纯洁的感情和几百年来的文化的工具。
无产阶级要争取在革命某一阶段有志于实现战略目标的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同盟，就必须同大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作斗争，对于其他问题也是一样。

反动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预见了自己的失败，千方百计地把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拉到自己这边来，防止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他们甚至企图欺骗工人阶级本身，使革命不爆发，如果爆发的话，则保证革命不进行到底，而陷入泥沼或者掉头。

无产阶级和马列主义的党尽一切可能实现盟友的团结，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如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还要防止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为大资本的储备军，以及防止就像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西班牙佛朗哥那样的法西斯专政。

马列主义政党需保持谨慎和灵活的态度，尤其是对摇摆不定、可能或暂时的盟友，包括中等资产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他们以各种利益、传统和偏见，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联系在一起。

革命的铁律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在修正主义者掌权的国家适用。在欧洲修正主义国家发展起来的新资产阶级的地位是什么？它渴望摆脱苏联资产阶级和社会帝国主义全面、野蛮的压迫，但双方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离开苏联资产阶级，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脱离这个野蛮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也无疑很快就会受到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美帝的统治。

同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正在融入强大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国家，除无产阶级外，还有其他阶层的人，因为受到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而不满。为此，他们既痛恨自己国家的统治资产阶级，又痛恨俄国的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要唤醒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在战场上再次挺身而出的历史必要性，认识到为了再次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了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投入推翻和击溃叛徒的斗争的历史必要性。必须建立新的马列主义政党，团结群众。

在坚持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内部革命，即自己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外部因素是辅助和次要性质的原则时，马列主义政党丝毫不忽视或低估革命的外部盟友。同时，他们对外部（译注：霍查这里的语境应该是国家的内部或外部）盟友采取原则性的和灵活的立场，就像对待内部盟友一样。

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教诲，立足于现有条件，他们看到了别果断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反帝运动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每个国家的革命运动中作为自然和可靠的外部同盟。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也可以创造出这样的情况：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会同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统一战线上，与同一敌人作战，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确保革命的利益始终要牢记在心，决不因共同战线或与这些临时盟友结盟而被遗忘、蒙蔽或牺牲，确保这一战线或同盟本身不变成一种要达到的目标，是头等重要的。尤其重要的是，不要让这样的同盟干涉破坏革命，夺取革命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对美、英同盟国的立场经验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立场对阿尔巴尼亚革命的命运是有益的。
革命长期战略与马列主义政党为实现革命目的和完成革命任务而采取的革命策略是分不开的。作为革命战略（译注：strategy，战略，用于全局性策划与指挥大规模作战的军事指挥的科学与艺术；tactic 策略：为达到一个目标所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的一部分，为其服务，策略可能会根据革命潮流的起伏、具体的形势和条件而变化，但总是在革命战略和马列主义的原则范围内。

*“策略领导层的任务，”*斯大林说，*“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所有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并确保他们被适当地使用，以使这些力量的关系得到战略成功所必须的最大化成果。”*（出自《论列宁主义基础》——译者注）

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虽然也采取巧妙的策略和斗争形式来推动革命事业，但始终忠实地坚持革命原则。他们拒绝和反对任何由于革命策略的缘故而放弃原则的倾向，他们是任何基于暂时情况而实行无原则的务实政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这是各色修正主义者全部活动的特征。

革命永远是革命先锋队领导的群众的行为。因此，马列主义政党不能不以适当的形式集中精力关注群众的革命组织，立足于存在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国情和传统。如果党与群众不进行有组织的联系，那么唤醒、准备和动员他们进行革命斗争就是个空谈。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列主义党非常重视自身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的创建。当然，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今天，在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工会、合作社、文化的、科学的、青年的、妇女的和其他组织存在于所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时候。这些组织大多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和教会

的领导和影响。

然而，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那样，共产党员必须在群众所在的地方工作。因此，他们也不能不在资产阶级、社民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领导和影响的群众组织中工作。马列主义者在这些地方工作，以破坏资产阶级和改革派的影响和领导，散布工人阶级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揭露这些组织领导人计划和活动的欺骗性，并给予群众活动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的政治性质。通过他们在群众中进行的革命工作，也可以在这些组织中形成革命派别，这样确实可以创造接管这些组织的领导，使它们走上正确道路的可能性。

但无论如何，马列主义政党决不放弃建立自己领导下的群众革命组织的宗旨。

最重要的群众组织是工会。总的说来，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这些组织是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服务的，是为了使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继续受奴役。恩格斯在他那个时代说过，英国的工会已经从吓唬资产阶级的组织变成了为资本服务的组织。工会组织用千丝万缕、的奴役链条把工人束缚起来，这样，彼此孤立的工人反抗时，就很容易被镇压。机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工作，以使搞罢工或示威的一个乃至多个企业的工人的叛乱得到控制，并只呈现经济上的性质。工人贵族很努力地朝这个方向搞操纵活动。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贵族在腐蚀、镇压、误导群众起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成为平息革命火焰的消防队。

在今天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修正主义政党都有自己的工会。这些工会现在团结起来，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以遏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腐化工人阶级。

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的工会是强大的大工会。但是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试图把无产阶级束缚起来，哄它入睡，当它变得愤怒和叛逆时，使它走上与老板谈判的道路，并用资本家超级利润的一些非常小的面包屑封住工人的嘴。他们所给的东西之后都会通过提高价格收回。

因此，要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各国无产阶级必须摆脱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控制的工会的束缚，摆脱任何一种社民和修正主义的组织或政党的束缚。所有这些组织都以各种方式支持自己的阶级，并试图制造一种错觉，即“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是一道障碍，他们可以把自己强加于大资本家之上，宣称是为了无产阶级。这不过是个大骗局。无产阶级必须粉碎这些组织。但是怎么做呢？要消灭他们，必须同这些工会的领导作斗争，必须反对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奸诈联系，必须打破他们所要建立的“稳定”和“社会和平”，以及工会不时从事的所谓对有产阶级的反抗来掩饰的“和平”。

为了从内部打击和逐渐毁坏工会，反对工会的不公正决定和行为，还有可能通过加入工会来摧毁工会。这种活动必须牵扯到工厂里最大、最有力量的工人群体。在每一种情况下，目的都必须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钢铁般的团结，不仅要同雇主斗争，而且还要同他们的代理人、工会老板斗争。工会领袖的一切叛卖分子，工会领导层和整个改良主义工会向着资产阶级的堕落，都被有力地揭露出来，使工人们从对这个领导层和这些工会的许多幻想中清醒过来。

在渗透现有工会的同时，马列主义者从未堕落到工团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立场——这些特征恰恰代表了这些工会的领导层。他们决不与工会领导层的修正主义者和其他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合作。他们的目的是揭露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一切工会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反动作用，破坏这些组织，为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会开辟道路。

青年组织对马列主义政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历来很大。从本质上讲，青年标新而除旧，并显示出自己准备为一切进步的、革命的事业的胜利而斗争。然而，只凭自己，它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只有工人阶级的党才能指明这条路。当青年人无穷的革命能量，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能量，联合起来消灭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时，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革命的胜利。

然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大多数青年人把精力用在了错误的方向上。他们受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误导，常常转向冒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或者陷入乌托邦和绝望，因为他们被弄得迷失方向，困惑不解，对未来，对实现政治、物质和精神要求的前景抱着悲观的看法。马列主义者十分重视青年人，试图启发他们，使他们相信青年人的需求和愿望只能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他们正在努力使青年人摆脱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影响，摆脱“左派”、托派或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影响，动员他们参加革命组织，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真正的马列主义党和革命的共产主义者积极参加工人罢工和示威活动，进行政治斗争和示威游行，使资本主义、雇主、卡特尔、垄断者和工会领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在这广泛的活动中，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秩序的武装力量的斗争，会更加经常和公开，但是从这些斗争中，无产阶级将学会更好

地战斗。在斗争的过程中，也发现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革命斗争是可能的、正确的、适当的。俗话说："不下水就不会游泳"。不采取罢工、示威的方式进行斗争，不积极地参加总的反资本主义的行动，就不能组织和加强争取最后胜利的斗争，就不能推翻资本主义秩序。

革命的准备，不是像各种修正主义者那样光搞嘴上功夫，也不是像中国修正主义者那样提出"三个世界"这样的理论。它不能在和平的道路上取得胜利。列宁确实讲过在具体的例子中和平胜利的这种可能性，但他总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暴力上，因为资产阶级从来没有主动投降过。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发展和工人阶级胜利的历史，表明到目前为止，革命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取得胜利。

革命武装暴动与军事政变毫无共同之处。前者的目的是彻底推翻旧政权，粉碎它的根基。后者没有，也不能导致压迫剥削秩序的推翻和帝国主义统治的覆灭。武装暴动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基础上的，而政变则是不信任群众、脱离群众的表现。称自己为工人阶级的党的政党政策和活动中的盲动主义倾向，是与马列主义的背离。

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大局，武装起义可以是一个突然爆发的革命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更加持久的革命过程，但不能是像毛泽东主张的"持久人民战争"那样，没有远见的、无休止的革命过程。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革命武装起义的学说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相比较，那么这一理论的反马列主义、反科学性就变得明显了。马列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学说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城市斗争与农村斗争紧密结合的基础上的。

毛主义理论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农村是武装起义的唯一根据地，忽视了城镇劳动群众的武装斗争。它鼓吹农村必须包围被认为是反革命资产阶级根据地的城市。这是对工人阶级不信任的表现，是对工人阶级统治地位的否定。

工人阶级革命党在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将其作为普遍规律的同时，坚决反对冒险主义，从不轻浮地对待武装起义。它在一切条件和情况下，都不断地进行着革命斗争和各种形式的活动，为革命的决战，为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自己和群众作准备。但只有革命形势完全成熟，才能把武装暴动直接提上日程，采取一切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措施，把武装暴动引到胜利上。

宣传是马列主义政党为革命作好群众准备的有力手段，但必须是激情的、明确的、令人信服的。革命宣传如果仅仅是空谈惑众的话，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深入的宣传，同生活实际问题、总的问题、地方性的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广大群众中创造并鼓励主动的精神，才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教育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让他们行动起来，为革命做准备。

各国的资产阶级，除了军队、警察等可以使用的强大的武力手段外，应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活动也有广泛的经验。同样，它也有完整的宣传网络，包括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戏剧、音乐等，所有这些宣传都有使人腐化的力量，能够暂时地迷惑、歪曲和削弱无产阶级的努力和解放斗争。

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也存在着民主自由的衡量标准，仅仅对资本主义进行正常的新闻宣传是不够的。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政党的报纸上，不断地叫嚣着，当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秩序，而是反对个人，反对那些企图在他们坐在一起牺牲人民来狼吞虎咽的饭桌上攫取超过自己那份蛋糕的人。

宣传，特别是新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报刊，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撕开一切耍花招的面具，以及修正主义者和其他资本家走狗的蛊惑。

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报刊，揭示赤裸裸的真理，展示通过革命进行社会和民族解放的道路，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宣传和报刊欺骗人民，哄他们睡觉，使他们迷失方向，使群众脱离革命，把他们引到盲道上，使他们蒙受奴役。

但是为了启迪群众，使他们相信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为革命作准备，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列宁说，为了准备革命，*"……将是以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来消除各种可能产生的错误和幻想。"*（出自《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译者注）

宣传只有和革命行动一起进行，才能起作用，才能达到目的。没有行动，思想就会枯萎。这种活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冒险，而是刻苦的斗争，是同阶级敌人的激烈冲突，是从简单到高级的斗争，是克服无数困难，接受革命要求的一切牺牲的斗争。

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站在革命行动的前线，而不是末尾。对资本主义反动派巨大的力量——它们必须而且确实反对的——的斗争和努力的暂时效果有限的可能性，并不使他们气馁。它们教导党员要有

勇气，要牢记，一个正确的、周密的、成熟的、坚决的行动，在看到和听到这些的群众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共产党人这样做，群众就认识到，这场或那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者的利益。行动上的勇气和成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一点一点地取得了进展，打下了基础，建立了革命的高潮。革命行动把工人阶级政党同群众联系起来，使他们走到群众的前列，使他们战胜了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政党。

"一步实际行动，"马克思说，"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出自《哥达纲领批判》——译者注）

除了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之外，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其他与警察、宪兵等斗争和冲突的力量。这些部队的许多行动和袭击都具有恐怖主义、冒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它们以各种颜色和标签呈现，并以各种意识形态为指导。这些行动通常是在受教唆以及受资本主义国家秘密组织的基金支援的，此外，目的是通过将这些行为归咎于马列主义政党来诋毁它们。法西斯分子或者资产阶级的特务，经常组织领导这些行动，企图利用无产阶级、中小学生和广大青年的不满、愤怒和勇气，使这些群众中涌现出的各种团体和运动参与到同真正的革命运动既没有共同点，又严重危害革命运动的行动中去，造成无产阶级正在退化，已经成为愚蠢的无产者的印象。

马列主义政党要对这个问题足够重视，一方面，必须用自己的经验说服群众革命行动与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完全不同，另一方面，要争取被欺骗的人成为革命分子，让他们远离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远离法西斯分子、资产阶级特务。

马列主义政党是革命的政党。与完全深陷于资产阶级合法性中的和"议会迷"的修正主义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反，他们没有把斗争简单地削减为合法斗争上去，也没有将合法斗争看作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在掌握着一切形式斗争的情况下，他们特别重视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的结合，并把非法工作放在第一位，作为推翻资产阶级的决定性因素和真正胜利保证。他们教育传授干部、党员和支持者，使他们懂得在合法和非法的条件下，如何聪明、熟练、果断地行动。但是，即使在艰深的秘密条件下，在避免向敌人暴露力量、保护革命组织不受敌人打击的情况下，马列主义政党也决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削弱，也不打断与群众的联系，决不放弃在自身和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各种合法可能性，来为革命事业服务。

在对走议会道路夺取权力的可能性不抱幻想的同时，马列主义政党也可以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以宣传群众路线，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秩序为唯一目的，考虑去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国会选举等合法活动。在马列主义者的活动中，他们不担心用革命行动打破和违反资产阶级的宪法、法律、规章、规范和秩序。他们正在为破坏这个秩序，为革命做准备战斗。因此，马列主义政党要为自己和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准备，以应对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中发动的反击。

作为一个复杂的，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有着众多的阶级和政治力量参加的过程，在革命和解放运动发展的今天，无产阶级革命党面临在革命的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在这些那些共同的问题上，同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合作和共同战线的问题，并不少见。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有原则的，同时灵活的立场，并不搞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对于吸收、准备和动员群众进行革命和解放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在革命事业的利益需要和形势需要的情况下，马列主义政党不能且原则上不应反对同其他政党和力量的合作和共同战线。但是，马列主义政党从来没有把这看作是土著联盟，也没有把其本身看作目的，而是团结和发动群众斗争的手段。重要的是，在这些共同战线上，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忘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斗争的最终目的，决不能溶解在共同战线中，而必须保持思想上的个性和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的独立性，必须争取在共同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在那里实行革命政策。

马列主义政党要能够制定和运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正确的政治路线，知道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找到克敌的方向，克服障碍，就必须进行伟大而广泛的斗争，同时学习和吸收马列主义理论。

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共产党之所以变成修正主义政党，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完全忽视了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吸收。马列主义只是作为一种装饰，变成了空话和口号，没有深深地植入党员的意识，没有成为党员血肉的一部分，没有成为行动的武器。为党员学习马列主义所做的那一小部分工作，只不过是为了使他熟悉一些老生常谈的公式，这足以使他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感情用事地热爱共产主义，至于怎样、以什么方式实现共产主义，他一无所知，因为他没有被被教过。这些政党的领导人不缺言语，缺行动，生活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用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感染了他们国家的无产阶级。

因此，修正主义政党向资产阶级的转变，是一种社民主义、机会主义的演变，它的领导人早就准备好了，这些领导所谓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就是社民派、工人贵族。

马列主义政党不能不记住负面教材，并从中吸取教训，必须在良好的基础上组织学习和吸收马列主义，

始终把学习和革命行动联系起来。

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与合作，对于革命的准备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反对赫鲁晓夫主义、铁托主义、“欧洲共产主义”、中国修正主义等方面，这种团结和合作将进一步扩大。

修正主义者作为革命的敌人，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斗争，以便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从各国无产阶级手里夺取这一有力武器。

不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支持民族革命和解放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同包括极右派和反动派在内的社会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政党走上了和解友好的道路。同时，它正试图创建依赖于它并由它指挥的各种集团。它需要这样的集团，正是为了破坏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那些致力于唤醒人民、鼓动人民进行革命以反对与超级大国有联系的统治集团的进步分子。这些自称为党，尾随中国路线的小集团，作为机会主义者，除了保卫和宣传华国锋、邓小平集团的修正主义理论和反革命行动外，什么也不做。这些团体完全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按照马列主义理论进行斗争的决心。这些政党的主要口号，也是中国政策的基本口号，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唯一根本任务和角色，就是保卫民族独立，宣称民族独立仅仅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他们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着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口号，这些第二国际领袖放弃了革命事业，取而代之的是保卫资本主义家园的论调。列宁揭露了这种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即其不是为了保卫真正的独立，而是为了煽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他对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冲突，明确地解释了真正革命的立场。他写道：

“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成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成了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一出路……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出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译者注）

走中国路线的政党，以保卫民族独立的必要性为借口，成为资产阶级军队发展壮大的辩护者。他们号召劳动人民做顺从的士兵，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他们反对一切要削弱资本主义统治和剥削的这一主要武器的人。总之，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预备的掠夺性战争中充当炮灰。

同时，这些中国人的附庸也成为他们认为是“捍卫独立”的主要因素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特别是北约、欧洲共同体等等的坚定捍卫者。和中国领导人一样，他们粉饰和美化了资本主义统治和扩张的这些支柱。他们正是在帮助那些实际上严重侵犯他们国家独立和主权的组织。

这些没有前途的群体的这些立场，正使他们走向同欧洲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一，这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在号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些伪马列主义者和马歇（当时的法共总书记——译者注）主义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马列主义者必须非常警惕现代修正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伪马列主义者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产阶级团结保卫和平等问题上使用的空话。当人们首先是在自己的国家自我牺牲地帮助和开展革命行动，创造真正的革命斗争局面时，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正如列宁所说，他们必须用宣传、同情心和物质援助，无一例外地支持各国的这种斗争和路线。他告诉我们，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欺诈和马尼洛夫（此处霍查用《死魂灵》之典故，意指夸夸其谈——译者注）式的。

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警惕这种伪马克思主义、伪革命、伪国际主义的分子，不管是个人，还是小团体，还是实际上不是马列主义的，而是社会沙文主义、中派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称马列主义的政党。所有这些拍着胸脯谈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保卫和平、改革等等的政党，都是为资本服务的。

中国修正主义者有时也谈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他们站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上。中国领导人就是那些拍着胸脯，向上帝发誓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拥护和平，拥护无产阶级的斗争和主张，但实际上只会袖手旁观，用欺骗性的话分裂革命力量的人。马列主义政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不论大小新旧，都必须在各党派中发展。他们必须加强团结，协调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和战斗上的行动。

强调这一重要路线，是马列主义政党的首要任务，以便能够对世界资本主义及其奴役政策，以及它与苏联、铁托、中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的阴谋、诡计和联盟发动正面攻击。

强调这一路线，这些政党将建立一个强大的共同战线，并日益牢不可破。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打击反动派，揭露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为镇压革命、平息阶级斗争而以各种方式炮制的种种阴谋，他们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我们马列主义者，无论工人在哪里，都要奋斗并号召他们同他们的宿敌作斗争，号召他们挣脱枷锁，进行革命，而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服从于垄断者和资本家。马列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家的任务，是号召无产阶级和各民族为新世界、为他们的世界、为社会主义世界而奋斗。

第二部分

★

第一章

“三个世界”的理论：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理论

今天，中国修正主义者也公开站出来，并在广泛的阵线上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战略以及民族解放斗争。他们试图用他们的“三个世界”理论来反对这种光荣的科学理论和策略，这是一个错误的、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的理论。

“三个世界”的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相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它的否定。谁是第一个将“第三世界”一词最早发明出来的人或谁是第一个把世界分成三部分的人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列宁没有进行这样的划分，而中国共产党却声称是毛泽东自己发明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如果他是最早提出这一所谓理论的作者，这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即使他只是从别人那里采纳了这一理论，这也足以证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三个世界”的概念—对马列主义的否定

存在三个世界或将世界一分为三的概念是基于种族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反动派的产物。

但是，将国家置于三个层次或三个“世界”中的种族主义论点并非仅仅基于肤色，它还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一方面是用来定义“优秀种族”，另一方面是用来定义“低贱种族”，以此来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制造不可改变的形而上的种族分裂。它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人民视为一群羊，是一个无定形的整体。

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接受并鼓吹必须保留“优等种族”，而“低贱种族”必须竭尽全力地为它服务。

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发展没有极限，一切都不会停止变化。在朝着向未来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量和质上的变化。同其他时代一样，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深刻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清楚地界定了这些矛盾。这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一个使革命和工人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夺取政权发生巨大的量变和质变的时代。

马克思的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辩证主义之上的。马克思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只有在实现了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之后，阶级才会消失。

今天，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阶段。这意味着，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两个主要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处于不可调和的生死斗争中。

他们中谁会胜利？马克思、列宁以及科学马列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无产阶级终究要通过消灭、推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者的力量而取得胜利，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还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个新的社会中，彼此密切联系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将存在很长时间，但也会有被推翻、剥夺特权阶级的残余。在这一整个时期，这些残余分子，以及那些腐朽的、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都会试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力量。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着严峻的阶级斗争。

马列主义者应始终牢记，在所有国家——除了那些革命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的国家——都有以无产阶级为首的贫穷阶级和资产阶级为首的富裕阶级。

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它在哪里，无论它是否民主和进步，都有被压迫者和压迫者，有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存在着对抗，这就是无情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强度的变化的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这场斗争有起有落，但它存在并且不能被平息。它无处不在，它存在于美国的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它同样存在于苏联——在那里，马列主义遭到了背叛，苏联制造出的新资产阶级压迫着劳动人民。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存在于第二世界，例如法国、英国、意大利、西德、日本。它们还存在于“第三世界”中，在印度、扎伊尔、布隆迪、巴基斯坦、菲律宾等。

仅根据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那任何国家都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这一理论看不出它们，因为它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地缘政治概念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判断国家和人民的。

将世界分为三部分，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而“第三世界”，正如中国修正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不是从阶级的角度来看的，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否定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从落后社会向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向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斗争。将世界一分为三，就是不承认时代的特点，阻碍无产阶级和人民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前进，阻碍与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在各国和世界每个角落的资本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三个世界”理论倡导社会和平，阶级调解，并试图在顽固的敌人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建立联盟。这是试图延长旧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寿命，试图通过消除阶级斗争来使它稳步发展的尝试。

但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夺取政权的斗争，资产阶级维持其权力的斗争永远都不会消失。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对于“世界”来说，无论是“第一世界”、“不结盟的世界”、“第三世界”，还是无数其它世界，没有任何空洞的理论可以改变这一点事实。接受这样的划分就意味着放弃和放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斯大林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个世界：（译者注：黑体是霍查加的）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尽管当时社会主义仅在一个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列宁在 1921 年写道：

“……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旧世界，它陷入了困境，却永远不会退让；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它还很弱，但一定会壮大起来，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出自《关于共和国

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译者注）

即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还未胜利，新社会还未取代旧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但这种分开世界的阶级标准在今天仍然有效，胜利的事明天肯定会发生。

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被背叛的事实丝毫不改变列宁主义的世界划分标准。现在和以前一样，只有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不仅在国家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存在着。

中国修正主义者以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背叛导致社会主义阵营不再存在为借口，否认社会主义世界的存在，却故意忽略了一件事：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丝毫改变不了历史总体上是走向革命和走向帝国主义崩溃的趋势——尽管有着资本主义现在仍然存在的事实。同时，他们忽视马列主义的不朽思想存在着，并正在发展和胜利；忽视了马列主义政党的存在；忽视了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存在；忽视了为自由、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战的民族的存在；忽视了世界无产阶级存在和斗争着。

巴黎公社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遭到镇压，但它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马克思说，公社的经验尽管揭示了法国无产阶级暂时的弱点，但它为各国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作了准备，并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条件提供了很好的教训。马克思指出了那些“冲击”到理论高度的公社的伟大经验，并告诉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来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其专政的统治。

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懦夫，他们认为今天的反革命力量非常强大，但根本这不是真的。反革命力量比人民弱，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更强大。他们将粉碎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种观点是基于对世界的阶级分析，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都是错误的，无论修正主义者如何用革命性的话语掩饰其活动和恐惧。

当我们的马列主义者说有两个世界，而不是三个或五个世界时，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必将导致旧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世界的破坏和新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建立。

无产阶级是我们时代的社会动力。列宁强调指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代表着：

“……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出自《打着别人的旗帜》——译者注）

然而，与列宁的论点相反，中国修正主义者试图把“第三世界”呈现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巨大动力”。发表这样的言论意味着对在理论和实践上错误的动力做出定义。在这个以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时代，怎么可能把由资产阶级和封建主，甚至是公开的反动派和法西斯为统治主体的国家称为动力呢？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严重歪曲。

中国领导人没有考虑到在“第三世界”中有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事实，一面是无产阶级和被奴役的、贫困的农民，另一面是利用和剥削人民的资本家和地主。不指出所谓的“第三世界”中的这种阶级状况，不指出存在的对立，就是要修正马列主义，捍卫资本主义。通常，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是掌权者。这个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利用国家，剥削和压迫穷人，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并使人民永远处于奴役和苦难之中。

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中，执政的政府当然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政府，具有不同的政治差异。他们是反对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贫农的阶级政府，他们反对革命和解放战争。

在这些国家中具有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正是在保护为无产阶级与城乡贫困阶层结成联盟所企图推翻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构成了上层阶级，而从自身狭隘的利益出发，随时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出卖该国的土地财富和地下资源，以及人民的自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给外国资本主义。这个阶级无论在哪里执政，都与无产阶级及其盟友、被压迫阶级和阶层的斗争和愿望相悖。

中国领导的“第三世界”中的许多国家并不反对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倡导称这些国家为“革命和反帝斗争的主要动力”，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明显。也有其他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至少知道如何隐藏和掩饰自己的资产阶级理论。

中国修正主义者不仅对第三世界持此观点，还对所谓的“第二世界”有同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那里仍然被身为帝国主义者的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昔日的帝国主义强权统治着。在所谓的第二世界国家中，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它被剥削入骨，被镇压性的法律、军队、警察、工会所有这些资产阶级专政武器压制了下来。无论是在“第三世界”的国家还是在“第二世界”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同样的社会力量，它们统治着无产阶级和人民，且必须被粉碎。在这里，主要动力也是无产阶级。

就像他们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中所做的一样，在美国和苏联，中国修正主义者也无视代表革命伟大力量的无产阶级，恰恰否定了社会的主要动力，攻击资产阶级、阶级敌人和整个世界革命的敌人的动力。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否认了这一伟大现实，并轻视了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确实，无论是所谓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还是第一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也存在着某些堕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与敌人作战——不仅是用武器和压迫，更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用它创造的生活方式。但是，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例如工人贵族的堕落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马列主义，剥夺工人阶级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通过正确的马列主义教育，通过日常的革命活动，保护各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摆脱堕落并动员它与反对者进行斗争，无论他们是英国还是法国，意大利或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美国或日本等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通过正确的马列主义教育，通过日常的革命活动，保护各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免遭堕落，并动员他们与压迫者进行斗争，无论英国还是法国，意大利或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美国或日本等等。

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头目美国，也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作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有的国家，因此，资本为欺骗无产阶级而扔出的面包屑要比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大得多。在美国，资产阶级创造的生活方式对无产阶级具有更大的影响，但我们至少不能否定美国无产阶级对该国革命的作用和贡献。

实际上，在美国，也有一部分人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资本家、托拉斯、银行等压迫。即使在美国的小资产阶级中，也存在着要求抵抗大资本的压迫的反抗意识。

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通过否定阶级斗争，也否定了人民摆脱外国统治，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也否定了他们为争取社会主义所作的斗争。这种反革命和反科学的理论排除了人民同其敌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整个国际大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可能性。

把人民置于“三个部分”，并鼓吹只有“第三世界”才渴望摆脱帝国主义，只有它才是“反帝的主要动力”，这是对马列主义的一种欺骗和公开的偏离。如果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要被包括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中，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把“第一和第二世界”的人民放在哪里（他们也在为自己的解放而向同一个压迫者斗争）？将世界一分为三的发明者和支持者完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根据他们的反马列主义概念，他们把帝国主义者、统治者和人民看成一个整体。

马列主义者无法将苏联人民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两面派以及统治人民的新资本家等同起来。同样，他们不能把美帝和美国人民混为一谈。如果他们像中国修正主义者这样做了的话，那么革命者将犯下严重的理论错误，就是使自己反对革命，也恰恰支持无产阶级和敌人巢穴中的人民也在反抗着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资本力量。

在这种分开世界的方法弄混了反对压迫他们的寡头并与之艰苦斗争的人民的个性、理想和发展的情况下，中国人号召“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结盟，以对抗第一世界的一半（译注：指苏联）有何意义？人民的抵抗与革命斗争的水平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马列主义者必须开展宣传工作并动员自己，通过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其欺诈的意识形态不断阶级斗争，来达到最终目的。

中国修正主义者不仅把人民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融为一体，而且在鼓吹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被纳入“第三世界”的时候，变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与存在着敌对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第三世界”一脉相承，与“国王和王子”一脉相承？中国修正主义者称他们的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声称他们把自己纳入“第三世界”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的人民。这是一种欺诈，他们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扩张目的。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帮助和支持人民的斗争，并不需要把世界一分为三，并不需要把自己纳入“第三世界”。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阶级标准指导自己的立场，帮助人民，帮助无产阶级，帮助真正的民主、主权和自由，而不是帮助国王、亲王和反动集团统治的国家。我们帮助那些希望摆脱超级大国枷锁的人民和民主国家，但我们强调，除非他们也同与超级大国有关的国际垄断势力作斗争，否则是不可能按照君主统治阶级的标准来走上正确的道路的。

中国领导人声称通过把自己放在这个虚构的“第三世界”中解决了这个复杂的阶级问题，但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与中国领导人的主张相反，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都没有反对“第一世界”，或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或第二世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趋势是为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但是中国将自己包括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国王、埃米尔与蒙博托和皮诺切特式的

反动集团的政府，则不包含在这一行列中。

对于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领导人不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世界革命的利益进行阶级划分。这些民族国家（大多数由资产阶级的上层领导着）受到美帝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影响，并与美帝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许多联系。

在这些国家中，在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穷人、受压迫的农民，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奴役者，两者之间有深刻的内部矛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这些国家人民的援助，应当是对他们在建立真正民主国家方面取得进展的巨大激励，而不应遮挡这种前景，不应影响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革命是不能进口的。它将由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来执行。当然，夺取政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正如列宁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必须创造出条件，使无产阶级在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都站在推翻独裁者和反动资产阶级腐朽的国家政权与建立人民政权的斗争的前列。

我们共产主义者根据列宁主义阶级标准对当今世界进行的划分，并不妨碍我们与超级大国作斗争，并支持所有寻求解放、与超级大国相抵触的民族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全心全意地、有力地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符合自身的利益，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外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但是要像中国领导人那样掩饰和歪曲马列主义的原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欺诈和欺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没有做过也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将是对其本国人民、对其他民族、对国际上无产者和革命不可原谅的罪行。

中国共产党主张将世界分为三部分，主张阶级和解。

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永远不会忘记列宁的教诲，他们强调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缓和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用“革命”的陈词滥调，同时剥离马列主义的革命内容。这就是中国修正主义领导层鼓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解并和平共处的做法。

正如恩格斯和列宁所教导我们的那样，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或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和解的，相反，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社会政治冲突。国家的存在证明了阶级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因此，通过鼓吹无原则的统一，试图减轻这些在“第三世界”、“第二世界”或“第一世界”的各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国家中可以看到的阶级对抗，就是否定矛盾存在的客观性质，用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中国的“理论家”试图调和永远无法调和的阶级，这意味着他们处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立场。

当中国修正主义者认为包括他们的“第三世界”国家阶级和平盛行，以及一些国家成为了阶级和解有机体时，对马克思的理论的歪曲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宣传的那样接受“第三世界”的概念，就会创造出一种服务于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国家组织的观点。正如列宁在抨击修正主义者时所说的那样，淡化阶级斗争的论断就是支持这种压迫并为之辩护。在“第三世界”中寻求团结，实际上意味着在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寻求统一，即试图减轻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人民和外国压迫者之间的对立。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这些说教，违背了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利益，违背了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社会正义的愿望。

组成号称的“第三世界”或“不结盟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依赖外国金融资本，在那里，这种外国金融资本如此强大和广泛，以至于在这些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国家并不享有完全独立，相反，他们依赖于这一庞大的金融资本，并遵循它制定政策，散布证明剥削人民有理的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一经揭露，他们便提出反对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各种“理论”。为了遏制各国人民对自由，独立和主权的渴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理论家将这些愿望打为“不合时宜”，并给其各种形而上学的解释，继而以“世界相互依存”【1】为口号加以反驳——号称其表达了人类社会当前的发展趋势；或以“有限主权”【2】的口号反驳——号称其代表了所谓社会主义共同体等的最高利益等等。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以各种形式和方向侵犯各国的自由、独立和主权的现实，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资产阶级正在丧失其统治阶级地位，世界无产阶级则已经成为了一支巨大的力量，并为摆脱资产阶级的盘剥而进行了无休止、无情的斗争。在人民的打击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下，资产阶级被迫在法律上放弃的殖民主义，并正式承认许多国家的自由，独立和主权——对这些国家的长期占领和剥削早已深之入骨。

然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合法的自由、独立和主权至今仍停留在正

式承认上，因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又以新的形式继续统治那里。利用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落后，来延长他们对前殖民地的统治。由于革命力量缺乏组织，这些反动势力利用阴谋诡计进行分裂和统治，在这些国家仍然可以找到适合如此行事的环境。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应认为，由于前殖民国家尚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和主权，它们的斗争就是无用的，绝对不是。各国人民为使他们的弱小国家摆脱强大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支配与指手画脚而进行的斗争决不能被低估。相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官方对这场正义的革命和解放斗争正在并将继续给予无保留的支持，认为这是人民在加强政治独立和摆脱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统治上的胜利。但我们反对那些修正主义理论家，他们认为现在整个的革命斗争都应当归结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即争取胜利，捍卫这种独立，使其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同时否定社会解放斗争。只有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才能保证真正和完整的民族自由、独立和主权。这些剥削秩序的拥护者“忘记”了无产阶级及其盟友与当地资产阶级及其国外盟友之间的阶级斗争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激烈地进行着。某一天革命爆发时，将导致列宁所说的那些革命局势出现。必须为世界反帝和民主革命发展到大规模状态以及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以便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继续前进，使之发展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教导我们，革命必须将消灭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进行到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真正的自由、独立和主权。

根据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观念，在一个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统治的的阶级对抗社会中，人民无法享有自由和主权。自由，独立和主权具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真正完全的自由和主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得到保障的，而国家权力在剥削阶级手中的时候，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政治关系就会导致人民自由和主权的丧失或限制。结果，在“不结盟”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中，根本不能谈论真正的国家自由和主权，甚至不能谈论人民的主权。只有通过基于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分析，才能正确地确定哪些人是真正自由的，哪些人是被奴役的；哪个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哪个是被压迫的国家和别国的附庸。马列主义理论清楚地说明了谁是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什么是人民走向自由、独立和主权的道路。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只有按照马列主义的方式，才能理解国家和人民的自由、独立和主权。

注：

【1】译者注：“相互依存的世界”是资产阶级全球化的口号

【2】译者注：1968 年 11 月 13 日，勃列日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为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辩解，提出他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即有限主权论。其主要观点：当反社会主义势力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安全构成威胁时，这就不仅仅是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问题，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相对立，不能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相冲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则是有限的。

中国修正主义者对矛盾的态度是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态度

实施正确的革命战略要基于马列主义的教诲，不仅要求我们全面地、辩证地分析和认识世界革命和解放自由趋势的动力，正确地评价敌人的强弱，而且要求我们正确地、科学地认识我们时代的各种矛盾。

如果我们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导，结合具体事实和形势的实际发展来解释矛盾，那么我们就不会犯错误。

针对这些矛盾，中国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理论化”、“阐释化”、“哲学化”、“释义化”和“混淆化”。他们对矛盾的解释不同于实际，不是为了解放斗争，不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是为了和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和妥协。这些冒充马列主义哲学家的领导人有两张面具：一个是把自己伪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追随者，另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歪曲者。他们对矛盾、同盟和妥协问题的立场来自于他们对国际形势和世界上存在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矛盾进行的歪曲和实用主义的分析。这种立场根植于其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世界观之中。

但是，中国领导人将矛盾、同盟和妥协问题摆在讨论桌上并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人现在已经揭去了伪装，公开反对革命。它已经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旗手。像所有修正主义者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试图通过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语来“证明”他们脱离马列主义理论及其修正主义倾向的合理性。当然，当然，他们对这些引语做了删减，断章取义，用它们来兜售反马列主义的反动立场和观点。但是中国修正主义者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对我们的正确理论进行歪曲、带有倾向性地删减和解释的人。在他们之前很久，社民头子、铁托分子、苏联修正主义、意修、法修和其他修正主义者都做过并且现在还在同样的事情，现在还在做。

首先，中国领导人在处理这些矛盾的同时，努力证明自己对美帝的立场是正当的，为他们对美帝的和解与合作铺平道路。

中国修正主义者声称，当今世界只有一个矛盾，这中矛盾使“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的一半与苏联对抗。他们从这个把人民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论点出发，主张把一切阶级矛盾都放在一边，唯一的斗争就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但是，让我们分析一下，在人民与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以及超级大国自身之间的矛盾上，事情是如何发展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确定一以贯之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时（译者注：strategy：战略，表短期；tactic：策略，表长期），对美苏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原则性立场是最重要的。这两个超级大国是保卫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最强大的力量，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他们是革命、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人民不共戴天和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像国际宪兵，承担起了在每一场革命和解放运动的可憎作用，并代表着最具侵略性的好战势力，他们的行动正把世界推向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至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没有人能否认我们时代两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力量——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我们不断强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越来越深。与此同时，超级大国正在努力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列宁用资本的两种倾向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说：

“……因为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趋势使各国帝国主义者必然结成同盟，另一种趋势使一些帝国主义者同另一些帝国主义者对立起来……”。（出自《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译者注）

但是，为什么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呢？因为它们是帝国主义大国，都在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创造新的势力范围，并奴役和剥削人民而战。他们的欲望和贪婪，是他们之间争吵和严重摩擦的根源，甚至将导致一场血腥的世界大战。

我们马列主义者必须为革命利益和人民解放斗争去利用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

利用敌方阵营的矛盾是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组成部分。斯大林把利用工人阶级的敌人、国内的敌人和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矛盾和冲突，描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间接后备力量。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十月革命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思考并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力量对敌人内部矛盾的估计和利用，都是基于马列主义，对这些矛盾及其严重程度，特定时期的力量占比进行具体分析的结果，目的是要规定以什么方式、以什么形式和用什么方法来加以利用。原则是必须始终利用这些矛盾来支持革命，支持人民及其自由，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应使革命力量在反对敌人特别是反对主要敌人的斗争中更加积极地动员起来，而不应使人民对敌人产生任何幻想。

美国和修正主义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将镇压革命和社会主义作为其纲领中的第一点。中国领导人不仅不强调这一事实——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体现——而且他们甚至在实践中否认这一事实。当然，对于马列主义者来说，不能允许忘记超级大国，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斗争，不能允许不看到他们的共同目标，即压迫要求自由的人民，破坏革命，这也导致了全面战争或局部战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仍坚持他们的已知立场，即仅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根据他们的说法，苏联是更危险，更具侵略性和更好战的帝国主义。他们将美帝排在第二位，并强调美国“想要维持现状，并正在衰落”。由此可见，中国修正主义者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而且应该与美帝结盟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被削弱或驯服。相反，它好斗、野蛮、强大，就像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样。美帝不再具有它过去所具有的那种支配地位，这并不能改变什么。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也正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正确论断。但是，以此出发，不能低估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实际上是侵略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样，从帝国主义力量的真正的削弱和衰微出发，说一个帝国主义的危险减少了，而另一个帝国主义的危险增加了，这也是不能容许的。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都没有忘记与他们的掘墓人战斗，而那些成为超级大国的掘墓人的人就是人民。

实际上就像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仅仅主张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停止与美帝的斗争，就意味着不能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毫无疑问，必须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但是不能同样地与美帝作斗争，这就是不可接受的，是对革命的背叛。

如果按照中国的道路走下去，就不清楚什么是美帝，什么是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为什么这两个超级大国会有矛盾，这些矛盾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之间斗争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必须深化哪一方面，我们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世界大战等等。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正确地理解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采取正确行动，那么，显然，我们帮助和支持人民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和统治它们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集团的斗争的需要就会越来越迫切。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但是，必须全面地评估这一危机，同样地，也必须全面地评估资本主义世界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中国修正主义者的实用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逻辑使他们将苏联展示成一个没有矛盾的、正在发展的国家，一个无疑统治着其他修正主义国家——如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把苏联集团当成一个崛起的集团，把苏联当作世界上唯一的帝国主义，一心想在世界各地建立霸权的帝国主义。

如果我们谈到苏联对东欧修正主义国家的霸权，这首先表现在苏联武装部队对这些国家的军事占领上，表现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资产的无情的、肆无忌惮的掠夺上，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试图把这些国家完全纳入苏维埃共和国的体系中。自然，修正主义苏联的这些努力遭到了反对。总有一天，这种在修正主义集团内以潜在形式存在的对立和矛盾将变得更加尖锐，并将爆发出来。

我们形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因为它进攻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它已经干预了非洲和其他地方，已经计划好并正在为其他侵略行为做准备。但是，可以说美帝的侵略行为更少，或者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性更小吗？

中国领导人忘记了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忘记了其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旷日持久的野蛮战争，忘记了它在中东的战争，对中美洲各国的干预，等等。它从一开始就把这些东西都抹去了，现在得出来的结论是，号称美帝已经被驯服了！它忘记了美帝已经将触角伸向了全世界，在所有地方建立了军事基地，并正在发展和强化它们。毛泽东和周恩来忘记了这一点，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在告诉我们说美帝已被削弱和驯服，因此可以结成同盟时，他们恰恰忘了这一点！这样做就意味着熄灭反帝斗争，尤其是对美帝的斗争，甚至是中国喊得震天响的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

的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渴望扩张。它对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1】的干预，它试图在地中海和几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基地，企图占领红海狭窄地带，或是尝试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这些都是公然

的帝国主义行径。但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地位并未加强到程度与美帝在其他国家巩固的新殖民主义经济、战略和军事地位的程度相同。中国领导人似乎恰恰低估了这种情况，但实际上它承认并支持这种情况。

同时，中国修正主义者不能不看到，尽管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帝之间存在矛盾，但它们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盟（如北约、欧共体）相互紧密联系，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资本已经深入到西欧国家的经济中——不仅是西欧，还有东欧和苏联。

中国领导人非常了解美国已经投资并将继续在世界各国投资数十亿美元。那它希望什么呢？是否希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与美国的种种矛盾中与美国决裂，削弱自己的阵营，宣布放弃与美国的那些武装力量联系和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为了中国的利益，在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面前赤膊上阵?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荒谬之处。

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毫无疑问，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应该被革命和解放力量利用。但重要的是应正确理解这种矛盾，应始终从革命利益的角度看待，遵从革命利益。利用帝国主义势力和集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等之间的矛盾，本身绝不是工人阶级和马列主义革命者的目标。

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加深它们之间的裂痕，鼓励这些国家的革命和爱国力量，反对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美苏想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征服它们，剥削它们，否定它们的民族性等等。

但是中国在做什么？

中国的政策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结成“神圣同盟”。事实上，它走得更远。它主张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这些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革命的马列主义路线在哪里?利用矛盾的路线在哪里?中国领导人是否认为，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这样的政策来加强这个反对苏联的集团?这是他们所梦想的乌托邦，但这只是他们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和在他们一起的日本和加拿大，不像中国领导人想的那么疯狂，他们的政策也不像中国的政策那么幼稚。就他们而言，他们很清楚如何利用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的矛盾。他们知道如何去做并采取行动，以削弱强大的侵略性力量——苏联。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斗争，而且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美国和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煽动东方修正主义国家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矛盾。

现在中国也已经开始实行这一美国的旧政策。华国锋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访问【2】就是按照这一路线进行的。但是，中国对欧洲的开放，激化欧洲矛盾，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创造有利的行动空间的尝试，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人民和革命的利益。它们是中国煽动战争政策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欧洲人民互相残杀，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中的炮灰。

《真理报》长期以来一直与美国争论不休，指责它迅速增加了军备，这当然没有效果。它关心的是不是批评美国的这一行动，因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问题在于，美国军事潜力的增加相对削弱了苏联的战斗力，迫使苏联逐步紧跟美国，以平衡其军事潜力和侵略性。但是，在军备竞赛中追赶美帝的步伐削弱了苏联的经济，因为这意味着大量的物质、货币和人力资源从经济转移到了军事。这就是让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感到担忧的原因。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修正主义者通过他们的报纸《人民日报》毫无保留地站在了美国人的一边，在一篇又一篇文章中敦促美国不要在军备竞赛中失去领先地位，敦促美国不要在军备竞赛中失去领先地位，而应不断增强其军事潜力。因此，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武装起来的不是美国，只有苏联。中国修正主义的领导层成为一种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会出现的美国人拥护者。资产阶级至少在批评和对现实的解释中试图保持一种比例，以权衡正在趋于发展的情况。但是，按照中国领导人的做法采取行动，是前所未有的。

在与邓小平部长会面时，美国国务卿万斯向他解释说“美国在军事上强于苏联”【3】。但是邓小平告诉一个同一时期访问中国的美国记者团，“北京不相信”万斯，邓小平还宣称“苏联比美国强得多”。这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掩耳盗铃”。

中国理论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出现，引起了对事实的怀疑，事实上，不只是一个，而是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都在谋求重新瓜分世界、建立新的殖民地、压迫人民、扩大市场。而这种论断在它看来是不能接受的。

提出一个帝国主义更强，另一个更弱，一个是守序的，另一个是侵略性的，这不是马列主义。

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是反动观点的反映，它使中国修正主义者与美国、北约和欧共体结成了联盟，与西班牙国王、伊朗国王、智利的皮诺切特和所有法西斯独裁者结成了联盟。中国的政策对美帝无害，对银行权力和我们时代最大的资本主义无害，这是彻头彻尾的愚蠢至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政策。

中国领导人不能无视美国的金融资本、托拉斯和垄断绝对不会减少他们在国外的投资，他们没有放弃剥削和奴役的野心，相反，他们正在变得更强大，并为了自身利益，试图改变世界上的力量比例。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的经济政策的目标，苏联存在的大型托拉斯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吸干卫星国和其他国家的血。他们披着新的外衣，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同时，他们也在为自身利益努力改变力量比例，起初号称通过协议和谈判进行，但是，当时机到来时，还是通过武力，也就是战争。

中国修正主义者认为美国“想维持现状”、“正在变弱”，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更危险、更具侵略性、更好战”，等等，带着这些原因，希望证明美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中国反对苏联的盟友。他们正在扩大各种关系，他们对美国增加战争预算和进一步武装起来的公开支持都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修正主义者鼓吹今天的形势是这样的：马列主义者、革命者和人民可以与美帝妥协并依靠它。我们党反对和凶恶的美帝作任何妥协，因为这样做不符合革命和人民解放的利益。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同美帝作斗争，直到它完全被消灭为止。同样，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中国对美帝的支持，丝毫不是对革命和人民的支持，而是对反革命的支持。中国领导人以其反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路线，把世界人民置于美帝的魔爪之下。它希望他们保持服从，不反抗，甚至与美帝联合起来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想从美国手中攫取它从人民的辛劳和汗水中建立起来的资产的苏联。中国领导人建议聚在欧洲共同体内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又要使欧洲资本主义联盟的人民联合起来。这种立场意味着：保持沉默，不再谈革命，不再谈无产阶级的专政，而要为那些托拉斯和资本家们服务，并与他们一起，建立起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支持并在经济上加强的欧洲共同体，无非是保持西欧垄断托拉斯的利润最大化，并将发达工业国家聚集在一起的一种手段。正如列宁所说，这些发达工业国家的富裕阶层从非洲、亚洲等国索取了大量财富。中国领导人支持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在支持一小撮寄生的资本家，这是以牺牲这些欧洲国家的人民和落入他们魔掌的人民为代价的。

中国修正主义者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他们试图用来证明其反革命立场的理由，而这不过是工人运动队伍中机会主义的一种变体；这有助于帝国主义以牺牲别国人民为代价来创造市场和攫取利润，从而使机会主义者也能从资本家的桌子上得到一些残羹剩饭。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领导人是在捍卫资本主义势力和欧洲国家，而不是在支持革命势力和无产阶级，从而使革命势力和无产阶级奋起并摧毁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联合的欧洲”的计划。总之，欧洲共同市场和经互会以及所有其它帝国主义制度的支柱，就像一头巨大的怪物，吸干了人民的鲜血。

尽管中国修正主义者的“第二世界”中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西德、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但不论其在理论上如何谈论其“双重”特征，中国领导人并不认为这些国家是革命的敌人，相反，中国人发现对这件事闭上眼睛很方便，与这些国家达成公开的妥协，号称是为了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领导人由于其实用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而被蒙蔽了双眼，他们“忘记”了西德、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曾经是帝国主义国家，现在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奴役和殖民主义倾向，已成为了它们的传统特征，过去没有，像现在这样，也不可能消除。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帝国主义力量被削弱了，甚至被大大削弱了，它们原来的地位已经变成了对美帝有利的（译注：潜台词是地位低，无力与美帝抗衡，甚至变成了美帝的附庸）地位。然而，法国、英国以及其他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放弃保护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市场或获得这些地区的其他市场的努力。

在所有这些没有美帝那样强大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中，虽然有矛盾存在，但同时也有相互达成和解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帮助其昔日的欧洲旧盟国恢复过来，美国的垄断者与这些前盟国的垄断者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共同利益。但是，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因为它们各自试图在垄断市场，

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其工业产品方面放开手脚。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现实也证实了列宁关于资本的两种客观趋势的论点是正确的。

同样，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与美帝而且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都有矛盾。问题出现了：如何利用这些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绝不能以中国修正主义者主张的方式加以利用。我们马列主义者不能为各种反动派辩护，不能为西德的施特劳斯或施密特【4】周围的小集团辩护，不能为英国的保守党或工党领袖辩护，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就去为之辩护，并支持中国的说法，以至于要支持“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团结在共同体下”，应该加强“欧洲联盟”，以便能够面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将意味着我们同意牺牲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为打破奴役锁链而进行的斗争和努力，破坏这些国家革命的未来。

中国修正主义者通过与美帝进行无原则的妥协，背叛了马列主义和革命。**马列主义者解释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矛盾和妥协的理论的真正精神。中国人对这一理论的解释与事实正好相反。**

我们党遵循列宁主义路线，不是反对每种妥协，而是反对背信弃义的妥协。在必要时可以做出让步，并为阶级和革命的利益服务，但要始终牢记，决不能以牺牲战略和对马列主义原则的忠诚为代价，决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决不能摧毁阶级利益与革命。

关于折衷立场，列宁说：

“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否可以同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妥协呢？

*……对于这个笼统的问题作否定的回答显然是荒谬的。当然，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可以同资本家妥协或达成协议的。一切都要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达成的。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才可以而且应当去寻找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看来是正当的协议和从同样观点看来是叛卖的、变节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出自《论妥协·1920 年》——译者注）

列宁继续说：

“结论很清楚：发誓不同强盗达成任何协议或妥协是荒谬的，然而根据笼统地说同强盗达成协议有时是可以允许的和必要的这一抽象的论点来为强盗行径的同谋行为作辩护同样也是荒谬的。”（出自《论妥协·1920 年》——译者注）

列宁还说：

*“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出自《论妥协·1917 年——译者注》）

只从列宁的这些教导出发，才可以妥协。但是，当众所周知美帝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人民和革命的最凶猛的敌人时，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妥协又如何才能符合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呢？这种妥协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危及革命的利益。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折衷或违反原则，就会背叛马列主义。

如果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理论上”已经并且仍然有很多关于矛盾的说法，那么他们不仅要讲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要讲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还应该首先去讲我们时代的根本矛盾，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讲被压迫人民和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和整个世界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客观存在的、无法消除的矛盾保持沉默。他们只说一个矛盾，据他们说，这个矛盾就是整个世界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此来证明他们对美帝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无原则的妥协是正确的。

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和事实表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决不会压倒和代替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被压迫者和帝国主义压迫者之间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被压迫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最深刻的、是长久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或资本主义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只有在为革命和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创造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最有利的条件时才有意义。因此，必须利用这些矛盾，而决不能在无产阶级和人民之间散布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幻想。必须使列宁的教诲清楚地传达给工人和人民，使他们意识到只有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不可调和的立场，只有他们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坚决斗争，只有革命，才能确保他们真正的社会地位和民族自由。

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不能构成革命的基本任务，不能与推翻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法西斯专政、帝

国主义压迫者的斗争相对立。

马列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向人民和无产阶级演讲，呼吁群众站起来，粉碎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霸权的,压迫的,挑衅的和好战的计划,在西方和东方一并推翻反动资产阶级及其独裁统治。

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它总是利用敌人阵营中的矛盾。我们党在利用它们的时候，必须正确地估计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性质，正确地估计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它们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是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有着共同根本利益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无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多么严重,世界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各部分的对社会主义国家侵略行动的危险都是存在的，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长久的、真正的危险。帝国主义之间的裂痕,大多数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吵和冲突,最多可以削弱或暂时延缓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行动的危险，因此，在敌营中利用这些矛盾，虽然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但也不能消除这种危险。

列宁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说：

“......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出自《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译者注）

列宁的这些教诲至今仍保留其全部效力。它们受到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充分证明，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略，美国对朝鲜的侵略以及后来对越南的侵略，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反对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敌对活动和阴谋，等等。因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列强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任何低估，对于帝、资、修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采取侵略行动的危险的任何低估，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十分严重，产生因为这种矛盾，他们无法对我们的祖国采取侵略行动的想法，而产生的任何警惕性的放松，都将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只有革命的、解放的、热爱自由和进步的力量才能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可靠的盟友。我们国家保持着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世界不同国家的外交关系，利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同时坚定地支持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人民的革命和解放斗争——每个进行这种斗争的国家都将这种支持视为其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它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它将支持无产阶级和人民、马列主义政党，与超级大国、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作斗争的革命者和进步分子，以促进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

过去，中国共产党在矛盾方面也引用了众所周知的马列主义原理和理论。例如，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 1963 年发布的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的已知文件中，中国人写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承受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他们补充说：*“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层要求人民和共产党同意美帝和它的领导者已经变得和平的观点，要求他们服从苏联与美帝和解的政策。现在，正在向人民、革命者、马列主义政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鼓吹他们必须与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并团结资产阶级和所有反动派来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人并不用伪装的词语来表达这些思想，而是公开地表达。这种摇摆不定和 180 度的转向与有原则的的马列主义政策无关。这是所有把原则放在他们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式的利益之后的修正主义者，实行的实用主义政策的特点。

为了证明他们对美帝和国际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妥协，中国领导人和所有“三个世界”理论的拥护者，故意歪曲了关于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苏美同盟的历史事实。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当时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迫在眉睫。在那段时期，纳粹德国入侵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法西斯意大利入侵了阿尔巴尼亚，当时达成了慕尼黑协议，德国的战车正在向东方狂奔。在西方列强拒绝回应斯大林与苏维埃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以遏制纳粹-法西斯侵略者的呼吁，并且明显在怂恿希特勒向苏联进攻之后，苏联并没有与德

国结盟，而是达成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苏德条约挫败了列强的计划，并给苏联留出了时间准备面对纳粹的侵略。

至于英苏美同盟，众所周知，希特勒的德国占领法国并与英国开战后，对苏联发动了野蛮侵略，在对轴心国的战争具有了明显的反法西斯和解放性质时缔结的。必须指出，当时的斯大林和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主张或号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放弃革命，联合反动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当白劳德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和解——因为据他说英苏美同盟的利益需要这样做，他被斯大林和共运打为修正主义者和革命的叛徒。

可见，中国与美帝和各种反动势力的无原则的妥协和结盟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修正主义者试图做出的历史类比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领导人在宣传中给人的印象是，据说，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反对任何妥协，也没有尽力利用我们应该利用的矛盾。他们当然知道，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是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的，但是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离开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道路，继续宣传这条歪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诋毁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正确政策和立场。他们的指控毫无根据。让我们看看事实。

我们党始终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并将继续这样做，直到最后。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与以色列的斗争，以色列早已成为美国在中东的盲目的工具和宪兵，它的任务是为美国的大型垄断公司保卫丰富的阿拉伯油田，并像中国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维持现状。

尽管萨达特总统及其政府以前曾与苏联结盟，但我们支持埃及人民为夺回以色列占领的领土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我们揭露了苏联攻击埃及的目标，以及苏联在整个中东的下的棋。我们没有一刻不对苏联对埃及的殖民主义目标保持沉默。在支持埃及人民与美帝和以色列的斗争中，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我们党和人民在捍卫埃及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的同时，还揭露了美帝和以色列目前正在耍的伎俩。我们不会赞成打着维护埃及人民利益的旗号去与以色列侵略者做妥协的任何途径，任何路线。

但是，中国领导人没有揭露美帝。它赞扬以埃协定【5】，并敦促阿拉伯人民和解，与美帝和以色列这两个主要敌人妥协。这样的立场不是马列主义。按中国人说的去做的这种妥协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打破一个帝国主义，投身另一个帝国主义的怀抱，“是在为人民的自由谋利益”的荒谬行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些典型的资产阶级伎俩和阴谋不能被称为有助于加深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间矛盾的马列主义的行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并坚定地支持符合而且必须符合人民和革命利益的、仅仅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当他们看到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是进步人士并且为从帝国主义霸权中解放其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时，他们甚至不会反对这个资产阶级国家。但是，我们国家不能像中国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与反动集团统治下的国家有着共同的事业或妥协，而这种反叛集团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和对人民利益的损害而与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结盟。

同样，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也不反对与“第三世界”或“第二世界”国家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它仅反对与两个超级大国和法西斯国家建立这种关系。但是在发展我们的外交关系时，就像在我们的贸易，文化和其他关系一样，我们按照原则工作，优先考虑我们国家和革命的利益，如果与此相悖，我们就不会，也永远不会建立关系。

我们掌握政权的马列主义者必须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些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些利益是对等的。

马列主义者应该永远记住原则。他们不能由于一个或另一个时期出现的情况，就践踏原则。我们必须牢记，在上层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他们长期与人民，无产阶级和贫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因此，无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是否保持国际关系，它必须清楚地展示出自己支持人民的斗争，清楚地展示出它不赞成骑在人民头上的人实行的反动的、反人民的政策。

我们马列主义者不仅必须承认并牢记被压迫阶级与其压迫者之间存在的矛盾，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国家之间，即这些国家的政府与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出现的矛盾。我们必须始终奉行这样的政策：我们不因为反动政府只是因为为了自身和当权阶级的利益，暂时与美帝决裂，投身于另一个帝国主义，例如英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或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就去捍卫它。我们必须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带着我们的立场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和该国被压迫人民与其反动政府的斗争的目标。根据中国修正主义者的划分，如果“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动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政府与“第一

世界”国家的政府之间发生了矛盾，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矛盾总是有利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从资本的枷锁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要要研究阶级利益，研究代表剥削阶级的政府的利益，研究谁付出得多，谁付出得少的问题，研究谁最能维护自己的权利，研究谁想把他们赶出去，以便把自己的人引进来。

在处理无产阶级斗争时，对资产阶级的立场不能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具有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外交，贸易，文化和科学关系相混淆。这些国家间关系是必要的，必须加以发展，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清楚其建立它们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道德和物质生活必须成为与其保持关系的国家人民的镜子，而且在这些关系的发展中，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和优势。当然，他们是否遵循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们的事情，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树立好榜样。

在所有这些政治，理论和组织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不仅不清楚，而且还远没有弄清楚它们，而是故意使它们变得更加晦涩难懂，因为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必须煽动一切以澄清它们”，这个论点是不正确的。相反，我们必须弄清事情并说服人们进行革命，因为就动乱而言，这已经存在。如果问题是煽动起来，那么让我们为帝国主义而进一步挑衅，帝国主义就是放弃了这个幽灵，而不是帮助它并为它提供拐杖以使它继续前进。我们应该缩短资本主义的存在，以便使人民，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更加接近。这是我们的革命道路，是马列主义的道路。没有别的路了。0

中国领导人以前曾用“针锋相对”地反对美帝的表达，但当时他们并没有实践，今天肯定也没有实践。他们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他们越来越接近美帝并正与美国结盟。

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中国在这些关系中的目标是通过它希望的从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那里获得的援助，来加强其经济和军事地位，使它也可以与其他两个超级大国竞争。中国通过广播等手段进行宣传，想要在世界上产生中国不仅是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强大国家，而且当前的中国政策是进步的、更是马列主义的印象。但是，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行为不会也绝不能作为世界各国人民为摧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而进行的斗争所应遵循的榜样。

注：

【1】译者注：1975 年 3 月，埃塞俄比亚发生革命，皇帝被推翻。随后，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通称“德尔格”）成立。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逐渐掌握德尔格政权的实权，为巩固权力，他在 1975 年至 1977 年大肆清洗政治异己，其中主要的对手是两个共产主义政党——亲华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亲苏的的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它们曾为推翻君主制做出很大贡献。尽管德尔格政权也标榜尊崇马克思主义，却使用残忍的手段镇压反对派，对成千上万人进行死刑、暗杀、拷问和监禁。同时，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因欧加登地区爆发战争，苏联和古巴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大量支援。

【2】译者注：中国国家首脑华国锋，于 1978 年 8 月 16 日至 9 月 1 日，先后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意味着他将效仿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对外开放、对内改革”。

【3】译者注：卡特政府国务卿万斯 1977 年 8 月 22 日抵达北京，8 月 24 日与邓小平会谈

【4】译者注：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1915－1988，西德右翼政客，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
施密特，1918——2015，社民党政客，时任西德总理

【5】译者注：埃及以色列协定，又称“戴维营协议”，在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下由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在该协议于 1978 年 9 月 17 日在美国华盛顿签订。

中国人对“第三世界”联合的看法是反动的

中国领导人寻求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团结，从任何角度看，这些国家都是相异的：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各国花了多少时间的时间和走的什么样的路才达到今天享有的自由和独立的程度，等等。

但是中国如何想象这种鼓吹的团结呢？中国领导人并不认为这种统一是为了革命和人民的解放，以马列主义的方式实现的。它从资产阶级的角度看待它，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缔结、废除的条约和协议而实现的联合——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今天与一个帝国主义大国有着联系，但是明天他们就可能会谴责他们已签署的协议，以便与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联系。

中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忘记了，只有首先通过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工人群众的对渗入他们国家的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资本主义、反动派的斗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保证这些国家的团结，才能联合起来对抗外国帝国主义，以及本国的君主、反动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和独裁者。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联合被认为只有上层的联合，以维护资产阶级的胜利，保护他们不受革命的侵害。真正的联合，就是人民的联合，必须主要从下层实现，而无产阶级是这个联合的重中之重。

当然，一个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无产阶级或所有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使用与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的策略，是不能一蹴而就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哪怕在特定时期，即当与外国帝国主义或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动领导层发生深刻矛盾时，与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层联合，也不能忽视。

所有这些机会和可能性都必须被革命力量看到和利用。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应该是有区别和有条件的。

然而，中国领导人恰恰主张反动政府之间建立无条件的联盟，号称是要面对帝国主义。当他们谈到反对帝国主义时，他们并不是说所有的帝国主义，而只是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断削弱是当今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势。各国为摆脱帝国主义影响所作的努力也构成了导致帝国主义削弱的另一种趋势。但是，这种第二种趋势，因为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无条件地将其绝对化，没有在国家之间作任何区别，没有研究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没有通往努力摆脱帝国主义干预和统治的人民联合起来的正确路线。同样，中国修正主义者认为欧洲是“第二世界”国家的大洲，他们将欧洲作为“第三世界”的盟友，也无法通往正确的路线。这群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要说削弱的事情可以在英国贵族资产阶级，想复仇的西德资产阶级，狡猾的法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大资本主义集团的帮助和协作下实现，那真是可悲的天真。

“三个世界”理论的支持者可能会声称，通过倡导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来做削弱帝国主义的打算。但是，这种联合会削弱哪种帝国主义？是这样的帝国主义，“三个世界”理论要求和它们建立一个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帝国主义吗？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盟（尽管它们之间有矛盾）的帝国主义吗？显然，主张加强这一集团，就是站在加强美帝的立场，加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

另一方面，当中国领导人谈论“第二世界”国家与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同盟的建立时，意味着这些国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同盟。但是宣称这些同盟将有助于人民的解放，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以这种修正主义理论欺骗正在寻求解放的广大人民，就是对人民和革命犯下的罪行。

中国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不了解，看不到，不理解和不去利用刚刚摆脱殖民主义枷锁，又陷入新殖民主义枷锁的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事实表明，帝国主义每天都在不断利用这些矛盾来发展自己的利益。帝国主义敦促并煽动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相互争斗，分裂，争吵，甚至在某些特殊问题上也不能实现团结。

帝国主义也在进行着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努力延长其生存时间。当它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平常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时，便将自己陷入公开的战争和侵略中，以恢复其优越性和霸权地位。

中国领导人不仅要联合“第三世界”国家，而且要与美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换句话说，中国修正主义者公开地告诉“第三世界”人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他们的主要敌人，因此，在目前，他们不能反对美帝或其盟友——统治本国的反动资产阶级。根据中国的“理论”，“第三世界”国家不是为增强自己的自由，独立和主权而战，不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而战，而只是为了维持现状。通过鼓吹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不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和民族解放的理由，而是将这些

国家推向不可信任的妥协中——这是可以理解的。

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负有鼓励和鼓舞所有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以任何形式，进行革命，并抵抗来自外国和本国的压迫和奴役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党认为，这是为人民斗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创造条件的唯一途径，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各种形式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

但是中国做了什么？中国在扎伊尔保卫蒙博托及其周围的集团。中国通过其宣传试图制造一种印象，号称是在捍卫扎伊尔人民免遭苏联的雇佣军入侵，但实际上，它是在捍卫反动的蒙博托政权。蒙博托集团是为美帝服务的机构。中国通过其宣传和“亲扎伊尔”立场，捍卫蒙博托与美帝、新殖民主义的联盟，并努力防止该国现状发生任何变化。真正的革命者的职责不是捍卫帝国主义的工具、反动统治者，而是要努力激发扎伊尔人民抵抗蒙博托和本国资本，抵抗美帝、法帝、比（利时）帝和其他帝国主义，争取他们的自由和主权。

就像我们反对扎伊尔的蒙博托一样。我们也反对安哥拉的内图及其教唆者，因为苏联和内图在安哥拉所做的事情与美国和蒙博托在扎伊尔所做的事情相同。从以上两个国家的局势发展来看，很明显可以看出超级大国之间在殖民地和市场划分上的竞争是如何展开的。我们既不捍卫内图，也不捍卫苏联，但是在与它们作战时，我们不能支持美帝及其雇佣军，它们是安哥拉人民的敌人。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支持革命人民，就扎伊尔和安哥拉而言，我们必须只支持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去努力摆脱超级大国缠在脖子上的枷锁。

应该向扎伊尔的革命者们推荐什么？像中国修正主义者建议的那样，与蒙博托妥协，使这个国家的人民更加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不，马列主义者不能向扎伊尔人民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推荐这种妥协方案。

让我们以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政策为例。据说，富有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一直统治着的，汗【1】的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的盟友。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援助并不是革命方向的援助，它帮助加强了巴基斯坦的反动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后者严重压迫了该国人民，就像尼赫鲁、甘地【2】和其他反动大亨的集团压迫印度人民一样。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3】的政府也不例外。首先，东巴基斯坦脱离了西巴基斯坦【4】。印度知道如何利用东巴基斯坦人民与西巴基斯坦反动资产阶级统治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它煽动了这些矛盾，导致了东巴基斯坦人民对阿里·布托的巴基斯坦发动起义。当时在名为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的穆吉布·拉赫曼【5】政府，宣称自己为民主和人民利益而战。但是有一天早上，穆吉布尔·拉赫曼被与美帝密切相关的分子谋杀了。现在，阿里·布托也被推翻了。因此，中国的朋友和盟友，巴基斯坦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富翁，在政变中被其他反动派推翻了。

但是，政变夺权的参与者又是什么成分？这其实也是一支由军人，资本家和大地主组成的反动力量。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及他们与美国、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联系，他们正努力将反动力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要与巴基斯坦人民谈论与一种或另一种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紧密结盟并予以支持，就像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用另一种统治集团代替这个统治集团，并没有向他们展示正确的革命路线。正确的做法是呼吁陷入布托和他的对手点起的两场大火之间的人民，点燃革命的强大火焰，扑灭前两次大火，推翻巴基斯坦同一类的两个集团。在与这两侧的战斗中，巴基斯坦人民自己将一定会知道如何利用这些矛盾。

这同样适用于所谓的第三世界或不结盟世界的许多国家。

因此，中国领导人不仅在与马列主义者的同盟和友谊方面，而且在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的同盟中都没有运气。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运气呢？因为它的政策不是马列主义的，因为它所做的分析和从中得出的推论都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人民对这样一个希望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羽翼下的中国，怎么能信任的起来？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在人民间产生真挚的爱、亲密的友谊和钢铁般的团结，消除一切分裂和分化他们的东西。为了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团结与友谊，以最适合人民自己的利益的方式解决问题，就绝不应该向蒙博托、布托、甘地等堕落的资产阶级提供援助和让步，号称是为了建立政治平衡——这是反科学，反人民和机会主义的“平衡”理论的表述，这种理论服务于维持现状和维持奴隶制。

我们马列主义者反对新殖民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压迫性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就是反对压迫人民的人。如果真正的共产党激励、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和工人群众，这场斗争就可以进行。只有当党有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而不是具有一百种含义、一百面旗帜的，模棱两可的灵感时，党对无产阶级

和群众的领导才能成功地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在采取行动时，不仅要从其本国的利益出发，更要始终考虑到世界革命的利益。

注：

【1】译者注：似乎指叶海亚·汗（Yahya Khan），1921 — 1980，巴基斯坦第三任总统，1939 年起在军队任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到过阿拉伯各地，曾遭德军俘虏。印巴分治后，创建巴基斯坦参谋学院。1966 年 9 月～1971 年任陆军总司令。总统任内，对东巴人民同盟领导的分离活动进行军事镇压，终致东巴从巴基斯坦分离，建立孟加拉国。1972 年被软禁，两年后获释。

【2】译者注：
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1920 年参加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8 年与鲍斯共同建立全印独立同盟；1929 年当选为国大党主席；1946 年 9 月任印度临时政府副总理；1947 年 8 月 15 日任印度总理，发展了印度资本主义并致力于确立印度的大国地位，并和铁托、纳赛尔发起了不结盟运动；
英吉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1984，1959 年至 1960 年间，英迪拉参加国大党主席的竞选并成功当选，并同时兼任其父亲的幕僚长，后于 1966 年和 1980 年两度任总理。任内多次发动对南亚邻国干涉的战争，对内采取严峻的统治手段。1984 年 10 月 31 日遇刺身亡。

【3】译者注：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1928——1979，巴基斯坦人民党创始人。曾先后担任过巴基斯坦总统（1971 年 12 月—1973 年 8 月）、巴基斯坦总理（1973 年 8 月—1977 年 7 月）任内进行了民主化和社会化改革，1977 年被政变推翻，1979 年被处以绞刑。

【4】译者注：是指发生于 1971 年 3 月 26 日至 12 月 16 日，东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孟加拉国）和印度对抗西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巴基斯坦）的战争，包括 1971 年印巴战争，持续时间 9 个月，最后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独立。

【5】译者注：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1920——1975，孟加拉国父，孟加拉国人民联盟领袖，1971－1975 年间曾任孟加拉总统和孟加拉总理，1975 年遭政变杀害。

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和南斯拉夫的“不结盟世界”理论破坏了人民的革命斗争

所有马列主义者的叛徒——苏联修正主义者、铁托分子，中国修正主义者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者，

都在竭尽全力，与无产阶级的胜利理论马列主义作斗争。我们党对“三个世界”理论的揭露使中国修正主义者处于困境，因为他们无法回应我们的反对和理论上的揭露，这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论据的缺乏。

阐述或采用“第三世界”概念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不想用理论上的论点来支持这一理论，因为他们无法这样做，这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这种“疏忽”是一个把戏，其目的是欺骗人们，使他们不经讨论，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产生了它，就接受这一荒谬理论。毛泽东无法解释这种“哲学”或“政治”概念的理论基础，因为根本不可能对其进行解释。他和他的门徒只是简单地宣告了将世界一分为三的概念，但没有去捍卫它，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论点是无法捍卫的。

中国的“第三世界”与南斯拉夫“不结盟世界”差不多是一种东西。这两种“世界”的共同目的是为熄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以及保存和永久化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系统。

作为的虚假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没有任何理论基础的理论，“三个世界”理论以及中国修正主义者围绕它建立的神话，对“三个世界”国家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受苦难人民，以及这些国家的领导者都没有任何影响。这些领导人——中国领导人试图将他们纳入其保护伞——有他们自己根治内心的看法，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明确的方向，因此中国的故事并没有为他们所相信。邓小平及其团伙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这些国家。只要不损害美国的计划，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就一定程度上满足美帝的需要。这种理论助长了世界上的混乱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都利用自身优势扩大自己的霸权地位，相互联系，并与这些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国家元首缔结了更多的同盟和协议，不断使这些同盟和协议更加紧密。这种局面也为中国修正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目标作了服务。

关于“不结盟世界”的理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将其提出来，作为一个普遍的理论，应该取代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列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不再“有意义”，因为他们宣称各国人民和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他们没有像卡里略那样公开谴责马列主义，而是通过捍卫他们的“不结盟世界”理论来打击马列主义，根据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说法，捍卫马列主义的人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他们不同意必须纠正这一革命学说的原则和标准，因此他们是“惯犯”。根据他们的说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他们的攻击目标）就是“惯犯”，因为它想要将马恩列斯的科学的原则、方法和学说应用在“一个和他们的时代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铁托分子的观点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对当今世界发展进程所做的分析就是从这些立场出发的。总体而言，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和中国修正主义，正在反对革命。南斯拉夫和中国修正主义者认为，美帝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它可以采取更合乎逻辑的路线，可以“帮助”当今世界——据他们说，当今世界正在发展，并且不愿结盟。但是南斯拉夫的理论无法对“不结盟”一词本身作出适当的定义。从哪个角度来看，南斯拉夫所主张的“不结盟”国家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经济上或军事上是不结盟的？南斯拉夫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接触或提及这个问题，因为所有这些南斯拉夫以新世界为幌子谋求领导它们的国家，都不能摆脱对美帝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多种形式的依赖。

南斯拉夫的“理论” 过分夸大了现在总体上已经废除了旧式的殖民主义这一事实，但它并不说许多人民已经陷入了新殖民主义的魔掌中。我们马列主义者并不否认旧式的殖民主义被废除这一事实，但我们强调，它已被新殖民主义所取代。昨天，同样的殖民主义者仍在利用人民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压迫今天的人民，并通过介绍其腐败的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使他们瓦解。但我们强调，它已被新殖民主义所取代。昨天，同样的殖民主义者仍在利用人民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压迫今天的人民，并通过介绍其腐败的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使他们瓦解。但我们强调，它已被新殖民主义所取代，昨天的殖民主义者今天同样仍在利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压迫人民，并通过推广其腐败的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使他们瓦解。铁托分子称这种情况是世界的巨大变化，并补充说，马克思和列宁，更不用说他们一向反对的斯大林，都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他们认为，人民现在是自由的，独立的，仅仅渴望不结盟，而世界的财富应以更加理性和公正的方式分配。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南斯拉夫的“理论家”要求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他们的仁慈，通过国际会议，进行辩论。两国将互相让步，实现当今世界的转变，他们说，这“已经达到了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水平”。

这是铁托修正主义的声称的“社会主义”，他们鼓励的一种布道，来尽可能分散人们对现实的关

注。他们反对革命，维护社会和平，这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能在“改善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达成协议。就是说，他们谦虚地恳求上层阶级变得“慷慨”，并从他们的利益中捐出一些东西给“大地上的苦难生灵”。

铁托希望将“不结盟世界”的理论转变为“全世界学说”，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样，宣称其适合于“当今世界的情况”。世界各国人民已经醒悟并希望自由生活，但是根据铁托的理论，由于存在两个集团：北约集团和华约集团，这种“自由”现在还不是“完整的”。

铁托成为反国家集团政策的领导者和标准旗手。的确，他的国家不是北约或华约的成员，但它与这些军事组织有许多联系。南斯拉夫的经济和政策不是独立的，它们受他们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从美帝那里获得的信贷，援助和贷款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主要依靠这种帝国主义。但是，铁托还依靠苏联帝国主义和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因此，声称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实际上是（即使不是法律上的）同超级大国的侵略组织结盟着的。

在世界各国中，有许多像铁托这样的领导人，铁托想让他们在所谓的不结盟世界中聚集在一起。这些人物通常是资产阶级，资本家，非马克思主义者，其中许多人正在与革命作斗争。给这些人物中的某些人贴上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独立共和主义者等标签，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以使他们陷入束缚，并且以他们为代价玩弄政治手段。

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不结盟”国家盛行。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国家就像铁托的南斯拉夫一样，与超级大国和世界上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联系和纠缠。在铁托领导的、为他向世界所有国家提倡的“不结盟世界”中，唯一基础是镇压革命的目的与活动，阻止无产阶级和人民起义推翻旧资本主义社会并建立新的社会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活动。

这是指导铁托将这些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想法和主要原则。他假装自己已经成功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并担任它们的领导，但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事，因为没人会给铁托的“不结盟世界”理论或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予以重要性，它们的标准创立者渴望和追求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为自己带来最大、最直接的收获的道路。

种种迹象表明，美帝和世界资本主义比起中国人的“三个世界”，更喜欢铁托的“不结盟世界”。尽管它们支持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帝还是有些警惕和犹豫的，因为加强中国可能会导致不想要的情况，最终对美国人自身构成危险。铁托的“不结盟世界”则对美国完全没有危险。因此，在铁托最近一次访问美国期间，卡特赞扬了他在创造“不结盟世界”中的作用，并将“不结盟国家”的运动描述为“一个解决今天世界上主要问题的重要因素”。

大多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不结盟国家”已经投下了骰子。他们知道如何在政治上回旋，并且与那些给予他们最大帮助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强国站在一起。按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观点，从事政治活动意味着欺骗，耍花招和尽可能多地超过别人。这种政策是卖淫政策，根据过去的情况，在特定时候，目的是从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中至少获得一点点现金，以符合一个阶级的头目的利益。

铁托主义以其“不结盟世界”的理论细致地鼓吹了这一政策。但是，正如铁托理解的那样，它并非到处都保持着相同的方向。“不结盟” 各国没有就应他们应做什么以及怎样做征求铁托的意见。除少数例外，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正试图巩固其资本主义权力，剥削人民，与帝国主义大国保持友好关系，防止或压制人民任何起义、暴动和革命的爆发。这是铁托分子“不结盟世界”的整体政策。

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也是出于现状。铁托分子“不结盟世界”的目的是从美帝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里获得信贷，以加强资产阶级并保持其政权。同样，凭借其“第三世界”的理论，中国也想加强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增强，以成为超级大国，统治世界。这两个“世界”的目标，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们是亲资本主义，亲美帝的。

正如铁托访华和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1】所表明的那样，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对中国修正主义者极尽称赞和狡猾的奉承，充分契合中国修正主义者的性格，以期诱使他们站在南斯拉夫的立场，从而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不仅可以被北京理解，而且可以得到完全接受。

以华国锋和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尽管没有放弃“第三世界”的理论，却公开支持铁托“不结盟世界”的理论。他们表达了他们希望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相同的路线上，在两条平行前进的道路上密切合作，以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目的欺骗“第三世界”的人民。南斯拉夫领导人现在正在详细阐述这些观点以捍卫中国。然而，在捍卫中国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些对中国有冒犯性的“论点”，正因这个国家的夸大狂。铁托分子跳出来表示支持中国，并反对我们党对中国领导人的揭

露来捍卫它，宣称中国的现行政策是现实的。

南斯拉夫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从本质上来说，它必将成为发达国家，但现在仍然是发展中的、落后的。铁托分子声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马列主义政党是错误的，他们是在以中国发展和不结盟的正当愿望，以中国给予民族解放战争的援助【2】等方面来攻击中国等。南斯拉夫有野心使中国成为其卫星国之一。对于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毫不犹豫地采纳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凭借“不结盟世界”的理论，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一直忠实地为美帝服务。铁托和他的集团也正在提供着这种服务，试图推动中国与美国达成和解并结盟。这是铁托去北京和在那里进行会谈的主要目的，并促成了两国亲密的友谊。随着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的访问，这种友谊不仅扩大了两国之间的广泛合作，还扩大了两党之间的合作。在铁托访问北京期间，中国领导人半承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正在建设。华国锋去贝尔格莱德时，他们完整而正式地宣布了这一点。

换句话说，毛派做了米高扬和赫鲁晓夫当时所做的事情【3】——这两个人充分承认铁托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宣称“社会主义正在南斯拉夫建立”，而“南斯拉夫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

美国根据自己的意愿拉起铁托的线或拉起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线。这一对提线木偶，不是在儿童剧院的舞台上公开露面，而是仍在伪装着，并且当他们的理论受到攻击，他们发现没有事实根据来支撑他们的论点时，他们就宣称“不争论”！当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和马列主义的劳动党在世界舆论面前狠狠地揭露他们时，为什么他们不与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进行辩论？他们在等什么？他们之所以没有进行辩论，是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反马列主义和革命的阴险游戏会被曝光。当中国领导人通过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说中国不会回应阿尔巴尼亚的辩论时，他们的目的就是掩盖事实。

美国，苏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举行各种双边或多边会谈、各种会议、各种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发表讲话和组织新闻发布会，说许多谎言，散布虚假希望，制造威胁，并诉诸勒索。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摆脱他们陷入的危机，制止遭受苦难的被压迫人民的报复情绪，比下去广大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欺骗进步的民主人士。南斯拉夫和中国修正主义者也在这场如此狡猾而肮脏的游戏中发挥作用。

“发展中世界”的理论也是该游戏的卡牌之一，它具有使人民迷惑的反马克思主义目标。这个理论没有提到政治问题，因为这样做是徒劳的。该理论通常只存在有“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但是“发展中世界”理论是在追随什么样的发展，这没有人定义。自然，世界各国都希望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所有其他领域中发展。无产阶级站在前列的世界各国人民希望推翻老化的、腐烂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世界，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代替它。但是，“不结盟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理论”决口不提这个世界。

当我们的马列主义者谈到各个国家时，我们也对它们发表意见，评估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评估各国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们说，各国的人民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建立新的社会。我们说，为了实现自由，独立和主权，各国都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必须与它的压迫者进行斗争并推翻他，必须与任何奴役它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必须获得和捍卫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并建立完全自由、完全独立的，必定与所有劳动群众结盟的工人阶级统治的家园。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我们是列宁主义关于两个世界的论断的坚定捍卫者，我们是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成员，我们正在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斗争，将其毁灭。

将世界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不结盟世界”，“发展中世界”或未来可能被发明的任何其他“世界”的所有其他“理论”，服务于资本主义，服务于大国的霸权，服务于使人民陷入束缚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竭尽全力与这些反动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斗争。

全世界，特别是所谓的第三世界、不结盟世界或发展中世界的国家，都支持跟从我们党的斗争。在我们的马列主义看来，在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立场里，中国，铁托和苏联的修正主义理论以及美帝的理论等理论旨在欺骗的这些国家的人民，看到了与他们一劳永逸摆脱压迫和剥削的正确路线相适应的立场。

正因为如此，马列主义的和我们党的敌人试图指控我们是宗派主义者、极左分子、布朗基主义者，指控我们没有正确地分析国际局势，而是坚持某种过时的纲领。显然，他们指的是我们的革命学说，它们被称为“马列主义纲领”、“斯大林主义纲领”等。

他们指责我们指控我们呼吁那些刚摆脱旧殖民主义剥削形式又进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国

家立即转向社会主义，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通过把我们安上冒险家的身份，会对我们造成打击。但是，我们党忠于马列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正确地定义了无论是民族民主反帝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成功进行需要走的革命道路、这场革命必须经历的阶段以及这场革命必须满足的条件。我们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忠于这一理论，我们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这一理论，我们在思想斗争和外交政策中忠于这一理论。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因此没有任何污蔑可以动摇它。

注：

【1】译者注：1977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8 日，南总统铁托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进行正式访问，1978 年 8 月 14 日华国锋回访。

【2】译者注：可能是指中国 1978 年停止了对外援助或在这之前停止对外援助的倾向。

【3】译者注：1955 年 5 月 26 日赫鲁晓夫出访南斯拉夫。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责任归结为贝利亚等人的阴谋活动。6 月 2 日双方发表宣言，即《贝尔格莱德宣言》。

第二章

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计划

首先，在分析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全球战略的同时，在分析现代修正主义的各种变体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所有这些敌人与马列主义和革命的斗争时，我们还将探讨中国修正主义的地位和策略。中国的政治路线据说是马列主义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马列主义者必须揭露这条路线的真正本质。我们决不能让中国修正主义的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决不能让中国在它所走的道路上摆出好像在是为革命而战的姿态，实际上却是在干反对革命的勾当。

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到，中国正以其奉行的政策，努力加强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地位，并在世界上确立霸权地位，成为帝国主义大国，可以这么说，去占有它的“应得之位”。

历史表明，每个资本主义大国的目标都是成为世界大国，赶上并超越其他大国，与它们争夺世界霸权。资产阶级大国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千差万别。它们受到明确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等制约。美国的道路就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列强殖民扩张基础上所形成的道路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以及通过发展新殖民主义，它转变成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但是不久之后又增加了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在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列主义之后，苏联变成了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为此目的，它利用了社会主义下建立的巨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潜力。

我们现在正在目睹另一个大国——今天的中国为成为超级大国而做出的努力，因为它也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也在迅速前进。但是中国缺乏殖民地，缺乏大规模的发达工业，总体上也没有强大的经济，还没有与其他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同等规模的巨大热核潜力。

要成为超级大国，必须拥有发达的经济，拥有配备着原子弹的军队，确立固定的市场、势力范围和在国外的投资等。中国致力于尽快确立这些条件，这一点于 1975 年周恩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中被表达出来，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得到重申，中国还宣布在本世纪末之前，它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目标是赶上美国和苏联。现在整个计划已经扩大了，并且在所谓的“四个现代化”政策中有了详细的规定。

但中国选择了怎样的道路，才能让自己也成为超级大国呢?目前，世界上的殖民地和市场被他国占领着。像中国领导人宣称的那样，要在 20 年内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出与美国和苏联同等的经济和军事潜力，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必须经历两个主要阶段：首先，它必须寻求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贷和投资，购买新技术以开发自己的财富，这些财富其中很大一部分将作为债权人的股息；其次，它将像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样，把以牺牲中国人民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剩余价值投资于各大洲的国家。

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努力，首先是建立在选择盟友和建立联盟的基础上的。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两个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中国领导人得到，他们必须依靠美帝国主义，寄希望于从中获得经济、金融、技术和组织领域以及军事领域的援助。**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军事潜力大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中国修正主义者很清楚这一点——尽管他们说美国正在衰落。在他们所走的道路上，他们不能依靠一个无法从中狠捞一笔的弱伙伴。正是因为美国的强大，他们选择了美国作为盟友。

与美国的联盟以及中国政策对美帝国主义政策的适应也有其他目的。它本身包含着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这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震耳欲聋的宣传和进行的狂热活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奉行这一政策，是让修正主义的苏联知道，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中国正在实行的这一政策，是让修正主义的苏联知道，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中国与美国的联系对它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今天的中国的政策目的还有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谊和同盟，以便从中寻求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国希望并正在努力加强美国与这些它称之为“第二世界”国家的联盟。中国正鼓励它们和被中国视为高级别伙伴的美帝国主义团结一致，或者更准确地说，去服从美帝国主义。

这就是对中国政府一心想与日本、西德、英国、法国等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那些紧密联系的解释，这就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无论是共和国还是王国）频繁向中国派出政府间经济、文化、

科学代表团，而中国代表团也访问这些国家的解释。这就是中国系统地采取行动，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尝试使这些国家注意到它书面的、口头的和实践的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切行动，表明它赞成美国和其他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的解释。

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政策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得到美国应有的支持。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国务院对中国问题有两个游说团：一个亲蒋介石，另一个亲毛泽东。当然，那个时候亲蒋游说团在美国国务院和参议院中获胜，而亲毛游说团在中国大陆很快获胜。马歇尔和魏德迈（原文为 Vandemeyer，似为 Wedemeyer），埃德加·斯诺【2】等人都是游说团体的鼓动者，而（斯诺）他们成为了中国的朋友和顾问，成为新中国各种组织的发起者和鼓动者。今天，这些旧关系的脉络正在恢复、加强、强化和具体化。现在每个人都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前段时间，消息灵通的美国报纸之一《华盛顿邮报》写道："美国现在有一种共识，它甚至得到了右派的支持，甚至得到了那些对北京没有多少同情的人的支持。根据这一共识，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事，都没有理由再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的威胁。除台湾外，两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实际上，双方都同意搁置台湾问题，以期在其他领域获益。"

在中美关系中涌现的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正式的问题。中国现在并不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它并不担心香港，也丝毫不担心澳门仍在葡萄牙人的统治之下。中国政府不接受葡萄牙新政府提出的把这个殖民地归还给中国的建议，并说:送出去的礼物不收回。【3】这些殖民地的存在是时代错误，但这并不影响中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政策。只要香港、澳门还是殖民地，台湾为什么不能也成为殖民地呢?显然，中国非常有意使台湾未来仍保持现状。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根据现状进行的，它有意通过这三扇门发展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进行的变相走私。因此，邓小平和李先念试图证明所谓中美关系取决于美国人对台湾的立场是一派胡言，只不过是掩盖中国为成为超级大国而开始与美国和解的过程而释放的烟幕。

卡特宣布，美国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台湾而言，美国将采取日本的立场，即美国正式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但不断绝经济和文化关系，也不断绝在此覆盖下的军事关系。事实上，中国对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很感兴趣。它希望美国在台湾、日本、韩国和印度洋保持军事力量，因为它认为这对中国有利，毕竟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对抗苏联的制衡力量。

所有这些立场都与中国领导人为使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而选择的试图通过美国和其他大资本主义国家的信贷和投资来发展经济并增加其军事潜力的道路有关。为了给这一进程辩护，它声称自己采用的是正确的政策，即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根据他说的，"中国应该从世界的伟大成就、新的专利和技术中中获益，应该让外国的东西为中国国内的发展服务"【4】等等。《人民日报》的文章和中国领导人的讲话都充斥着这样的口号。根据中国的概念，受益于其他国家的发明和工业成就意味着接受来自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和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信贷和投资，对此中国赞美有加。

中国领导人采纳了修正主义的理论，即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资产的大国可以从美帝国主义或任何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托拉斯或银行那里获得信贷，因为据说他们有能够偿还这些信贷的可能。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站出来捍卫这一观点。他们通过宣传靠着世界金融寡头尤其是美国资本的帮助下"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经验，为中国提供了榜样，并鼓励其毫不犹豫地走上这条道路。

大国可能可以偿还所获得的信贷，但是在这些大国中进行的帝国主义投资，例如修正主义的苏联、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不留下新殖民主义带来的严重的后果。人民的财富和辛劳被剥削，同样是为了外国资本主义康采恩和垄断企业的利益。美帝国主义、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等正在中国和修正主义国家进行投资的国家，都打算在中国扎根，将他们国家的康采恩与与这些国家的主要工业的托拉斯和分支机构联系起来，密切合作。

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资本投资的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而修正主义者正努力地指出，资本向他们国家的渗透是无害的，因为他们号称，资本并不是通过国家间的关系(尽管中国最高领导人最近宣布，他们将接受外国政府的信贷)进入，而是通过没有政治含义和政治利益的私人银行和公司进入的。任何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对哪个帝国主义，背负的沉重债务，总是充满着对踏上这条道路的国家自由、独立和主权不可避免的风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穷国。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无需承担此类债务。它可以在国内、在它的财富中、在自己的积累中、在人民的创造力中找到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例如，阿尔巴尼亚，一个小国，清楚地展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发展所需的无穷方法、资源和能力。如果一个大国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道路，它的手段和资源就会更加丰富。

中国市场向美帝国主义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公司开放，受到美帝国主义和全世界资产阶级极其热烈的欢迎。跨国公司和美国实业家对中国的经济及其丰富的资产了如指掌，因此，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在中国建立经济网络，成立合资公司并获取巨额利润。不仅美国的大公司，而且日本、德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都以这种方式在中国经营。

中国已经与日本签订了一项每年向日本输送多达 1000 万吨的石油的合同。意大利埃尼集团【5】的一大批代表前往中国为那里的石油勘探仪器提供许可证，但他们发现自己被美国石油公司的一大伙人挡在了前面——这些美国石油公司在更早的时候与中国达成了联合开采石油的协议。中国在其他采矿业（例如铁和其他矿产）中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些大量矿产资源在那里是已为人知的或可能才被发现的。德国煤炭业巨头现在在中国已经签订了价值数十亿马克的合同。中国的部长们为了获得贷款，为了签订现代技术设备的合同，为了购买现代武器，为了达成技术科学引进协议，正在往返于日本、美国和欧洲之间。中国所有公司企业的大门已经向东京、华尔街和欧洲共同体的商人敞开，这些人正匆匆赶赴北京，彼此竞争以争取中国政府提供给他们的大型“现代化”项目。以这种方式，中国也正在进入帝国主义贪婪的漩涡，帝国主义对矿产和原材料的巨大渴求以及对中国劳动力的剥削的漩涡。

大家都知道，资本家是不会不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就给予别人援助的。这不仅仅是他赚取利润的百分比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在给予援助的同时，也把它的生活方式，它的资本主义思维方式，引入了这个接受它的“援助”的国家，它建立源头，像白菜里的油一样阴险地蔓延开来，它像蜘蛛一样总是在蛛网中心随时准备吸食所有缠在它的网里的苍蝇的血，就像南斯拉夫和现在的苏联一样。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中国身上。

因此，中国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像现在一样让步，中国市场将成为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工业资本主义列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debouché）。

美国，西德，日本和其他在中国的信贷和投资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独立性和主权。这样的信贷使每个接收者都依赖起来，因为贷方对其施加了自己的政策。因此，陷入帝国主义运作机制的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将受到政治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削弱或丧失。即使是苏联，也已沦为主权遭到削弱的状态，尽管当它开始复辟资本主义时，它在经济和军事上远比今天正走在同样道路上的中国强大。

当然，当这些国家陷入帝国主义运作机制时，小国比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更快地失去自由和独立，而这些大国则可能会相对逐渐地失去自由独立，这不仅因为它们有更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且更是因为它们依靠着这种潜力，努力保护着它们的市场和夺取新市场，建立和扩大它们的势力范围，以便给彼此施加压力，甚至在找不到其他出路时发动战争。但这仍然不能将它们从束缚了它们的手脚的信贷和投资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必须连本带利地偿还信贷，但是，当你无力偿还时，你将承担新的债务。债务堆积如山，资本家要求偿还债务，而当你无力偿还债务时，他就会给你施加压力。例如，美国垄断公司将其政策强加给政府，迫使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保护自己的资本，甚至在必要时宣战以捍卫它们。

从中国领导人企图以美帝国主义为基础、以美国资本主义为基础来发展本国经济的热情来看，他们关于削弱帝国主义的一切震耳欲聋的呼声都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关于削弱美帝国主义的言论就像他们宣称自力更生一样，只是虚张声势。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想的和他们说的正好相反，这一点从他们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官方报纸经常表达他们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从美国、西德、日本和其他国家的银行获得贷款的担忧。他们警告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小心，因为苏联利用它们提供的技术援助和信贷来发展和增强其经济和军事潜力，而这些援助和信贷增加了他们面临的来自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据中国领导人说，这种威胁如今已取代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威胁。因此，他们呼吁尽快切断这些信贷。中国新闻界的言论与臭名昭著的西德纳粹分子和复仇主义者施特劳斯如出一辙。

不难推断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所获得的信贷表示“担忧”的真正含义。当然，他们并不担心这些信贷的资本主义性质，也不担心它们对苏联国家主权构成的危险。但是，他们要告诉美国资本的巨头们和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和政府，他们必须把这些信贷和援助给中国而不是给苏联，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不是危险的来源，而是利润的来源。

这是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计划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试图统治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以成为所谓的“第三世界”的领导者。**

当今中国的统治集团十分强调“第三世界”——其中也包括中国，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目

的的。中国修正主义者的“第三世界”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尽快将中国转变为超级大国的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希望团结“第三世界”或“不结盟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里的所有国家团结在它身边，以建立一支庞大的力量，这不仅会增加中国的整体潜力，而且还将帮助中国与其他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抗衡，在划分市场和势力范围的讨价还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获得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真正地位。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在所谓为了把人民从新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通过反帝国主义斗争让他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口号下，把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目标。中国对这种要反的帝国主义的说法是比较抽象的，但它强调苏联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

中国提出了这个没有任何理论内容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希望以此作为实现其霸权目标的手段。首先，它打算建立中国对所谓第三世界的统治，然后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操纵这个“世界”。目前，中国正试图以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名声来掩盖这一点。它以这样一个假设推测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奴役别人或牵着别人鼻子走和勒索、争斗、压迫和剥削别人的意图。它使用了这一口号，并以“伟大的”毛泽东创建的、号称忠实地坚持着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剥削的一切罪恶的马克思和列宁理论的马列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名声而得到支持。

中国被伪装成并非如此的东西，隐藏在“第三世界”一词的后面，而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标准或阶级定义就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中国认为，它将以此更轻松地实现其在世界上建立霸权的战略目标。苏联对其他国家也实行了同样的欺骗行为。所有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都日夜喋喋不休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政党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苏联修正主义者也试图在这种伪装下建立对世界的霸权。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行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行动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这些政策和行动的一切发展，充分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由要求夺取市场、统治世界并在世界各地建立霸权的金融寡头统治着的描述。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也在努力渗透“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它们中取得“立足点”。但是，这个“立足点”必须通过巨大的牺牲来获得。

渗透“第三世界”，占领市场，需要资本。“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阶级需要投资，信贷和“援助”。然而，中国没有能力大规模给予他们“援助”，因为它没有必要的经济潜力。它现在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正是要建立这种潜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很清楚，它在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暂时还不能从中国得到什么。它可以从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巨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潜力。

但是，就像每个拥有帝国主义目标的国家一样，中国正在为世界市场而战，并将继续为之奋斗。它正在努力，并将更加努力地传播其影响力并扩大其统治地位。这些计划在现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正在开设自己的银行，不仅是在香港(中国在香港开设银行已有很长时间)，而且还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开设，它还将特别努力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设银行并向其出口资本。就目前而言，它在这一领域做得很少。中国“援助”只有一些水泥厂、铁路或医院的建设，因为建设别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只有当美国、日本和其它投资国对中国的投资开始产生其理想效果时，即当中国的经济，贸易和军事技术得到发展时，中国才有能力进行真正的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扩张。但是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时间。

在那之前，它必须像已经开始的那样通过援助政策进行操纵，在苏联人和美国人要求更高的利率时，它的信贷可以是无息的或低利率的。只要中国的资本无法流出，修正主义的中国领导人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少量“援助”的宣传方面，称赞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颂扬它的“国际主义特征”和“无私目标”，并把这个和以“自力更生”为解放和建设国家的座右铭联系到一起。

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发展越多，它就越希望通过资本输出渗透并控制小国和不发达国家，然后它就不再只收取其信贷的1—2%的利息，而是会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

但是所有这些计划和努力都不容易实现。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影响力的发达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允许中国如此轻易地掠夺他们很久以前通过掠夺战争征服的市场。他们不仅在捍卫自己的旧地位，而且还在以各种方式努力争取新地位，并且不允许中国染指这些国家。

帝国主义不论在困难中还是在繁荣中，对它的任何伙伴都是无情的。有时，出于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的需要，它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但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试图加强其施加在各国上的链条，不仅针对弱国，而且还针对发达国家，如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当美国的资本主义盟友发现自己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陷入困境时，美国总是对它们采取这种政策。但是，即使在这些战争后，当它们正在努力恢复时，美帝国主义也尽力阻止它们渗透到美国已经确立了统治地位的世界其他国家。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方面假装援助从战争中被削弱的英国和法国，另一方面却渗透到英镑、法郎和其他地区的市场。美国垄断公司和冶金、化学、运输和其他许多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部

门的卡特尔，以压倒性多数渗透到，英国、法国等国的卡特尔和垄断企业，使这些国家屈从于美帝国主义。像任何其他帝国主义一样，这种野蛮而无法满足的帝国主义也不能对中国采取行动。运输和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许多其他分支机构以压倒性的比例渗透了英国，法国等国的卡特尔垄断，使这些国家屈服于美帝国主义。像任何其他帝国主义一样，这个野蛮而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也不会不对中国采取行动。

考虑到经济和军事上渗透到“第三世界”的困难，中国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以确保对它们的霸权。它认为这将通过以下三个方向来实现：不与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作斗争，而与美帝国主义和这些统治集团结盟；与在其边界上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以削弱和摧毁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地；通过伪革命和伪社会主义的煽动和花招欺骗这些大陆的无产阶级和饱受苦难的人民，同时破坏任何的革命解放运动。

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以及社会帝国主义，都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些目标。“第三世界”的国家也了解它们，因此它们对中国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是在虚张声势，中国的目标不是支持和帮助他们，而是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统治的大多数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与美帝国主义或发达资本主义列强（例如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日本等）紧密联系。因此，中国与“第三世界”的暧昧关系丝毫不使发达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担心。

中国通过其政策和意识形态（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加入“第三世界”的努力也不能成功，因为其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混乱不堪。中国的政治路线是一条混乱的、实用主义的路线，它会根据过去的环境和眼前的利益而动摇和变化。“第三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并不怕这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为了革命和真正的人民民族解放。为了更容易地行使对这些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以各种标签创建了自己的政党。这些党与外国资本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各国的投资密切相关，由此不难打击和揭露中国路线。因此，中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对这些国家的政党选择了微笑以待的路线，并在任何情况下千方百计地对他们“甜如蜜”。

有了主宰“第三世界”的计划，中国正在尽其所能为自己的利益去引导“第三世界”工人群众的运动。但是，今天，以无产阶级为首的被压迫人民不再处于 19 世纪末或 20 世纪初的状态，他们反对任何新旧帝国主义大国（无论是美国、苏联还是中国）的任何霸权和征服政策。今天，全世界的广大人民总体上已经觉醒，并通过他们的斗争以一种又一种方式成功获得了捍卫其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某种意识。所谓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一定会看到，中国的工作不是把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思想传播到他们的国家，而是消灭妨碍中国的影响力渗透的革命。中国与美国和其他新殖民主义国家结盟的过程也在人民眼里暴露了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无法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积极的革命宣传，因为它不希望与从中获得资本投资和先进技术的超级大国发生冲突。中国也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宣传，因为革命将恰恰推翻在所谓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里，中国正在支持和帮助其继续执政的反动统治集团。

中国领导人想尽快将自己的国家转变成超级大国，并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所谓的第三世界中—建立霸权的野心，促使他们以煽动帝国主义战争作为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础。他们非常希望美国和苏联在欧洲发生正面冲突，在这一冲突中，中国将在合适的距离外，向将要摧毁其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原子核大屠杀致以热烈的欢迎，并把一切都留给它——世界上唯一的全能统治者。

中国将为自己谋求和平，为别人谋求战争，直到中国觉得自己强大到足以与其他超级大国竞争，直到中国赢得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应有之位”。与他们目前的和平需要相联系的是，中国修正主义者采取的公开外交手法煽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以使他们自己可以远离战争并继续进行“现代化”。邓小平宣称二十年内将不会发生战争，这并非偶然。他是想告诉超级大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这 20 年中无需害怕中国。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正在挑起欧洲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这些超级大国远离中国，并有卷入战争的危险。这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发生是另一回事，但是中国领导人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他们认为在实现其将中国转变为超级大国的目标所需要的时期内，和平必不可少。

中国大声主张加强“欧洲统一”、“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一”，它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这种统一，假设自己在教导老狼和老狐狸，面对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危险，它们应该加强它们的军事和经济统一，它们的国家组织上的统一等等。但是它们没有必要从中国听取这些教训，因为它们有能力了解并且非常了解危险的根源。

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那么天真到套用中国的建议和愿望的地步。它们正在加强自己以应付苏联最后的威胁，它们也在做出各种代价高昂的努力，不要让自己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不要走得太远导致激

怒了“俄罗斯熊”。这自然与中国的愿望背道而驰。

中国煽动它们与苏联的矛盾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喜欢的，因为这使它们能够间接告诉苏联：“您的主要敌人是中国，而我们与您一起想要建立缓和，和平共处，不管中国怎么说。”另一方面，这些国家虽然假装自己想要和平，但仍在武装自己以加强其霸权和军事团结，以对抗其主要敌人——革命。这是所有会议的目标，例如赫尔辛基和贝尔格莱德【6】的会议，这些会议无休止地进行着，就像拿破仑战败后的维也纳国会一样，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舞会和晚会会议（指 1814·9·18——1815·6·9 的维也纳和会中，梅特涅在会议的间歇期一直在举办各种各样的舞会和活动以讨好各方，霍查以此代指拖沓的会议——译者注）。

正如邓小平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正式宣布的那样，中国领导人正在呼吁建立“包括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和美国在内的广泛战线”，以对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的对煽动美帝国主义、西欧等国发动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战争的战略，充满着中苏战争的危险，而不是苏联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之间的战争危险。

中国通过煽动其他国家发动战争而所做的事正是美帝国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集团掌权的所有其他国家在煽动中国和苏联相互对立时所做的事。因此，最有可能的是，美国的政策和中国自身的错误的战略可能会促使苏联进一步增加其军事力量，并首先对中国发动帝国主义进攻。

就中国本身而言，当其感觉足够强大时，它就倾向于进攻苏联，因为它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其他领土抱有极大的领土野心。它很早以前就提出了这些领土要求【7】，但是当它准备就绪，建立了一支装备有各种武器的军队时，它将进一步推进它的要求。这是华国锋向英国前保守党首相希思发表讲话时的暗示。他说：“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个团结而强大的欧洲；我们相信，欧洲也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总之，华国锋对欧洲大资产阶级说：“增强你们的实力，从西边向苏联发动进攻，而我们中国从东边进攻。”

中国的政策为美国开辟了一条非常有利可图且广阔的道路，这条道路最初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开辟的。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造了许多交流桥梁，它们是隐瞒别人的桥梁，但卓有成效。尼克松鼓吹：“我们必须建立一座足够长的交流桥梁，连接旧金山和北京。”水门事件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尼克松发出了邀请，而毛泽东则接待了尼克松，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意味着与美国的友谊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暂时的友谊，而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国家友谊——尽管开辟了这条道路的总统由于他的腐败行为被迫下台。

卡特上台后，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正在巩固。美国对中国目前的立场非常有兴趣，而卡特则从许多方面助长中国的战略。

美国有意向中国提供全方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援助，以煽动它对付苏联。它给了中国原子核机密，这一点现在很明显了。美国还向其提供了用于核战争的最新计算机。中国已经得到了完整的数据，因此可以建造自己的核潜艇。现在，华盛顿正在公开谈论向中国提供现代化武器。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所有这些“好事”，其目的自然并不是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陆上和海上强国，甚至危及美国，就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是的，美帝国主义仔细计算了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援助，特别是对中国的援助。

这样，中国成为一个既能制衡美国又能制衡苏联的超级大国的目标和狂热努力，必然会导致新的摩擦、冲突和战争，这些冲突可能具有局部战争性质，也可能具有大战的性质。

整个三个世界理论，它的整个战略，它所倡导的联盟和“阵线”，它谋求实现的目标，都在煽动着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

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详细阐述了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理论，该理论主张“社会和平”、“和平竞赛”、走“和平道路”的革命、“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它旨在通过掩盖和消除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来削弱阶级斗争。赫鲁晓夫特别主张消灭苏联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他主张，在世界上发生了变化之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矛盾将通过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和平竞争来解决。

赫鲁晓夫说：“让我们用时间证明谁是对的。”在这场竞争中，“沐浴在神圣的和平”中的人民将自由地选择最合适的政权。尼基塔·赫鲁晓夫建议各国人民将财富出售给超级大国，然后等待这一著名的“和平”竞赛进程带来的自由、独立和幸福。当然，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被揭发，而我们党首先开始抨击它。

从毛泽东在世时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就一直遵循赫鲁晓夫的政策。中国的政策也要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人民和统治者双方停止阶级斗争，团结起来只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而忘记美帝国主义。

三个世界的理论正如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理论一样，也是一种反动理论。但是，虽然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拥护者，但在表面上似乎是和平主义者。而毛泽东、邓小平、华国锋等却公开地把自己当成战争贩子。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联盟，并给这个包括中国自己的联盟赋予这样的色彩和意义——革命斗争的组织和为无产阶级的胜利与人民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然而，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不是要求革命，而是要求帝国主义战争。

帝国主义列强和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对抗的加剧充满了武装冲突和掠夺性奴役战争的危险。这是马列主义众所周知的论断，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当今的国际发展也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曾多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揭露超级大国散布的震耳欲聋的和平主义宣传是哄骗人民和爱好自由的国家陷入沉睡，削弱他们的警惕性，用幻想迷惑他们，使他们措手不及的伎俩。它不止一次地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帝国主义和俄罗斯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带领世界走向新的世界大战，而这场战争爆发的风险是真实的，绝不是想象的。这种风险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人民、广大劳动群众、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国家、马列主义者和进步人民的长期担忧。而面对这一风险，他们也不能被动地站着，什么也不做。

这是不可能通过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投降和屈服，或者缓和对他们的斗争来实现的。事实证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并没有使美帝国主义更加驯服，表现得更好或更和平，相反，它们却使其变得更加自大和残酷。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是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集团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集团，也不是要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因为战争的受害者是人民。伟大的列宁指出，我们的政策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

他说：*“……如果我们确实是在挑动工人和农民打仗，那是犯罪行为。但是，我们的一切政策和宣传决不是为了挑动各国人民去打仗，而是为了结束战争。经验也充分表明，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摆脱接连不断的战争的出路。”*（出自《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译者注）

因此，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和各民族在革命行动揭竿而起，以阻止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在他们的国家里动手。马列主义者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非正义战争的反对人。

列宁告诉共产主义革命者他们的职责是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并防止战争爆发。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必须动员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并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革命性的解放战争。

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本性好战。他们奴役世界的野心使他们发动战争。但尽管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是帝国主义者，但付出血的代价的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革命者和所有进步分子。这就是为什么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世界各国人民和进步分子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并进行不懈的斗争以挫败帝国主义的计划，从而使他们不把世界推向新的屠杀中。

因此，决不能像中国修正主义者那样提倡帝国主义战争，而必须与其作斗争。马列主义者的职责是带领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与压迫者作斗争，继而从压迫者手中夺取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没有这样做，中国共产党没有为此而努力。通过修正主义理论，中共正在削弱和延迟革命，分化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和领导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

中国领导人倡导的路线是一种欺诈，这是与我们的马列主义学说不相符的路线。相反，中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削弱、分化了无产阶级和人民，以血腥的、帝国主义的和罪恶的战争来威胁他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对他们的行径深恶痛绝。

因此，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中共和中国的政治活动也绝不能被称为马列主义和革命的。

当赫鲁晓夫主张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思想和政治的竞赛时，中国领导人宣称反对这一论点，并说，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因为“共存”不能消灭帝国主义，不能导致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胜利。

但是这些声明仅是纸上谈兵。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一直以来也支持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我们引用的文件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其中写道：“原则性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原则性政策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制定任何政策时，我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必须从无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出发，并以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基本论点为指导。”（具体可以参阅原文。这段选文似乎是对原文几部分内容的一个整合——译者注）中国共产党说是这样说，但是它过去

做了什么，而现在正在做什么？它已经做了并且正在做与之相反的事情。

在上述文件以及其他场合中，中国共产党曾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在其他方面，它补充说：*“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贯彻这些主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定地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决拥护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中国领导人对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提出指控，宣称我们没有“对国际形势和矛盾进行马列主义的分析”，因此没有遵循中国呼吁的“欧洲联合”路线，让欧洲共同体和世界无产阶级与美国人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路线。他们的结论是，由于我们不支持美帝国主义和“欧洲联合”等，因此似乎我们赞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他们的修正主义立场不仅用“反修正主义”的幌子掩盖，而且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也充满敌意和诽谤。美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好斗和好战的。正如中国人所说，美国不希望只是维持现状，就像中国人说的那样，它想要扩张。否则，它就没有理由与苏联发生矛盾。他们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就像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原文未查明——译者注）旨在证明只有苏联想要战争，而美国不想。对美国的这种软化是为了阻止对美国的一切攻击，毕竟美国“已沦为一只老鼠”，但还是必须成为中国的盟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反马克思主义战略！

中国的“战略”建立在他们基于“三个世界”理论的分析基础上，“绝对”地定义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集中在欧洲”。奇怪！但是，为什么恰恰在欧洲而不是在诸如苏联想要扩张的亚洲、非洲、澳洲或拉美等世界其他地区呢？

中国的“理论家”对此没有解释。他们就是这样“论证”自己的观点：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苏联，就像希特勒时代一样，这两个超级大国——其中一个是为了维持现状，另一个是为了扩张——将在欧洲发动战争。希特勒也想扩张并统治世界，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首先击败法国、英国和苏联。由于这些原因，希特勒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发动了战争。此外，中国修正主义者认为斯大林依靠了英国和美国。那么，中国人得出结论：为什么我们不能依赖美国？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解释的，他们忘记了苏联是在德国攻击苏联之后而不是之前，才与英国和美国建立联系的。

当威廉二世的德国进攻法国和英国时，第二国际首领倡导“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陷入了这种立场。列宁如何谴责这一点以及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言论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当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以捍卫国家独立的名义鼓吹欧洲人民与帝国主义的团结时，他们也在以第二国际政党的方式行事。与列宁的主张相反，他们正在煽动两个超级大国试图在未来发动的核战争，并向西欧各国人民和无产阶级发出“爱国”的号召，要求他们把与资产阶级的“细小”分歧(关于压迫、饥饿、谋杀、失业的分歧)放在一边，不去威胁他们的国家权力，而与北约、“联合的欧洲”、大资产阶级的欧共体和欧洲的康采恩联合起来，成为资产阶级训练有素的士兵。即使第二国际都做不了这么好。

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经互会的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人民有何建议？一个都没有！它在这个问题上相当沉默，根本不考虑这些人民。它不时敦促这些国家中的修正主义集团脱离苏联并与美国联合。事实上，它在告诉这些人：保持沉默和顺从，成为嗜血的克里姆林宫集团的炮灰！中国的修正主义领导层的路线是反无产阶级和战争贩子的路线。

这一切都表明，中国领导人是在故意使国际局势复杂化。他们是根据自己成为超级大国的利益来看待这些情况的，而不是根据革命的利益。他们是从他们的帝国主义国家角度，而不是从人民解放的角度来看待它们；是从扑灭自己国家和别国的革命的角度，而不是从组织与加强无产阶级和人民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斗争的角度来看待它们；他们从煽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而不是反对世界大战的角度来看待它们。

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过程将产生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中国本身和中国人民产生严重后果。

对中国政策的马列主义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领导层正在使中国陷入僵局。它认为通过服务于美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它自己会从中获利，但是这些利益是靠不住的，将使中国付出高昂的代价。它们将使中国陷入灾难，当然，在其他国家也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受到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激励的成为超级大国的政策，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所谓第三世界人民的眼中，正在并将继续被揭露出来。世界各国人民——无论是他们在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能理解各国政策的目的。他们看到并了解，尽管中国故作“第三世界”

成员的姿态，但它的愿望和目标却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同。他们看到它正在奉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因此可以理解的是，这种不受欢迎的、鼓励社会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在人民眼里不可接受的。这项政策仅符合反动集团的、人民的统治者和压迫者的利益。

中国支持索马里并向索马里提供武器。在美国的煽动下，索马里正在与埃塞俄比亚作战。同时，埃塞俄比亚正在苏联的支持下吞并索马里。厄立特里亚也正在发生这种情况。因此，中国在一边，苏联在对立的另一边。如果索马里有任何人以友善的眼光看中国，那就是当权者，而不是正被杀害的索马里人民。无论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埃塞俄比亚领导人，还是受到煽动反对据说要占领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都没有以友善的眼光看待中国。因此，在埃塞俄比亚或索马里，中国根本没有影响力。【8】而阿尔及利亚也没有以友好的眼光看待它。后者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9】，而中国则支持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

中国在外交政策中奉行所谓的亲阿拉伯路线。但是，这项政策仅包括团结阿拉伯人民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问题。因此，不言而喻的是，中国将首先协助阿拉伯人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

中国领导人说了很多反对以色列的话，但是，在现实中，它的策略是亲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在亚洲国家，我们可以说中国没有明显而持久的影响力。

中国与邻国并没有真诚和亲密的友谊，更不用说与其他更遥远的国家了。只要不是马列主义的政策，中国的政策就不是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在这种政策的基础上，它不可能与越南、朝鲜、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国建立真诚的友谊。中国摆出要同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姿态，但实际上，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存在政治、领土和经济问题上的争端。

按照中国的政策，它现在已经与越南发生公开冲突。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边界发生了严重的事变。中国社会帝国主义者一直在严重地干涉越南的内部事务，并为自己的扩张主义目标，煽动柬埔寨和越南等国之间的冲突。中国领导人对直到昨天还被认为是一个兄弟国家和亲密朋友的越南采取这样的做法时，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政策会怎么看？他们会相信中国吗？

谈论中国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力是浪费时间。它在那里没有影响力，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是经济上的影响。中国影响力的总和取决于与一位狂热的法西斯刽子手皮诺切特的友谊。中国的这种立场不仅激怒了拉丁美洲人民，而且激怒了整个世界的舆论。他们看到，中国领导人亲近暴虐的统治者、独裁者，亲近统治人民的将军，亲近扼住南美大陆人民的咽喉的美帝国主义。因此可以说，中国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微不足道，没有实质和能力。

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没有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但是相反，它将导致中国与进步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日益的孤立。当人们看到在 1977 年 10 月 1 日的中国国庆节，前纳粹德国的将军、前日本军国主义将领和法西斯葡萄牙的将军等等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中国领导人旁边时，没有人，没有无产阶级或革命者会支持中国的政策。

如果不加大对本国广大工人群众的剥削，中国就不可能继续走自己的超级大国之路。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将寻求从他们在那里投资的资本中获得超额利润，他们还将推动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向资本主义方向作迅速和彻底的转变。为了维护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庞大的官僚机构，为了偿还外国资本家的信贷和利息而加紧剥削千百万强大的群众，这无疑会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统治者之间，引起深刻的矛盾。它将使后者与本国的劳动人民发生对立，这必然会在中国引起尖锐的冲突和革命的爆发。

注：

【1】译者注：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并进而要求“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2】译者注：
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1939 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帮助总统罗斯福出谋划策，坚持先攻纳粹

德国再攻日本帝国，为美国在二战的胜利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 年退役。后出任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防部长，以出台马歇尔计划闻名。1945 年 12 月，马歇尔作为驻华特使抵上海，负责“调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1946 年 11 月军调失败，他返回美国。
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1897——1989，二次世界大战时于东亚服役，于 1944 年底接任史迪威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中国美军指挥官；至 1946 年 3 月卸任。1947 年再奉命为特使到中国调查，力主加强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来遏止中共。
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美国著名记者。他于 1928 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 年 4 月到 1935 年 6 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 年 6 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 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并与毛泽东见面。

这句话似乎可以解释为马和魏二人是蒋介石的游说团，与下文斯诺等人对比。

【3】译者注：1974 年葡萄牙发生革命，之后宣布实施非殖民地政策，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而不是葡萄牙殖民地。1979 年 2 月 8 日，中国和葡萄牙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就澳门问题双方达成原则谅解，同意“澳门是中国领土，定将归还中国。至于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可在将来认为适当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4】译者注：这句话应出自《论十大关系》中的“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特别要努力地向外国学习”，而 1979 年 7 月中国全国人大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也服务了这一目的，该法规定，外国合作伙伴的资本不得低于总资本的 25%（见《北京周报》，第 29 号，1979 年 7 月 23 日，第 25-27 页））

【5】译者注：为意大利国营石油企业，1992 年改为股份制

【6】译者注：分别指 1973 年 7 月 3 日至 6 日的欧安会筹备会议和 1977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欧安会续会预备会

【7】编者注：本着大国沙文主义精神，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1964 年夏提出了修订中苏边界和中苏其它国家的边界问题。
从共产主义利益出发，1964 年 9 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封同志信：“我们认为现在和苏联提出领土问题，对我们的斗争十分有害......我们认为......我们的斗争必须指向并专注于那些大溃疡——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铁托叛徒集团以及它们的仆从。”（见霍查《中国纪事》）

【8】译者注：指 1977-1978 年发生的欧加登战争。战争起因是索马里对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提出领土要求。战争中，埃塞俄比亚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战争最后以索马里撤出欧加登地区告终。

【9】译者注：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是一个致力于争取西撒哈拉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其曲折、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的立场，其战略的频繁变化，中国领导人过去和现在使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政策，很自然地引起了毛泽东与他的思想（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角色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是没有马列主义特征的“理论”。所有中国领导人，无论是以前的还是今天的当权者，为了把他们的反革命计划付诸实践，故在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战略和战术目标上都始终发挥着“毛泽东思想”的作用。

当我们看到那写可疑的活动、摇摆不定和矛盾的立场、原则的缺乏和中国内外政策的实用主义与对马列主义的背离，以及他们使用“左”的话语来掩饰它的实质，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便逐渐形成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表现出的危险性的见解和信念。在我们党成立之时，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我们的人民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是，就像世界上所有的革命者一样，我们也认为它是进步的：“中国是一片幅员辽阔的大陆。中国正在战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妥协的革命在中国沸腾”等等。我们对孙中山的活动，孙中山与苏联和列宁的联系和友谊有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了解，我们对国民党、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略知一二，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伟大的党，由马列主义者毛泽东领导，仅此而已。

我们党直到 1956 年才与中国人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由于我们党为反对赫鲁晓夫分子的现代修正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这种联系不断增加。那时，我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或更准确地说，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联系变得更加频繁和密切，特别是当中国共产党也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发生公开冲突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尽管进行了很好的、同志般的会晤，但在某些方面，中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谜。

但是，为什么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一个谜呢？之所以成为谜，是因为对于一系列重大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和组织问题，许多态度，无论是普遍的态度还是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态度：有时会在右边，有时则在左边；有时他们是坚决的，有时则是不坚定的；有时他们保持正确的立场，但更多时候是机会主义的立场，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中国的政策总体上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缺乏马列主义的脊髓。他们今天对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会说些什么，明天他们就可能会矛盾。在中国的政策中，找不到一条持久的红线。

当然，所有这些态度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并不赞成它们。但是，从我们对毛泽东的活动的了解中，我们从一个普遍的观点出发：他是马列主义者。关于毛泽东的许多观点，例如，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对立阶级的观点——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非对立矛盾的处理；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绝对化——*“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保留和我们自己的马列主义观点，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向中国领导人表述。同时，某些其他政治观点也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这些与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不符，我们认为这是大国的临时策略，由特定情况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共产党维持的立场不仅仅是策略。

通过分析事实，我们党提出了一些一般的和具体的结论，这使我们党保持警惕，但它避免了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争执，这并不是因为它害怕与他们进行争执，而是因为关于这个党和毛泽东本人的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的事实，仍是不完整的，所以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度确实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它也反对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尽管现在很明显，它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不是由正确的，原则上的马列主义立场决定的。

除此之外，我们对中国的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还不了解。中国政党和国家的组织向来是封闭的。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给我们机会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组织形式。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只知道中国国家组织的概况，仅此而已。我们没有任何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了解它的运作方式，组织方式，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以及具体的方向。

中国领导人的行为是狡猾的。他们没有公开许多能使人们了解其党和国家的活动必要文件。他们过去到现在都非常谨慎地发布他们的文档。即使是那些可供我们使用的少数公开文件，也是零散的。

毛泽东著作的四卷本可以视为正式著作，其材料不迟于 1949 年。但除此之外，还经过精心安排，以致不能准确反映出毛泽东时代发展的真实情况。在中国，政治和理论上的问题反映在报刊上而不是在文献上——完全混乱不堪，只具有宣传性质。文章中充斥着典型的中国刻板的公式化表达，例如“三善五恶”（ "the Three Goods and the Five Evil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四旧四新”（ "the Four Olds and Four News"，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反之——译者注），“两提醒五自律”（"the Two Reminders and Five Self-control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三真七谬”（ "the Three Truths and Seven False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等。我们发现很难从这些算术数字的意义里得出“理论”。

中国领导人没有邀请我们党的任何代表团来学习他们的经验。当一些代表团应我们党的要求去那里时，中国人进行了宣传，并带着他到那儿去参观公社和工厂而不是给它一些关于党的工作的解释或经验。他们对谁保持这种奇怪的立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捍卫他们的他们的朋友阿尔巴尼亚人。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但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想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其情况。

但是，最引起我们党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它在我们脑海中引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的活动突显了令人震惊的政治思想、组织思想和行为活动，这些活动并非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在判断他们先前的可疑行为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观察到的那些行为，尤其是迄今为止这场革命之后发生的事件时，观察这个那个集团在领导层中的兴衰时——今天是林彪集团，明天是邓小平、华国锋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反对对方的舞台。所有这些促使我们党更加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行动，更深入地了解“毛泽东思想”。当我们看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由毛泽东的党领导，而是在毛泽东一声令下后爆发混乱的时候，在我们看来这不是革命的立场。正是毛泽东在中国的权威使数百万无组织的青年、大、中学生和小学生站起来，向北京、党和国家委员会分散着前进。据说，这些年轻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思想”，并向党和无产阶级展示了“真正的”道路！

这种具有明显政治特征的革命被称为文化革命。在我们党看来，这个名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实际上在中国爆发的运动是政治运动，而不是文化运动。但是最主要的事实是，党和无产阶级都没有参与这场“无产阶级再次革命”的领导。这种严重局面源于毛泽东的陈旧的反马克思主义观念，即低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而高估了革命中的青年。毛泽东写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出自《青年运动的方向》——译者注）

因此，工人阶级处于观望状态，在许多情况下，它反对红卫兵，甚至与他们对抗。我们当时在中国的同志亲眼目睹了与青年斗争的工厂工人。党被瓦解清算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被完全无视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我们党支持文化大革命，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处于危险之中。毛泽东本人告诉我们，叛徒集团刘少奇和邓小平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政权，中国革命的胜利处于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谁的责任使事情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我们党都支持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捍卫兄弟的中国人民，捍卫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捍卫为了夺取政权而相互冲突甚至使用枪支进行械斗的反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派系斗争。

事态发展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不是革命，也不是“伟大的”，不是文化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是一个全中国规模的清算，对已经夺取政权的一小部分反动派的宫廷政变。

当然，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骗局。它清算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组织，使中国陷入新的混乱。这次“革命”是由非马克思主义分子领导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分子是通过由其他反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分子上演的军事政变进行清理的。

在我们的报刊中，毛泽东被描述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我们从未使用过并且从未批准过中国宣传的定义即毛泽东是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作为马列主义的第三阶段和更高的里程碑。我们党认为在中国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膨胀是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发展及其发展结果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观点，即我们仍然不完全清楚地认识到马列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应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持有马列主义的观点，虽然他们使用过“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口号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术语。

鉴于这些事件，我们党已经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领导人曾经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立场摇摆不定的原因，例如在 1962 年寻求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和解与团结，据说是以与苏联修正主义者结成反

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名义进行；或者在 1964 年，他们继续为与苏联和解而努力，周恩来前往莫斯科欢呼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上台【1】。这些犹豫不决并非偶然，这反映出他们缺乏革命性的原则和一致性。尼克松受邀访华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宣布了与美帝国主义和睦相处的政策。显然，中国的路线和政策完全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此后，中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野心开始变得更加清晰。中国领导人开始更加公开地反对世界无产阶级和真正的马列主义的人民解放斗争与革命运动。它宣称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并试图将整个马列主义运动强加于它的总路线。

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由于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中观察到的错误，是由于对情况的不正确评估和各种困难所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已尽了最大努力。我们不止一次试图帮助中国领导人纠正和克服它们——我们党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公开和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并对中国的许多直接影响马列主义运动总路线、人民利益和革命的行动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党已用官方书面的形式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分歧，并欢迎对我们党的这些话进行的正确和原则性的评论。但他们从未答复过这些，也从未同意过讨论这些。而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外的反马克思主义行动变得更加明显露骨。所有这些，迫使我们党像其他马列主义者一样，重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党的政治思想观念、具体活动及其后果。结果我们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所一直受到和被其指导的思想——代表着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变体，必须对之进行理论和政治上的全面斗争。

“毛泽东思想”是修正主义的变种，甚至在修正主义开始形成之前就已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尤其是 1935 年毛泽东上台后。在此期间，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以反对*“教条主义”*(dogmatism)，*“经验主义”*（ready-made patterns），*“洋八股”*（foreign stereotypes）等斗争的口号发起了“理论”运动，并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普遍性。他用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方式”代之以马列主义对待问题的方式，推崇中国式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风和气派”*（出自《反对党八股》——译者注），以此来传播认为在各国，马克思主义都应有自己的具体内容的修正主义论点。

“毛泽东思想”被誉为当今时代马列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国领导人宣布“毛泽东已经取得了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成就……”。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共章程》说：*“毛泽东思想是这个时代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 ……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出自林彪《九大报告》——译者注）。 把党的活动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而不是以马列主义的原则和规范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和派系斗争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大门。

毛泽东思想源于古代中国的哲学、它的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实践。所有中国领导人，无论是现在执掌政权的人，还是曾经执政和已经下台的人，都设法将其反革命计划付诸实践，他们已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领导思想基础了。毛泽东本人也承认，左派和右派都可以利用他的思想，正如他所说的，是组成中国领导层的各个组织。毛泽东在 1966 年 7 月 8 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肯定说：*“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法国《世界报》12 月第 72 期——作者注）。 这表明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他的观点是折衷的。这在所有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些著作充斥着“革命性”的措辞和口号，却不能掩盖“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没有共同点的事实。

对毛泽东的著作，包括部分著作，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观察他对待共产党的角色、革命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问题的方式，使得“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之间完全地出现了根本的区别。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作用的问题。毛泽东假装使用了列宁主义原则关于党的学说。但是，如果具体分析他对党的思想，尤其是对党的生活的实践。很明显，他已经用修正主义者的论点取代了列宁主义的原则和规范。

毛泽东并没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原则组织中国共产党。他没有努力使它成为列宁主义类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式政党。毛泽东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没有阶级限制的政党。他用口号赋予党派群众性，以抹消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结果，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进入或离开该党。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思想”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相同。

除此之外，毛泽东始终使党的建设、党的原则和规范取决于他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如他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他的冒险主义政策、他和各派之间的斗争等。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存在真正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与行动的统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存在着各派之间的斗争，这意味着该党没有确立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也没有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有时是左倾的，有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有时是中间主义的，甚至是公开的无政府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点，而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人一直是党的领导者，这些倾向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毛泽东本人主张党内必须存在“两条路线”。他认为，两条路线之间的存在和斗争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对立统一的体现，是一种灵活的政策，它本身既忠于原则又现实妥协。他写道：*“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出自《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译者注）

这些观点与列宁主义关于共产党是有组织的先锋队，必须有思路和行动的统一的教导截然相反。

党内阶级斗争，反映了党外阶级斗争的发生，这与毛泽东关于“党的两条路线”的观念没有共同之处。政党不是阶级的竞技场，也不是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它不是一个持有相反目的的人的聚会。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以阶级的利益为基础，这是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因素。斯大林捍卫不允许党内存在许多对立趋势并反对这种趋势的列宁主义党内原则。斯大林强调：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而不是不同阶级成分联盟的党。”*（出自《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译者注）

但是，毛泽东认为党是同时包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的阶级联合体，是由“无产阶级工作人员”和“资产阶级工作人员”两股力量组成的组织，他们从基层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相互对峙、斗争。因此，在1956年，他要求选举左右派的领导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并为此提出了幼稚可笑的论点。他说：*“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出自《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译者注）毛泽东在放弃党内有原则的斗争的同时玩弄派系的游戏，寻求与某些派系妥协以抵制另一些派系，因此通过这样的组织平台，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马列主义政党，列宁主义的原则和规范没有得到尊重。没有定期召开会议：例如，第七届和第八届代表大会之间相隔了11年；而战后，第八届和第九届代表大会之间相隔了13年。除此之外，举行的大会是正式的，比工作会议更隆重。代表大会不是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根据常任代表制行事。

近日，一篇由所谓理论组织炮制的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办公厅”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刊登（1977年9月8日《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作者注，译者完善）。这篇文章说，毛泽东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该机构一直保持着毛泽东在政治局的地位，并使党、国家机关、军队、安全部门等处于监视和控制下，其禁止所有人（包括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进入该厅以及了解其工作知识。在这里，制定了将这个或那个派别组织撤下或升迁的计划，。该厅的人无处不在，他们在党的控制范围之外从事窃听，观察和独立报告工作。除了这些目录外，该目录还拥有以“毛主席卫队”的名义隐藏的全部武装部队。每当主席想“一击”时，这名拥有50000多名士兵的保卫队便开始行动，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最近随着“四人帮”及其支持者被华国锋逮捕而被揭露。毛泽东还以与群众保持联系为借口，在群众中建立了专门的告密人网络，负责对基层干部进行监督，调查群众的状况和思想状态，这些没有任何人了解。他们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所以毛泽东切断了与群众的一切交流手段，仅通过他的“中央办公厅”特务的报告就看到了世界。毛说：“就我自己而言，我是一个不听广播的人，无论外国还是中国的，但我有自己的渠道。”他还说：“我已经公开声明不再阅读《人民日报》，我告诉报纸总编辑‘我不看你的文章’。”（摘自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与我们党同志的谈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档案馆）

《人民日报》的文章提供了新的信息，使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毛泽东在中国政党和国家中的个人权力和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会或党的代表大会没有丝毫尊重，更不用说整个党及其在基层的委员会了。党委，领导干部和中央委员会本身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命令，这是仅对毛泽东负责的“专职人员”。党的会议及其当选机关，至今没有任何权力。《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没有先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签发电报、信件、文件、命令。原来早在1953年，毛就曾

发表明确的命令：*“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出自《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译者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谈论集体领导,党内民主或列宁主义规范。

毛泽东无限的权力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甚至任命了他的继承人。他曾一度任命刘少奇为继任者。后来他宣布，他去世后的国家继承人将是林彪。这在马列主义政党的实践中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党章中也得到了认可。再次是由毛泽东任命华国锋去世后担任该党主席。毛泽东独自掌握了批判、审判、惩罚的权力，并在后来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复出，邓小平也是如此。邓小平在 1966 年 10 月 23 日的所谓自我批评中说：*“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所有这些都表明，*“……（我）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摘自《邓小平 1966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原作者注，译者完善 ）。尽管这位资深修正主义者已承认自己犯下了这些罪行，但他还是被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毛泽东思想”对党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及其作用，在党和军队的关系上，在理论中得到构想，并在实践中得到体现的过程中，也很明显。在实践中，尽管毛泽东使用了“党指挥枪”、“政治挂帅”等轻描淡写的口号，他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政治角色留给了军队。战争爆发时，他说：*“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组织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出自《把军队变为工作队》——译者注）

因此，军队高于党，高于国家机关，高于一切。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党的作用作为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因素的话只是口号。无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为一派或另一派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斗争中,军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也起了主要作用。那是毛泽东的最后手段。1967 年，毛泽东说：毛泽东说：“依靠军队……”（出自《论革命的三结合》——译者注）“……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出自《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译者注）

为了清算他的意识形态对手的对手，毛泽东始终在发动军队。他率领林彪为首的部队，向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发起了进攻。后来，他与周恩来一起组织并率领军队对付林彪。受“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即使在毛泽东去世后，军队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像所有在中国上台的人一样，华国锋也依靠军队并通过军队行动。毛泽东死后，他立即发动政变，与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起策划了军队叛乱，并逮捕了政治对手【2】。中国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军队手中，而政党却落后于军队，这是修正主义盛行的国家的普遍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以压制社会主义的敌人，避免他们崛起，并保卫国家免受帝国主义和和国外反动派的最终攻击。但是，正如马列主义教导我们的那样，要使军队发挥这种作用，它必须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在军队的领导下。

目前，正在中国制定法律的，正是旨在使中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中最强大、最反动的派别。

未来，随着中国向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转变，军队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和力量将稳步提高。为了捍卫资本主义政权和其经济，它将加强武装分子的近卫军。这将成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如果人民的抵抗力量很强，这种专政甚至可以采取公开的法西斯形式。

毛泽东思想通过宣讲在国家领导层中存在许多政党的必要性，即所谓的政治多元主义，完全反对马列主义关于共产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可替代作用的学说。正如毛泽东向斯诺宣布的那样，他考虑由几个政党的领导国家，他认为这是美国模式之后最民主的政府形式。毛泽东问道：*“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他自答道：*“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政党以与中国共产党相同的法律权利和特殊权利参加国家政权并治理国家。不仅如此，这些资产阶级政党，据他说，是“历史性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也消亡的时候才应该消亡，也就是说，它们将共存直到共产主义。

按照“毛泽东思想”，只有在所有阶级和所有政党的合作基础上，新民主主义制度才能存在，进而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概念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各方的*“长期*

共存和相互监督”，并且非常类似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当前的说教，他们公开否认马列主义政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没有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的专政就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也无法建立和捍卫。

斯大林说：“*一个党的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出自《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译者注）

毛泽东的修正主义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一贯奉行的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和同盟政策中存在基础，这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早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的反马列主义路线的源头，这是对立的意识形态并存的直接体现。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唯心主义和宗教必须与无产阶级思想，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并存，“*毒草*”的生长以及“*香花*”等都必须允许存在。据说，这条路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必要的，以便为辩论和思想自由开辟道路。而实际上，通过这条路线，他正在努力为资产阶级合作及与其意识形态并存的政策奠定理论基础。毛泽东说：“*……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 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永远存在，因此，他们不仅必须存在还不能反对，而是必须赋予它们开放的机会，可以公开竞争。这种对一切反动派的和解立场，甚至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而对敌人活动的禁止则被认为是错误的。他说：“*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所有这些并不是对科学讨论的学术贡献，而是为反对马列主义而建立的反革命机会主义政治路线，这使中国共产党混乱无序，现在已有一百零一种观点和想法在流传了，今天确实有了百家争鸣，这使资产阶级的黄蜂能够在百花齐放的花园中自由飞行并释放毒液。

这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有其根源，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从成立到实现国家解放的整个时期中，一直没有为在意识形态上巩固自己而努力，没有努力灌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没有不遗余力地掌握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并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将其逐步应用。

“毛泽东思想”是反对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的。

毛泽东在其著作中经常提到革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从本质上讲，他坚持与唯物辩证法相反的形而上学和进化论的概念。唯物辩证法设想螺旋式的渐进式发展，毛泽东则以循环的形式宣讲发展，即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回到平衡的起伏过程。再次，从运动到休息，再回到运动，从上升到下降，从下降到上升，从前进到后退，再到再次前进，等等。因此，他坚持古代哲学关于以火净化的概念，毛泽东写道：“*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 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出自《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译者注）因此，他正像古老的占星家， 在农历的基础上，他推导了关于周期性起火的规律，在发展上从“大治”——到“大乱”——再到“大治”，因此定期循环重复。

这样，“毛泽东思想”就反对了唯物主义的辩证发展观，正如列宁所说：

“ ……（辩证唯物主义的）*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 ‘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而形而上学则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出自《谈谈辩证法问题》——译者注）这在毛泽东处理矛盾问题的方式上更加明显。据中国的宣传，毛泽东据说对此做出了“特殊贡献”，并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确，毛泽东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经常谈到对立、矛盾、对立统一，甚至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录和词句，但是尽管如此，他远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理解这些问题。在处理矛盾时，他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出发，而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论点出发，以机械的方式将对立视为外部现象，并将对立的转变想象为它们之间位置的简单变化。毛泽东通过与古代哲学的永恒对立，如上下，前后，左右，轻重等，进行对立，从而消除了事物和现象中固有的内在矛盾，并加以对待。实际上毛泽东否定事物和现象所固有的内在矛盾，而把发展当作简单的重复，用相同的对立面和它们之间被观察到的相同的东西作为一系列千古不变的状态。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被毛泽东理解为仅仅是交换位置而

不是矛盾的解决和一个包含对立面的特有的现象的质变，这被毛泽东用作一切事物所服从的正式模式。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毛泽东甚至宣称：*“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出自《事情正在起变化》——译者注），*“形而上学转化为辩证法，而辩证法转化为形而上学”*（出自《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里的*“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一句——译者注）等。在这种荒谬的说法和玩弄对立的诡辩术背后，潜伏着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概念。因此，他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了对立阶级和对人的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质变，而是将其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位置的简单变化。为了证实这一“发现”，毛泽东写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同样的逻辑也导致毛泽东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改：*“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诲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这样，就公开修正了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本质上，这是一个类型的两个阶段，是一个社会经济秩序，并且仅在它们的发展和成熟程度上有所区别。而毛泽东却将社会主义呈现为与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东西。

从这样的形而上学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来看，毛泽东把革命问题当作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人类存在的整个时期中定期重复的无休止的过程。从胜利到失败再到胜利，等等。毛泽东关于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概念，有时是进化论的，有时是无政府主义的，在他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更加明显。

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分析问题和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时并没有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1962 年 1 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本人承认：*“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出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译者注） 这使中国共产党无法确保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并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从来没有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与马列主义理论相反，马列主义理论已科学证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一道万里长城，这两个革命不必长时间分开，毛泽东却断言：*“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出自《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译者注）

毛泽东在整个革命时期，甚至在解放后，都坚持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这不是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因此，毛泽东在 1940 年说：*“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出自《新民主主义论》——译者注）

1949 年 3 月，在毛泽东提出解放后中国发展纲领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他说：*“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出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译者注）这些观点和“理论”导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是为将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而是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自由。

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以第二国际首领的立场为代表。第二国际首领最先攻击并歪曲了马列主义关于革命上升的理论，并提出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并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没有给资本主义以不可能的步伐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是跳过阶段。毛泽东则说：*“……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私人资本主*

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出自《论联合政府》——译者注）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概念在毛泽东对待革命动力的方式上更加明显。毛泽东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作用。列宁说，在帝国主义时期，每一次革命，无论是在民主革命、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领导权都必须属于无产阶级。而尽管毛泽东谈到无产阶级的作用，但实际上，毛泽东低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并提高了农民的作用。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出自《新民主主义论》——译者注）

毛泽东在他的总论中表达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即*“农村包围城市”*。他写道：*“……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出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译者注）毛在写有关农民在国家中的作用时也表达了这个想法。他已说过，所有其他政党和势力都必须服从农民及其观点。他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译者注）

毛泽东还鼓吹农民在革命中作为世界革命之路的领导权作用的论点。这就是其反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源头，该概念把所谓的第三世界（在中国政治文献中也称为*“世界的乡村”*[出自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译者注]）视为“当今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按照中国的观点，无产阶级是一支二流的社会力量，它不能与马克思和列宁在和资本主义压迫的一切力量同盟的情况下发挥与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那样的作用。

中国革命以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为主导，小资产阶级广泛的各阶层已经影响了中国的整个发展。

毛泽东没有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列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农民，一般是小资产阶级，是摇摆不定的。当然，贫农中农在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亲密盟友。但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反马列主义。这是毛泽东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主要来源之一，对整个中国革命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完全没有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作用的基本革命指导原则有所了解，因此它没有在实践中适当而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一原则。经验表明，农民只有与无产阶级结盟并在其领导下行动，才能发挥革命性作用。这是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在我国得到证明的。

阿尔巴尼亚农民是我们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尽管工人阶级很少，它仍是农民的领头羊，这是因为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现在今天的共产党。劳动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取得了胜利。

尽管我们在道路上遇到了无数困难，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成功。我们取得了这些成功，是因为，首先，我们党完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理论的精髓，了解了革命是什么，由谁来进行和由谁来领导，懂得必须有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工人阶级的最前面并与农民结盟。共产党人必须知道，这个党绝不能仅是名义上的共产党，而必须是一个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运用马列主义革命和党建理论的党，这将开始为建立社会主义而开展工作。我们以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榜样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给了我们党的胜利，使我国拥有了今天所拥有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假如我们采取不同的行动，假如我们不始终如一地应用我们伟大理论的这些原则，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在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小国中建立。即使我们暂时取得了政权，资产阶级也将再次夺回政权，就像在希腊那样，在赢得这场斗争之前，希腊共产党将其武器交还给了当地的反动资产阶级和英帝国主义。

因此，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取决于谁来领导革命。

*“放弃领导权思想……”*列宁强调，*“是改良主义的最露骨的表现。”*（出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译者注）

“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否定，正是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没有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之一。在毛泽东的《论新民主主义》一文中，他鼓吹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一个以*“民主阶级联盟”*（在《论联合政府》中正式抛出——译者注）为基础的政权，其中包括

无产阶级和农民，还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写道：*“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出自《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译者注）这个想法也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四颗星星代表各代表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带来了国家的解放。缔造了一个独立的中国国家，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反帝国主义与民主力量都是伟大的胜利。解放后，中国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外国帝国主义和大地主的统治被清算了，贫困和失业被消除了，有利于劳动群众的社会经济改革被实现了，开展工作与落后的文化教育作斗争。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建受战争破坏的国家，并进行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在中国，过去曾有数百万人因饥饿丧生，但现在饥饿已不再存在。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从采取这些措施以及共产党上台这一事实来看，中国似乎正在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事情并没有变成那样。以“毛泽东思想”为活动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应该谨慎行事，不要左倾，不跳过阶段，被证明是“民主的”。 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大行其道，却没有人始终如一地带领这个国家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折衷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观念给解放后的中国带来一个不稳定的上层建筑，一个混乱的国家组织和从未取得稳定的经济。中国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甚至处于无政府状态，毛泽东本人以口号鼓励它：*“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而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是一位能干的经济学家和组织者，但从来不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家。作为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知道如何实现他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使之完美地适应每个在中国上台的组织。他是个不倒翁，总是能设法保持步调，尽管他总是从中间向右摇摆，但从不向左摇摆。周恩来曾是无原则妥协的老手，他曾支持被定罪了的蒋介石、高岗、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但他却断绝对列宁、斯大林和马列主义的支持。解放后，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观点和立场，在党内的政治方面可以观察到全方位的动摇。“毛泽东思想”的主张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必须长期持续的趋势在中国一直存在。毛泽东坚持认为，现阶段社会主义的过渡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进行，这是他所优先考虑的。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并存很长时间的理论，并说这对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有利。对于那些反对这种政策并提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人，他答道：*“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这就惹火了各国资产阶级，他们就骂人。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出自《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译者注）

毛泽东提出了他对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作为对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教导的创造性实践。但是，列宁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即允许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维持社会主义中的资产阶级关系上有根本的区别。列宁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退步，它允许在一定时期发展资本主义要素，但他强调：

“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出自《论粮食税》——译者注）

实际上，无论是在 1949 年还是在 1956 年毛泽东倡导这些事情时，中国的无产阶级都没有掌握政治权力或大工业。

此外，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当时俄罗斯的具体条件所强加的一项临时措施，长期内战给它造成了沉重打击，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事实是，在新经济政策颁布后的一年，列宁强调撤退已经结束，并提出了为在经济中打击私人资本做准备的口号，而在中国，保留资本主义生产的时期被认为几乎是永恒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解放后——共产党几乎已经掌握政权的时候——在中国建立的秩序必须是资产阶级民主秩序，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只有在无产阶级坚决地把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铲除并剥夺其权力后才能实现。

只要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只要资产阶级保留其特权，在中国建立的国家权力就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因此，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对剥削阶级保持仁慈的机会主义立场，毛泽东公开主张将资本主义分子和平地融入社会主义。毛泽东说：*“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

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出自《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译者注）

毛泽东希望为这种仁慈的机会主义概念提供理论基础，并发挥“对立转变”的作用，他说：通过讨论，批评和转变，对立矛盾转化为非对立矛盾，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变成他们的对立面，即成为革命者。毛泽东在 1956 年写道：*“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

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出发，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阶级敌人将得到纠正。因此，他提倡阶级和解，并允许他们继续富裕自己，去剥削，去说话，并自由地反对革命。为了证明这种对阶级敌人的投降主义立场是正当的，毛泽东写道：*“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出自《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译者注）根据这些与敌人和解的观点，在实践中，中国的国家行政机关交由旧官僚处理，蒋介石的将军们甚至出任了部长。的确，即使是溥仪——伪满洲国皇帝，日本占领者的傀儡——也受到了非常仔细的保护，变成了博物馆展品，以便各代表团可以见面并与他交谈，看看这些人是如何接受“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的。除其他外，对这位前伪皇帝的宣传目的是消除君主、酋长和在其他国家的外国傀儡地恐惧，使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很好，没有理由害怕它。

对于那些对中国人民犯下无数罪行的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中国也采取了不实行阶级斗争的立场。毛泽东把这种立场拔高到理论的高度，并在他的接受下公开庇护反革命分子，他说：*“……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作为一个诡辩主义者，毛泽东说，处决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好处的，据说这样的行动阻碍了生产，国家的科学水平，并将给他们在世界上留下了的坏名声等等。如果一个反革命分子被清算，*“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

由于毛泽东思想所倡导的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矛盾、关于阶级的概念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中国从来没有走过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去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残余在中国社会中不仅存活下来并继续存在，而剥削阶级也继续作为阶级存在，并且仍然掌权——资产阶级不仅仍然存在还继续从它所拥有的财产中获得收入。

资本主义的租金在中国还没有被法律废除，因为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毛泽东在 1935 年制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略，当时毛泽东说：*“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出自《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译者注）按照平均地权的政策，以中国现存形式存在的富农阶层保留了巨大的利益和利润。毛泽东本人下令，不得触及富农。因为这可能会激怒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组织上形成统一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

所有这些表明，“毛泽东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指导中国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确，正如周恩来在 1949 年宣布的，当他们暗中向美国政府申请帮助中国时，毛泽东及其主要支持者都不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周恩来说道：“中国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如果毛泽东的政策得到正确执行，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 （《国际先驱论坛报》，1978 年 8 月 14 日）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以一种蛊惑人心的方式将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声明从属于其实用主义政策。因此，其在所谓的“大跃进”那段时间的目的是在群众的眼睛里撒灰——他们从革命中崛起，渴望着社会主义，他们被宣布在 2—3 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将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但是后来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这些人又开始鼓吹社会主义的建设和胜利将需要一万年的时间【3】。

没错，虽然中国共产党自称是共产党，但它朝着一个混乱的自由主义路线、机会主义路线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不可能成为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力量。它所走的道路在在毛泽东去世后更加明确地具体化：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建设资产阶级，走向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道路。

作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毛泽东思想”已经用大国沙文主义取代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从其活动的第一步开始，中国共产党就表现出开放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事实表明，在随后的时期也不能根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说：*“白人在世界上居于引导文化的先驱，视异色人种为低下阶级而自居于高上的地位……我们中华民族……”*，李大钊继续说道，*“应对世界民族加入阶级战争做好准备……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猛力勇进，要在未来民族舞台施展我们的民族*

特性，要再在我们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出自《人种问题》——译者注）

这种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观点不可能从毛泽东的思想中彻底消除，更不用从说刘和邓的思想中消除了。毛泽东在 1938 年提交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出自《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译者注）

当然，每一个马列主义政党都说，它必须立足于自己过去的人民的遗产，但也要记住，它不能将继承来的一切作为基础，而只能立足于进步。共产党人拒绝思想领域以及其他任何领域的反动遗产。就其旧形式，内容和思想而言，中国人一直非常保守，甚至排外。他们将保存下来的旧物为珍贵的珍宝。从我们与他们进行的会谈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世界的所有革命经验都没有多大重视。对他们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政策、他们与蒋介石的斗争、他们的长征、毛泽东的理论才有价值。至于其他民族的进步价值观，中国人认为它们几乎没有价值，而他们确实没有不辞辛劳地去研究它们。毛泽东宣称：*“洋八股必须废止。”*（出自《反对党八股》，霍查原文为“中国人应该抛弃外国人创造的公式”——译者注），但他没有定义这些公式，他谴责从其他国家借来的所有陈词滥调和教条。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人没有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否也包括在这些与中国无关的“教条”中的“陈词滥调”（clichés）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苏联垄断了马列主义，这有助于毛泽东和他的同伙培养大国沙文主义的观点，而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式的嫉妒。他们不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祖国，全世界无产者必须依靠它来进行革命，他们必须全力捍卫之，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它的猛烈冲击。而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甚至发表抨击性的演说来反对斯大林本人。毛泽东指责斯大林搞主观主义，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出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据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还有，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行动也错了，等等。

尽管为了做表面文章，毛泽东会时不时地为斯大林辩护，说他只有三分错误，但实际上他只提到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在 1957 年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说：“在斯大林在场的时候，我感觉像是学生在他的老师面前，而现在我们与赫鲁晓夫见面，我们就像同志一样，很自在。”（原文未见，可能是霍查自己听到的——译者注）他公开表示赞赏并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诽谤，并捍卫了赫鲁晓夫的路线，这不是偶然的。

与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证明他偏离了斯大林一贯捍卫的并进一步丰富的马列主义原则。中国修正主义者用对斯大林的攻击来贬低他的工作和权威，以将毛泽东的权威提高到马列主义经典的世界级导师的水平，据说他有一种方法继续从事正确的和绝无谬误的路线！这些批评还表达了他们对斯大林积累的不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层的谴责和批评是他们未能在革命中始终贯彻执行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上，毛泽东公开表达了这种不满，他说：*“仗打胜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出自《论十大关系》——译者注）同样，周恩来在地拉那与我们会谈时说：“斯大林怀疑我们是亲美的或者我们可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时间证明斯大林是完全正确的。他对中国革命的预言及其指导思想被证明是准确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以及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中心的矛盾，都是在原则上的矛盾，讨论了马列主义革命战略和战术的基本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忽视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和持续发展的论点，例如关于工人阶级在城市和解放军联合行动中的定位的论点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特征和阶段的论点等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直蔑视共产国际到中国的代表，称他们为“愚蠢”、“无知”的人，他们*“不了解下情”*（出自《<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译者注）等。把各国都当作“客观现实本身”、“与其他国家封闭”。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是不必要的而且根本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 1962 年 1 月的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出自《在七千人大会

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译者注）

在谈到毛泽东的成功时，他们将共产国际排除在外。中国共产党的失败和背离是未能从中国发展的现状理解和正确地推断局势所致，他却将责任归咎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指责共产国际在为夺取政权和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对他们造成了阻碍，使事情复杂化。但是过去的事实，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的现实，证实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决议和指示总体上是正确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和精神行事。

“毛泽东思想”具有的特征就是狭窄民族主义的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后果。这些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基础，也反映在该党的立场和活动上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对在赫鲁晓夫分子的背叛后成立的新的马列主义政党的立场上尤其明显。从一开始，中国领导人对他们就没有至少一点信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耿飚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作出决定时公开表达了这一观点。他曾说：“中国不赞成建立马列主义政党，也不希望这些政党的代表来中国。他们的到来对我们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他强调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我们不能将他们送走，我们接受他们就像我们接受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一样。”【4】（摘自耿飚 1973 年 4 月 16 日在北京同我们党的同志们的谈话）在毛泽东在世，完全有思想和指挥能力的时候，实行这种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政策，因此得到了他的充分赞同。当这些新的马列主义政党与中国领导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时，他们又奉行了另一种策略，即普遍地、无差别地承认所有新政党和每个组织，只要他们自称“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政党”、“红卫兵”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和策略，其他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也做过同样的事，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读者们仍然继续了同样的路线。后来，中国领导人按照对新成立的政党和组织的实用主义政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们称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为敌人，而反对这些政党的革命国际运动（RIM）所属的组织和政党他们却非常珍惜。目前，中国修正主义者不仅与这些赞扬“毛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保持联系，而且还邀请他们的代表们表一个接一个地去北京工作，他们得以在北京工作，还被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和支持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并向他们简要介绍如何对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他们要求被宣传“毛思想”和“三个世界”理论，并在总体上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制造对华国锋、邓小平的崇拜，谴责“四人帮”。对中国修正主义者来说，符合这些要求的政党是“马列主义的”，而反对的政党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冒险主义的等等。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在与马列主义政党的关系中，并没有执行规范真正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和规范。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样，他们从反马克思主义的“母党”概念出发，诉诸于支配、压力和干涉对方的内政，从未接受过兄弟党的同志建议。他们反对马列主义政党的多边会议、反对讨论革命准备和胜利的重大问题的会议、反对为保卫马列主义而进行的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会议，反对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的会议等等，反对这种立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敢在多边会议上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抗，因为他们为世界资本主义服务的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以及旨在把中国变成超级大国的战略，都会暴露和被揭露出来。

“毛泽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的另一个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与许多异类法西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政党和组织保持并继续保持着关系。现在，它正在努力为与诸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以及欧洲、拉丁美洲等其他国家的旧修正主义政党建立或发展关系奠定基础。中国修正主义者越来越重视这些关系，因为从意识形态上讲，它们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无论它们在战术上有什么不同——这取决于各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实力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与这些传统修正主义政党的关系将逐步扩大，他们的行动将协调一致，同时它将继续利用自称为“马列主义者”并遵循中国路线的小组织进行斗争和分裂，破坏现存的真正的、仍然坚定的马列主义政党以及正在或即将诞生的其他政党。通过这些行动，中国修正主义者正在公开援助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政党，以破坏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尤其是主观因素的准备，将加强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以领导这场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与所谓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关系中采用了同样的策略，该联盟竭尽全力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与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前的中国领导人希望与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一起前进，并在与马列主义和所有马列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协调他们的行动，以反对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保持实用主义的立场，对铁托和铁托主义的看法有很大的变化。起初，毛泽东说铁托没错，但斯大林对铁托错了，后来同一位毛泽东又将铁托与希特勒和蒋介石并列，并说：“铁托，希特勒，蒋介石和沙皇等人……是无可救药的，只能打倒。”（原文未查明——译者注）然而，他再次改变了立场，并表达了与铁托见面的强烈愿望。铁

托本人最近宣布：“毛泽东还活着时我就被邀请到中国来。在联邦立法委员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5】访华期间，毛泽东向他表达了他希望我访问的愿望。中国主席华国锋还告诉我，五年前，毛泽东说他应该邀请我访问，并强调在 1948 年，南斯拉夫也是对的，这是他（毛泽东）在一个狭窄的圈子宣告的。但是，考虑到当时的中苏关系，这并没有公布。”（摘自铁托 1978 年 9 月 8 日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激进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正在忠实地履行毛泽东的这一“意志”。华国锋抓住铁托访问中国的机会，特别是他自己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对铁托赞不绝口，称他为“杰出的马列主义者”，而且不仅是南斯拉夫的，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导人”。

这样，中国领导人也公开支持铁托分子对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列主义的一切攻击。中国修正主义者与铁托分子、卡里略及其同伙等“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紧密的政治思想联系，他们给反马克思主义者、托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提供了支持，表明中国领导人，受“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和指导，正在与马列主义的叛逆者建立共同的意识形态阵线，反对革命、反对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的所有敌人都为中国的“理论”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为他们看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政策，是指向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

我们分析的这些问题并未涵盖“毛泽东思想”的所有反马列主义的内容。但是，它们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进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长期呆了下来，并在中国民主反帝革命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中国国内、在党内、在人民中以及在中国以外，他都树立了自己的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的声誉——他冒充一个共产主义者，以马列主义辩证法自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某些要素与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哲学、甚至甚至与中国古代哲学相结合。因此，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能只从他所发表的一些著作的词句编排上加以研究，而要从整体上加以研究，在实际应用中加以研究，同时还要考虑它们所带来的实际后果。

在评价“毛泽东思想”时，牢记它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也很重要。毛泽东的思想是在资本主义衰落之时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时，以及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榜样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教诲便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坚定指南。在这些新条件下诞生的毛泽东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必须试图像在当时最具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理论——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那样把自己摆出来。但实质上，它仍然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而在危机和衰败中拯救帝国主义的“理论”。因此，我们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当谈到“毛泽东思想”时，很难分辨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因为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这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现代修正主义、铁托主义、赫鲁晓夫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融合，使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短语。在这一切的混合物中，孔子，孟子和其他中国哲学家的旧思想，直接影响毛泽东的思想的形成，在他本人的文化和理论发展，也占据着光荣的位置。即使是以扭曲的马列主义形式出现的毛泽东思想的那些方面，也带有某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甚至佛教色彩的“亚洲共产主义”的印记和特征，最终必然与马列主义公开对立。

今天在中国统治的华国锋和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其反动政策和活动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平台。为了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上台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周围的人竖起了毛泽东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它谴责了天安门示威游行【6】，并清算了邓小平，他们给他贴上了他应得的修正主义者的标签。在这个旗帜下，这个组织发动了政变，粉碎了“四人帮”。然而，一向以混乱为特征的中国局势，混乱被继续加剧。

陷入困境的局势使邓小平脱颖而出并重新掌权，他用法西斯手段再次走上了右翼极端主义的道路。邓的目的是加强自己集团的地位，遵循他不加掩饰的与美帝国主义和反动的世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路线。邓小平提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四个现代化”纲领，清理了通过这次革命晋升到国家权力机关、党和军队机关的干部群众【7】，取而代之的是过去曾被曝光和谴责的、黑色反动的人。

现在，我们目睹了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针对毛泽东的大字报，邓小平的信徒用这些大字报装饰着北京的墙【8】。这是“复仇”时期，有两个目标：一是清算毛泽东的“声望”，消除华国锋的障碍；二是使邓小平成为无所不能的法西斯独裁者并恢复刘少奇的名誉。在这种反动演习的背景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有一些人将邓小平同从未曾是马列主义的毛泽东进行的斗争，与赫

鲁晓夫向曾经是并且仍然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扔泥巴的罪行作比较。任何人，不管他脑子有多小，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类比。最正确的比较可能是，正如勃列日涅夫和他周围的修正主义团体推翻了赫鲁晓夫一样，现在，中国的勃列日涅夫邓小平正在推翻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

整桩事都是一场修正主义游戏，一个个人的权力斗争，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向如此。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和一个真正的清除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思想”，以及所有其他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才能纠正这种情况。正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通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中国摆脱这种状况。

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马列主义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将被击败。当然，如果不进行流血的战斗，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要在中国组建马列主义的革命政党，要付出一切努力，而且一个能战胜叛徒和带来社会主义胜利的领袖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相信，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和真正的中国革命者将使自己摆脱幻想和神话。他们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没有马列主义的革命者，而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人追求的路线没有群众和革命者的追求。了解这一点，有必要认识到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本人不是马列主义者。我们马列主义者对“毛泽东思想”的批评与邓小平在发动权力的斗争中针对毛泽东的攻击毫无共同之处。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公开、坦率地讲这些问题，是在履行维护马列主义的职责，同时，作为国际主义者，也是在帮助中国人民和革命者在他们所经历的困难情况下找到正确的道路。

注：

【1】译者注：
1961——1962 年，苏联和中国双方都尝试缓和关系，代表事件为周恩来率代表团旁观苏共 22 大；1964 年，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官僚推翻了赫鲁晓夫，中国试图与之接触，故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纪念仪式，但不欢而散。

【2】译者注：毛泽东死后，中共内部局势动荡，李先念、叶剑英等右派分子勾结华国锋、汪东兴等新贵秘密串联，于 1976 年 10 月 6 日对江青等人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3】译者注：指大跃进及其失败之后的反动

【4】译者注：耿飚，1909——2000，建国直至 80 年代一直在外交阵线上活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5】译者注：比耶迪奇，波斯尼亚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理），1975 年访华，1977 年因空难去世

【6】译者注：指四五运动，是青年借纪念周恩来发起的反对十年文革时期的抗议运动，得到了右派分子的支持，被吴德和毛远新弹压。

【7】译者注：指清理三种人运动，中共中央于 1978 年 8 月发出《关于慎重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83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对"三种人"进行清理。84 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8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的评论员文章。邓小平等右派借此完成了对中共的大清洗，建立了对其自己有利的局面。

【8】译者注：指西单墙-“民主墙”，文革结束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该墙张贴鼓吹全面否定文革和自由化的大字报，给邓小平提供了舆论帮助，后被官方取缔。

保卫马列主义—所有真正的革命者的主要职责

当前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的危机越来越严重，超级大国的侵略性政策每天都在日益增多，给各国人民的自由、独立以及世界和平带来了新的巨大危险。资产阶级和赫鲁晓夫分子，铁托分子、“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的理论，都是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扼杀革命大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持对世界重大问题的革命立场，是我们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任务。我们的正义斗争必须能够建立人民起和进步人士对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信心。我们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它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全世界的革命者和人民以及马列主义的真理都站在我们这边。

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者看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别人攻击马列主义时捍卫了它，而当各种修正主义者把这些原则抛诸脑后，劳动党捍卫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他们看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其立场上，不仅从其本国的利益出发，而且还表达着和代表着非常巨大的、亲近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利益，以及那些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并受马列主义指导，为世界革命性变革而奋斗的人的利益。

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同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关系中所奉行的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引起了怀疑、不满和不断的批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国家的诚实的人认为中国的政策是不正确的，是一种支持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些帝国主义在向他们施压，而中国领导人讲的很多东西又都不符合他们的行为和具体现实。人们看到，中国实行的是威胁人民利益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

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党也正在作出些许的贡献。人民之所以信任劳动党，是因为它讲的是真理，而真理的来源在于阿尔巴尼亚具体运用着的马列主义理论：我国的发展，过去的解放战争，过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状况，与世界上许多遭受过或正在遭受内部统治者和外国帝国主义统治者的野蛮压迫的国家，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党在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的经验，是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具体范例和帮助。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功，都是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它激励着劳动党，并得到劳动党的实践运用。

除了走狗和极端反动派，没有人敢直接捍卫中国破产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国与美帝国主义和解的政策复活了没人想看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幽灵，加深了没人能忍受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黑暗，并支持了所有人都想摆脱的资本主义剥削。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捍卫马列主义思想的纯洁性已经进行斗争、正在进行斗争并将永远坚决斗争。它一直并将永远反对所有试图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革命思想歪曲、代替它们的人。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列主义政党，是世界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它决心为此作出一切牺牲，就像它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党偏离这一完全国际主义的，光荣和可敬的道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恐吓或征服它。我们党不能与任何机会主义，与马列主义的任何背离或任何形式的歪曲相妥协。我们党也将坚决反对中国修正主义，就像反对任何其他形式的修正主义一样。

我们的党是一个小的马列主义政党，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党，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害怕公开地讲真话。我们党的党员人数不多，但它在许多战斗中都是坚强的。它一向有勇气公开捍卫马列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事实表明，我们与中国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正确的、是必须的，因此得到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者的认可和支持。

正如我们党一样，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其原则立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别人可能会把我们党的勇气和美德当做自大而退缩。党并未教导党员自负，而是教导他们始终坚决、公正、严厉地对抗阶级敌人。在这些问题上，无论党的规模大小，都没有没有讨论余地。

共产主义者、真正的革命者、马列主义者必须彻底了解当今世界的形势如何发展。它们不是以定型的形式发展。如果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诲，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及每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的经验都有合适的学习、理解和吸收，那么这些发展中的情况是可以被正确理解的，革命将得到有力的推动。

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必须充分理解、掌握马列主义，这是绝对必要的。决不能低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包围及对我们施加的压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绝不能愚蠢地过分自信，在真正的

战斗中，我们必须对周围的敌人发动进攻。

革命已经遇到过挡路石，未来还会有更多，必须用炸药炸毁它们。有些必须直接炸毁，有些必须零碎地炸毁，而有些则必须被包抄，然后进行最后一击——这就是理解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意义。为了建立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必须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它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坚定领导，否则就可能会卷入冒险行动并损害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和被压迫人民必须意识到，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在压迫群众、组织反革命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敌人的战术和策略也必须得到理解和应对，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政策，战略和策略比任何敌人都强大，因为它们为正义的事业、共产主义的事业服务。

现在，对于我们党以及世界上所有的马列主义政党来说，与中国修正主义的斗争应该得到最大的重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处理它时，可以忘记苏联修正主义，铁托修正主义或“欧洲共产主义”，它们也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非常危险的变体。关于它们的策略和战略，所有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无论其斗争形式如何不同，都在一条道路上，具有相同的目标和相同的斗争。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决不能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资产阶级的斗争或与苏联、南斯拉夫、中国和其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转移注意力。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但所有这些敌人都是由一根绳子联系在一起的：反对革命，反对马列主义政党及这些党的团结，反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发动革命的斗争。

与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与苏联修正主义、铁托分子和中国修正主义的斗争并非易事。相反，这场斗争是严峻的和长期的。要想胜利地进行下去，我国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所有劳动人民就必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学习我们党在反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的丰富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障碍，毫发无损地从充满荆棘的敌对的森林中走出来。

一如既往，我们劳动党必须在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上保持清晰、坚决、大胆的立场。我们党的这条路线将有明确的目标，会帮助揭露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及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并成功地与它们进行无情的斗争。

我们党和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竭尽全力捍卫我们的马列主义理论，并清除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所有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制造的所有歪曲。

马列主义是胜利的意识形态。拥护，捍卫和发展革命的人，是光荣的革命军团的一员，是那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军团的一员，他们将领导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者改造世界，摧毁资本主义并建设新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